

國立中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會編

三民主義研究集

江西省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委員會出版

駱先院長指教 胡先驕贈

MG
D6P3.0-53
12



3 1799 3160 9

序言

忠實於學問的人，是不肯從在人家背後亂喊信仰的。三民主義，雖然已有許多學者真誠闡揚，但是也有不少熱心假西真故意曲解的人。我們一羣認識不夠深刻的伙子，在這五花八門的圈子裏，想確實找出三民主義的真理所在，導轉人口的熾惑和宣傳，是太危險了。除掉讓自己埋頭在國父的遺教中去研究去發現外，竟有第二條路可走。我們的三民主義究研會，便在這個要求下成立了。

究竟三民主義究研會成立的條件？「三民主義文化運動」正在江西發跡。我們沒有忘記「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普遍展開，是由於「北大」的努力，對於三民主義文化運動，雖不敢自認中正大學該是運動的中心，但無疑是為中正大學所處的省份是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發跡的地方，很自然地，這個運動是需要中正大學來參加的。我們的研究會，祇是中正大學的一個小小學術團體，當然談不上能像「五四」時代的「北大」舉國響應。對於三民主義文化運動有何偉大的貢獻。可是，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對研究工作能夠忠實，決不會沒有什麼裨益。世界上絕沒有完全白費的氣力。

我們要求本冊子，是我們半年來努力的收穫。這點成就，自然是大微薄，物不虛說「成績」兩個字。尤其

序

言

二

我們還是初進大學的一羣，剛來打開學術研究的大門，許多膚淺，粗疏，幼稚的毛病，都是免不了。好在我們出版的目的，並不是誇耀什麼成績，不過一方面藉以鼓勵我們研究的興趣，一方面藉以獲得社會人士珍貴的指教。

集中的各篇文字，是本會第一次論文比賽的優勝作品，皆在報紙或雜誌上公開地發表過。自然，參加比賽的佳作甚多，本以限於篇幅，不得不暫時割愛，留待下次編印，這是要請其餘作者諸君原諒的。此，集中文字編排的次序，是就文章的性質而定，一般性質的放在前面，專門性質的放在後面，由總的說開及於分類開攝，並不是代表比賽名次的先後。

本會研究工作，多承校中各教授熱心指導；論文比賽及研究集的編印，得葉青教授與江西省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委員會的協助甚多，及本會第一屆幹事李煥文，陳推誠，陳資勛，陳蘭禎，羅來義諸君的主持編輯；在此一併表示謝意！

三民主義研究集目次

序言.....	本 會 一
一、三民主義與中國革命理論.....	魏競江 一
二、論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	雷 謙 二九
三、怎樣完成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	梁壽松 五〇
四、論三民主義的一次革命.....	陳資紡 七三
五、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	畢兆龍 八三
六、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	李煥文 九五
七、五權憲法理論的研究.....	陳兆奎 一〇六
八、總體經濟思想體系論.....	葉連生 一二九
九、民生主義研究.....	胡宜權 一四四
十、民生主義經濟制度底內容.....	陳香爽 一五九

杜小暉在主義之國營實業問題.....	劉文駒一六八
杜小暉在主義與我國之農業改革.....	王秋圃一八五
杜小暉在主義的救濟建設.....	柯一燾二〇七
杜小暉在主義教育.....	陳志恆二二五

三民主義研究集

三民主義與中國革命理論

十九世紀末葉，在中國發生了一個空前的革命運動。這一個革命運動，不但對中國本身有其劃時代的意義，即對於世界也有其劃時代的意義。因為這個革命運動負有世界的責任，消極地主張中國在政治的經濟的地位上，……和世界各國平等；積極地主張建立一個人類最理想的大同世界。

但首先要明白的，這個含有世界性的革命，其出發點在中國，須要在中國本身革命完成中去求世界的革命。所以中國本身的革命，就是世界革命的起點。我們要明白世界革命的意義，首先就要知道中國革命的意義。無疑地，中國本身的革命，在這個從中國革命走向世界革命的悠長的過程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無理論即無革命」，中國革命既負有這麼重大的責任，它的理論是什麼？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和中國革命有一個相互表彰的作用。沒有三民主義，中國的革命便沒有意義，也不會成功；反之，沒有革命的行動，三民主義便只是一種空洞的理論，頂多是一種私人理想的學說。從作用上說，三民主義對於中國

革命有指導作用；中國革命對的三民主義有實踐作用。唯有以三民主義爲圭臬，中國革命方有崇高的意義，和偉大的前途。那末，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與三民主義分離的事實，已經不容否認了。下面就要把三民主義與中國革命兩者相互的意義，作一深刻的研討。

楊桐孫先生在「三民主義研究」上講，「三民主義不發生於富強之列邦，而發生於貧弱之中國，不發生於垂危唐虞之代，亦不發生於盜金胡元之朝，而發生於一方異族統治，一方西方東漸之清末，不發生於實業革命之前，亦不發生於共產大同之後，而發生於資本肆虐，小民困苦，社會運動，日趨激烈之現代，非偶然也。……是以三民主義乃有兩種之時代背景，一則爲中國之環境，二則爲世界之潮流」。這幾句話，意義深長。這環境說到三民主義發生的客觀條件，而未談到三民主義發生的主觀要求。總理說：「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迫之……在滿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因爲政府本身的腐敗，自然日就沒落。帝國主義者，眼着着中國這塊肥美廣大的土地，必然地，會引起一種攫取的念頭。鴉片戰爭以後，滿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一切破綻弱點都顯露出來。這更加强了帝國主義者攫取的意念。中法之戰，中日之戰……等等都是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事實的表現；跟着來的，是種種不平等條約的訂立；一時中國已經是列強宰割下的「次殖民地」了。中國同時受到「自然力，經濟力，政治力」三種壓迫，

已絕不只是做一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不只做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在這種情勢下，中國前途的危險，確已到了一個無可復加的程度。而推究其原因，則不能不歸咎於滿清政府的腐敗。現在就讓我們看當時滿清政府統制下的中國是什麼情形吧。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割地，暴虐虜掠。盜賊橫行，饑饉交迫，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這種內外交迫下，人民「受之既久，迫而出於革命」，自然「亦固其所」。——即爲了挽救國家的危亡，不能不革命。而革命當前的障礙，就是滿清政府。最初固未嘗不想「隱忍受之，以倒懸之待解，求自由而企進步……勉求所以和平解決之道，初不欲覓流血之慘也」。但結果這「屢起屢蹶，卒難達吾人之目的」。所以要打破當時嚴重的危機，不得不首先「摧陷舊制」。

從這些敘述裏可以知道，中國的革命，實在是一種迫不得已而必然的結果。但中國的革命，決不是僅僅推翻了滿清就可滿足，推翻滿清不過剛剛是中國革命內開始。一般人的注意力，往往會從當前複雜紛亂的局面所迷惑。「滿清盤據中原的時候，一般革命家祇知道致力於民族主義，至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

都沒有注意」；一般的人都「以爲漢族一經光復，便可以達到國利民福底目的」。這就時說一般人祇意識到推翻滿清政府，而沒有意識到滿清政府推翻以後應走的道路；或者竟以爲推翻滿清政府就已經是革命的目的。這的確是當時革命者的一個絕大錯誤。中國革命如果一般人意識中的那樣，革命就沒有意義了，也不是時代所需要的革命。而推究其所以流成錯誤的原因。則因爲缺乏一種革命的理论作爲革命的指導的原故。當時中國革命所需要的理論，固絕對不是當時意識到的單純民族主義，但也不是近代歐美意識到的單純民權主義，同時「民生主義歐美所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於我爲方來之大患……」，所以中國革命爲了「一勞永逸」，使中國能「長治久安」，則其需要必爲一種包括了世界革命潮流進化的必然產物的三大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的理論。因爲中國的問題不是單純的民族革命所能解決，也不是單純的民權革命所能解決，單社會革命（民生革命）又要從民族革命和民權革命中去完成。忽略了民權革命，民族革命無從實現，忽略了民族革命，民權革命變成無意義，忽略了社會革命（民生革命），便有重蹈歐美覆轍的危險。

三民主義就是應這種需要而產生的。中國革命是應時代的需要；而三民主義則是應中國革命的需要。合起來講，三民主義是依時代而產生。所以中國革命亦必須依三民主義而進行。

我們要知道依三民主義而進行的中國革命，應當是怎樣的，則首先必須要明瞭。

三民主義的革命是怎麼樣的？

三民主義革命的目的，籠統地講，消極方面在「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積極方面在「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分開來講，民族主義革命的目的，在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外人在中國一切經濟的，政治的，教化的特殊權利，使整個被壓迫的民族，從帝國主義的侵略，剝削，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造成獨立自主的國家，以達到「國際地位的平等」；民權主義革命的目的，在於打倒一切封建軍閥，掃除一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及其他封建勢力，使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從多年的腐敗殘暴的政治壓迫下面解放出來，獲得「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四個基本民權，造成真正的民主國家，以達到「政治地位的平等」，民生主義革命的目的，在於掃除妨礙中國產業發展的一切障礙，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的辦法避免重蹈歐美資本主義的覆轍，使一切痛苦的民衆，從剝削與壓迫中解放出來，造成一個「長治久安」，「萬人安樂」的國家，以達到「經濟地位的平等」。

但這些目的的完成，只不過是三民主義革命過程中的一個階級的完成。最終的目的還是在這些目的的完成中去達到世界大國的實現。民族民權民生等革命，都是達到這個崇大目標的預備工作。因為祇有民族民權民生的革命，在中國本部成功後，中國才談得到富強，而中國本身的富強則是該世界革命的起碼條件。

從上面三民主義革命內容的敘述，我們不但知道了中國革命應有的內容，並且還可從這些敘述裏得到一個很大的啓示，即是中國本部的革命在三民主義革命整個歷程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我們爲徹底實現這個偉大崇高的三民主義的革命，對於這個對於三民主義革命有重要階段性的中國本部革命，就不能不加以更進一步的研討。

不容我們否認，現在是世界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同時急進化的時代。已爲充滿了世界歷史的，全是全世界的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個大問題；中國革命，爲了滿足這種世界問題的需要，亦必定要以三大問題作爲革命的核心。所以三民主義的革命，也就是世界的革命，但中國環境，地位，背景有其不與世界其他國家相同的特殊性，所以表現於中國的革命亦必有其特殊的地方。換言之，中國革命固需要保持世界革命的一般性，但同時不能忽略中國革命特殊性的存在。

世界革命的一般性是甚麼？

總理在民報發刊詞上面講的「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洎自其國，盛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族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而自立憲政固殫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踴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這說明了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產生的緣委，而亦說明了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是現世界潮流的必然。這是世界革命的一般性。但這一般的趨勢，不是由意識造成，而是由盲目造成；不是主觀的結果，而是客觀的結果。所以世界革命的一般趨勢，便含有絕大的缺點點在。

世界革命的一般趨勢及缺點是什麼？

總理說：「各國的革命黨，不是只抱一個主義，最多就是抱兩個主義，向來沒有抱三個主義革命。……像美國脫離英國去獨立，完全是為民權主義，不是民族主義，法國從前的大革命，本來是抱民權主義和

民生主義……」因爲當時的革命是盲目的，情感的，所以弄到結果，世界不但沒有因爲革命而得到好處，反而因爲盲目性革命生出種種流弊，造成更大的騷動。美國的民權革命的結果，祇是少數階級得着了「權」，這少數階級把持民權的結果，祇是把壓迫民衆的威權，由君主的手裏，移植到少數特殊階級的手裏罷了。大多數民衆的壓迫，並沒因而解除。民族主義又往往做了用來侵略弱小民族，剝削弱小民族的工具，而實業革命以後，手工爲機器所代，多數工人無工可作，形成「實業預備軍」，日伺於工廠之門，競求雇用。資本家因而得操縱其間，以低廉之工資，買得其極度的勞動，坐享厚利，財富集中於少數資本階級之手。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產生了階級的對立。同時生產組織方面，又處於毫無統制的個人企業之下，彼此競爭，增加生產；而其生產品，又專以牟利爲主，不以人民必需爲準，因而發生過剩，物價低落，造成經濟恐慌；企業者爲求生產費減低，工人的失業，自然日漸衆多；同時因爲爭奪市場而發生種種國際戰爭。社會問題，在這種情勢下，乃達到一個極度嚴重的程度。工人方面，既由散漫之村落集中在都市的工廠裏面，階級的意識於是容易發生。而階級之團體亦愈鞏固，於是發爲激烈的運動，社會運動乃如潮湧。「橫濱所激，經濟革命之聲，乃較政治革命爲尤烈」。這一社會問題，還沒解決。因爲這個問題還沒解決，所以裏面便伏着將來革命底導火線」。中國在世界革命的立場上看，是屬於後進國；外鑒先進國歷史道

斷的錯誤，內顧本國特殊的環境，不能不另闢一康莊道路，以免去革命許多的障礙，許多的流弊！

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是什麼？

首先要明白中國特殊的情形。中國是什麼情形？中國國家是在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種種壓迫下的國家，民族是在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種種壓迫下的民族；在過去遠同時是內受滿清政府統制下的國家，民族。久在滿清腐敗政府統制下的中國，經濟，教育，建設，國防等……一切都因之落後。這在帝國主義爲禍的世界中。必然地要遭到外來的侵略。而在帝國主義政治的經濟的……種種壓迫下，尤其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中國內部情勢更是江河日下了。中國革命必須要針對着這種特殊的情勢，才合中國的需要。中國革命的原則是三民主義，前面已經說過，民族主義所以謀打破國際地位的不平等，民權主義所以謀打破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民生主義所以謀打破經濟地位的不平等。但鑒於先進國革命的歷史道路的錯誤結果，必須要「把這三種問題同時解決」。因爲：「（一）民族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才不會變爲帝國主義。（二）民權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和民生主義和民權主義，才不會變爲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和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才不會變成資本主義」

。所以總理一則說「實行民族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再則說「所以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這種「舉政治革命社會舉其功於一役」的辦法，就是一避免歐美革命的流弊「與後進中國」迎頭趕上「歐美的辦法。

上面講清楚了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和爲了避免歐美歷史道路錯誤的弊端能要依三民主義把民族民權民生三個革命同時舉行的道理。反過來，我們還要從三民主義本身上去認識三民主義革命的優點。

三民主義革命的優點是什麼？

(一)民族主義對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有充實作用：

現在世界上有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把政治權力集中在資產階級者手裏；一種情形是把政治權力集中在無產階級者手裏。中國是受壓迫的國家，民族是受壓迫的民族。因爲生產落後，還談不上階級的分化；大家全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階級。固然不希望從新製造出資產階級，作爲統治階級，而發生和歐美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那樣的流弊，然而亦無有所謂對立的無產階級，來集中並掌握政權。所以必須要使民權成爲

民族的民權。民族的民權，其成就比一切資本主義的階級民權或無產的階級民權要大得多。換言之，民權主義，必須要賴民族主義的充實乃有意義。而為了預防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所遺下來的流弊，首先則必要預防資本主義的發生。具體講，即預防階級壟斷的對立。民族主義的作用，即在使民生主義有一種全民制度的意義。所以假設沒有民族主義的充實作用，民族主義的結果必會走向資本主義錯誤的道路上去。同時在現世界經濟生活複雜的時代，要計劃一個民族的生計政策，發展一個民族的天然富源，扶植一個民族的農工商業，用合理的方法管理之保障之，那並非可以和其他民族斷絕關係就能夠做到的。何況帝國主義的世界中，每隨空交通線突破了一切人爲的和天然的藩籬，帝國主義的資本。四處八方的侵入，生產品銷場的市場遍佈於世界，能讓我們關起門來備談民生主義嗎？由於種種不平等條約的定立，我們沿海和腹地的險要去其作用，我們的海關完全在列強控制之下。假如我們沒有民族主義做支持，民生主義在作用上講，還有甚麼意義？所以民生主義要靠民族主義的充實；換言之即民族主義對民生主義也有充實作用。

(二) 民權主義對於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有充實的作用

民權主義主張人民要有權的願望，不是要人民有權去謀個人的私利；乃是要人有權担当對人類的負責

任；而重點就要擔當對民族的責任。所以民權主義的始意，是要人人担起民族的大責任。爲要求能夠担得起對民族的大責任，就不能不要民權主義。具體地講，民權主義責任的對象就是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之所以能夠使人民有這種担當民族責任的能力的原因，就是它主張權能分開，實行全民政治的原故。沒有全民政治，中國民族能力不能完全表現。中國民族能力不能完全表現，民族主義便無從實現，至少談不到徹底實現。所以民權主義對於民族有充實作用。民生主義主要的內容是 總理手著的一部「實業計劃」。實業計劃的實現，則在求人民四大需要衣食住行的滿足和國防建設的完成。而這些必須要民權主義爲基礎，才可達到。民權主義的內容，在以權能分開的作用實行全民政治，實施地方自治，表現全民的力量，我們前面已經談過，全民政治的力量比任何少數人或階級政治的力量爲大。這大的力量，作用的結果，才可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離開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實行的結果，也祇是讓少數階級和官僚人，有一個掠奪經濟利益的機會，所以民權主義對於民生主義也有充實作用。

(三) 民生主義對於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有充實作用：

中山先生說：「人類要求解決生存問題，是社會進化的重心……」。『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經濟的中

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註十四）。從這裏，可以窺見民生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三民主義的核心；民生主義的達到完滿解決，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才有其穩固的基礎。前面已經談到中國民族要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束縛，必須要實行民族主義。實行民族主義，先決的條件，要發展民族的力量。民族力量的發展，首要的是要謀民族經濟力量的發展。而民族經濟力量發展的最低要求，要人人衣食住行四大問題的完全解決，要達到只有人人各依其聰明才智的不同，而為其社會分工的區別；人人為社會分工而服務。要這樣，民族主義才有其物質基礎。中國是一個積弱患貧的國家，沒有民生主義作為基礎，民族主義祇是空想，祇是理論，永遠達不到成功的目的。祇有以民生主義為充實的民族主義，才有其內容，有其實踐性。所以民生主義對於民族主義有實質的作用。我們前面又談到，民權在中國，必須是全民族的民權。要實行民權主義，達到全民政治，以發揮中國全民族最大的力量。但我們應當注意到中國民族四萬萬人，大多數是「大貧」，少數比較好的，也是「小貧」，大家都是貧，謀衣食之不暇，那裏去談得上行使民權？所以必須要把握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相輔而行。民生主義的實行，把中國漸漸辦到家給人足的程度，然後一個全民政治的民權主義，才有其漸漸樹立成功的可能性。不然，民權主義便行不通，最多祇能做到像歐美一樣的階級政治，而伏下一個日後革命的危機，便不能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所以民生主義對於民權主義也有充

實的作用。

以上的敘述，說明了針對着世界先進國革命道路的錯誤，而同時顧及中國國情，所以不得不依着三民主義，另闢一個革命道路，把世界三大問題民族民權民生同時解決的理由，另外還附帶地說明了這個同時並舉的三民主義所以合乎世界潮流，中國國情的原故。下面我們就要再進一步看看：

中國特殊情形，表現於事實上的，是些什麼？

第一：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農業經濟。

中國是農業的國家，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人是農人，在幾個僅有的都市，還可以看到一點工業經濟的氣息。但在整個人口比例中所佔的地位極其微小。此外餘下的，幾乎全屬於農業經濟的範圍。當然我們不否認，在中國整個社會中，還有不算很少的手工業和小商業經濟狀況的存在。然而我們要明白中國的手工業和小商業經濟，多數還是依附於農業經濟。沒有農業經濟，手工業經濟和小商業經濟的狀況，根本就不能存在。近年來中國農業經濟，因為受外來工業經濟的壓迫、造成空前的破產現象，而附帶地手工業經

濟和小商業經濟因之亦漸趨沒落，就是好的證明。所以我們可以籠統地把整個中國社會經濟基礎認為是農業經濟是不會錯的。但現在是工業經濟擴張的時代，工業經濟銳利龐大的勢力，正迅速向世界每一個角落裏侵入。一切保守的，落後的經濟狀況，因為本身弱點的衆多，必然地要被這新興的工業經濟所打破。中國的農業經濟自然免不了這個必然的厄運；所以自從閉關自保的狀況被打破以後，整個中國社會的經濟便發生了空前的擾動，擾動的結果，抵有漸漸趨向於沒落的一途。而附帶要說到的，就是中國農業經濟固然日趨沒落，但是中國的工業經濟却因為對外種種政治的，經濟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工業經濟發展上失了保障，而亦沒有若何長足的進步，中國在這種工業經濟沒有樹立，而農業經濟又趨向沒落的時候，中國社會的擾亂和不安，自屬意料中的事。這種混亂和不安，就是中國社會經濟上的主要情形。

第二：中國社會階級的基礎。

依據沈統先生在「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一書裏的的見，認為是封建階級（包括官僚，軍閥和地主）和小資產階級（農民，工匠，小商人，知識份子）。但這裏所謂小資產階級是指中國情形而言；這兩個階級讓我們仔細分析一下。

官僚軍閥和大地主，在中國祇是極少數的。北伐以後，所謂軍閥也者，事實上還存在的已更極少。所以就人口比例上言，並不重要。至於知識份子，因為中國教育落後，所以人數也極少，同樣在人口比例上，也不重要。再就要談到農民工人和小商人了，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的手工業經濟和小商業的經濟，在利害上與中國農業經濟是相同的；而我們再從中國人口比率上看，農民佔人口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無疑地中國社會階級主要的還是農人。既然手工業和小商業的經濟，在利害上和中國農業經濟有相當的關聯，所以我們又可以知道，中國大多數的手工業人和小商人與農民的利害是一樣。這點很重要，我們必須記住。這是中國社會階級甚確的主要情形。

第三：一般的貧苦。

前面已經談到，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農業經濟，但因受外來工業經濟的襲擊，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已日趨崩潰，而在另一方面，因為種種政治的經濟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新興的工業經濟本身失了保障，而亦沒有樹立。在這種新舊不接的情形下，社會的騷亂是不能免的。社會騷動的具體事實是什麼？是農村普遍的破產，農民生計的困難，是手工業的崩潰，小商業的崩潰，工人和商人廣眾的失業。此外，

再加上國內政治的不修明，天災人禍的侵害，苛捐雜稅的剝削，貧苦已經是中國社會的普遍現象。

第四：一般知識的低落。

國內一般經濟情形既是這樣，加以政治的不修明，教育事業當然談不到去發展，同時過去久處於滿清腐敗統制之下，更無教育之可言。這是一種可慮的現象，也是中國革命進行中最感棘手的一件事，我們不可不注意。

第五：民族意識的消失和團結力的缺乏。

「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按所謂亡國，是指亡於滿清。作者附註）是很文明的民族，很強盛的國家。所以常自稱為堂堂大國，聲明文物之邦，其他各國都是蠻夷，以為中國是居世界之中，所以叫自己的國家做中國，自稱大一統。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所謂萬國衣冠拜冕旒，這都是由於在中國沒有亡國以前，已漸由民族主義，而進於世界主義……中國幾千年來，總是實行平天下的主義」。由於這些先天的原因，再加上後天的久處於滿清種種愚民政策之下，中國民族意識已完全消失了。其次中國人民久處於農

經濟狀況之下，安土重遷，交通阻滯，人與人之間絕少有接觸的關係，所以就趨向於偏狹的地方觀念，家族主義。中山先生說中國人「祇有家誼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這種偏狹趨向的結果，就弄成中國人「一片散沙」的現象。這說明了中國團結力的缺乏。而這個團結力的缺乏，與天前述的一般知識低落的現象，都是中國革命進行受阻礙。

從前面的敘述裏，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所以積弱，所以落後，大部份的原因是經濟基礎腐敗所致。而要推究中國經濟之所以腐敗，則一方面是緣於滿清政府的敗壞毒則過處，一方面則是帝國主義種種侵害的原故。滿清政府保護了中國封建勢力的存在，阻礙了中國文化的進步。而帝國主義者摧毀了中國原有的農業經濟制度，束縛了中國新興工業經濟的發展。所以我們在把中國情形敘述了以後，不能不提出這一點來加以注意。現在，滿清是早推翻了，一切束羈我們去努力補救。而當前帝國主義的束縛，仍然沒有完全解脫。

前面曾經說明三民主義在理論上合於世界潮流與中國國情兩面。但是三民主義革命方法，是不是合於世界潮流和中國國情呢？首先，要談到的，是中國國民黨組織的成立的問題。凡是成功的革命事業，必須包含三個要素，一，主義，二，組織，三，武力。主義是原則，是目標；武力祇是暫時的工具，而組織乃

是一個永久的革命核心；它負有宣傳主義，推行主義和完成主義的使命。中國久處於異族統制之下，壓迫之下，民族意識消沉，民衆知識水準低落，民衆團結力薄弱，當然需要一個中心黨的組織，以推動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而完成其領導的使命。達到三民主義最後的目標。所以國民黨的組織，在中國是絕對需要的。有了一個國民黨作中心，三民主義革命的方略乃得逐步實現。

三民主義革命的方略是什麼？

民族方面，主張恢復民族固有精神（包括民族道德，民族智能），促進民族團結，同時學歐美之所長，而歸結到民族自決。民權方面，主張經過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建立一個權能分開的制度，而歸結到行使直接民權的全民政治。民生方面，主張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國營實業，用發達國家資本爲手段，而歸結到生產分配社會化的社會主義之實現。

這些不但是有計劃的，有步驟的革命方略，而且亦是合乎中國特殊國情的革命方略。我們前面曾經把中國特殊情形表現於事實上的說過。那末，我們就要進一步討論到何以這些方略是合於中國的特殊國情的理由：

前面敘述中國特殊的國情第五點，是一般民族意識的消失和民族團結力的缺乏。這是革命事業最初碰到的困難。而所謂恢復民族精神，促進民族團結等等，正是針對這些弱點而發的。一般昧於本國國情而妄談革命者，常有兩種錯誤：一種是拋了本身民族主義，而去大喊世界主義；一種是忽略了民族的團結，而亂造其不必要的階級意識。這兩種人都是極端錯誤的。中國民族是處於壓迫下的民族，在自己民族地位沒有恢復到和其他民族同等的地位以前，祇不過是一奴隸的民族；憑什麼資格去談世界主義？所以中山先生認世界主義「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要把我們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講世界主義」，反過來講，世界主義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就不能發達」。

前面敘述中國特殊國情第二點的時候，敘述到了中國的社會階級基礎是大多數的農民和少數的手工業人和小商人和極少數的封建階級；而手工業人和小商人的利害，與農民是一致的，所以歸到中國社會的階級代表基礎是農民。同時應該到整個的社會階級的利益，都在帝國主義侵略下被剝奪了。這裏可以知道整個中國是受壓迫的國家，整個民族都是被壓迫階級；所以從民族的單位立場去談階級都是對的；然而要在這個整個被壓迫的民族裏，故意硬行去分階級，指出哪些人是壓迫人的階級，哪些人是被壓迫這階級，鼓

動階級意識，製造內部階級鬥爭，這是錯誤的。我們倒不必否認，在中國社會構成中，有少數資產階級的存在；同時也的確有極少的一部份藉着殘餘的封建勢力的對於一部份農民有壓迫的行爲；但那是極少數的，不能夠代表一般。換言之，即階級意識在中國祇是妨礙大多數人利益的東西；民族的利益即是大多數人的利益。要爲民族利益而奮鬥，不需要爲極少數人的利益而奮鬥。我們祇可有國家意識，或者更進一步講，祇可有民族意識。資本主義國家裏，階級的意識可以幫助國家在歷史意義上的進步。在國勢衰微，生產落後的國家裏，階級的意識若超過國家意識。或者民族意識，則必致，散民族獨立運動的力量，而陷國家於不克振救的境地。結果少數人的擾亂，使全體回歸於盡。這豈不是一個絕大卻可怕的錯誤？

前面敘述中國特殊情形的第一點，敘述到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農業經濟，更談到這種保守的農業因爲受外來工業經濟的襲擊，而日趨於沒落，在另一方面，因爲受種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中國又並沒有建立起一個廣大堅強的新工業經濟的基礎，所以整個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已完全在崩潰的狀況中。而前面第二點又敘述到跟着經濟崩潰而來的。人民是一般的貧苦。那末根據這些情形，中國經濟實在有重新建立的需要。不過，按照中國客觀的情形和主觀的要求，則必須有它特殊的辦法。這個特殊的辦法，就是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和國營實業。

我們不否認，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辦法，首先必須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但在中國，不是去發達私人資本，而是去發達國家資本；實業不能由私人去經營，而應當由國家去經營。發達私人資本，即使成功，中國經濟問題，也並不能因而得到解決。私人資本發達的結果，頂多祇是重蹈歐美歷史道路的覆轍，由少數人操縱了資本，操縱了生產，大多數人仍然是窮；並且在私人資本壓榨之下，還會更窮。所以應當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使資本所得到的利益歸人民大眾所有。「使全國人民……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但發達資本必須振興實業；用國營實業的辦法，消極的可以防止私人資本的發生，積極的可以達到發達國家資本的目的。中國是貧的國家，缺乏大量資本，實業的振興固需要大量的資本，但決不能因為資本的缺乏，而就不去發展實業，先要等到資本發達了然後再去振興實業，那不但來不及，而且根本也就不可能。讓私人去經營實業，在中國普遍的「大貧」與「小貧」的情形下，就勢易發生這種矛盾。國營實業則不然。國營實業可以借助於外國資本；以外國資本作為振興實業的基金；這樣自然較私人去經營的為佳，而且亦更可靠。另一個意義上講，由國家統制一切的獨佔性的生產組長，衡量人民的需要而定各種生產品數額之多寡，以低廉的價格供給人民的消費。這樣一方面可以杜絕競爭，調節物價；另一方面資本產生的剩餘價值，因為是屬於國家的，則國家可以拿來作為建設社會，改良民生討儲種種等公益事

業。這些都是中國實際情形所需要，而且可以避免歐美資本主義歷史道路錯誤的流弊的辦法。

其次更要談到「平均地權」了。我們知道，土地是一切資本發生的根源，對民生有極重要的關聯；尤其是自工業革命以後，社會經濟生活日趨發達，隨着來的，是土地價值的增漲，地主無舉手之勞，坐獲厚利；於是土地便成了投機事業的對象；操縱壟斷的結果，社會上造成種種的不安。我們中國向來是以農立國，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人口是農人，土地是農人的生命線，所以對於土地問題，更不能不謀一個完善解決之道。中山先生認為土地問題能夠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決了一半了。「平均地權」，便是針對着這種問題而發的。中國的情況，還沒有像資本主義國家與那種大地主的存在，用不着用社會主義的辦法，以武力解決。中國祇需要「照價收稅」，「照價收買」和「漲價歸公」這種的辦法，即可以達到「平均地權」的目的。少數昧於國情，或者別有用心的人，談到中國民生問題，不是主張發達私人資本，便是主張壟斷鬥爭，打倒資本家，打倒大地主，用流血方式去求得共產的目的。這是錯誤的。前者主張發達私人資本的人，根本是沒看到歐美資本主義歷史道路的錯誤，而忘了覆轍重蹈的危險。但主張這種辦法的人，似乎還少。祇有後者一種人，不但見諸言論，並且還見諸實行；多少年來，和國民黨在國內曾經發生過不小的衝突。這的確是使我們感到痛心的一件事。我們不否認，共產主義是將來世界必然的趨勢；即是中山

先生的民生主義，亦主張共產。但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私人資本制度已經產生，大資本家已經普遍地存在，資本制度的流毒已夠劇烈；人民受資本制度的痛苦已經非祇一日；用和平的方法去實行共產，容易遭到強烈的反對，而不容易達到共產的目的；所以需要用階級鬥爭的方式，流血！拚命！去打倒資本家，大地主，以達到共產的目的。中國，前面已經敘述過，人民是普遍的貧的：項多不過是「大貴」與「小貧」之別；私人資本還沒發達，人民受到的，是貧窮的痛苦；不是受私人資本制度的痛苦；階級分化不明瞭；大家都是受帝國主義壓迫下的階級。從國內部立場上看，固然沒有所謂資本階級；亦沒有所謂被資本階級剝奪的階級；所以使用不著階級鬥爭的方式，去求共產制度的實現。反過來講，所謂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國營實業，最終的目的也是共產。這是按照中國國情的一個和平漸進的辦法：。消極地防止私人資本制度的發生；積極地要從一次革命中去完成社會革命，達到共產的目的。不然者，那即是洋革命；成功固然不到；相反地，反而阻礙了中國革命的進行，替中國造成許多沒有價值的紛爭。

前面敘述中國特殊國情的第四點，是一般知識的低落，同時並提及這一般知識低落的現象，是中國革命進行中，最感棘手的一件事。依照孫先生的意思，規定須要經過一段訓政時期。所謂訓政時期，是在革命進行中，爲了補救中國一般民衆知識低落的缺點，劃定一個期段，以便由政府扶掖民衆，訓練民衆，

使人民具有履行民權的能力，以達到一個全民政治的目的。這是一個合理而有效的辦法，爲中國國情所必需。但是少數昧于國情者，一談到中國政治，便容易發生兩種錯誤：一種忽略了中國民衆知識的低落，而亟圖急進，主張不要訓政時期，一下就開始實行憲政；一種認爲中國要避免歐美資產階級的虛僞民主政治的覆轍，則必須要以階級鬥爭去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這都是錯誤的。前者因爲不顧及中國國情，於是造成了民國初年的鉤心鬥角，買賣式的選舉，議會閥，官僚把持了廢除了共和，使中國有共和之名，而實在是「一團糟」，在中國近代政治史上，留下一頁可恥的記載。但，這種論調，這種事實，畢竟過去了，而且事實亦曾證明它的錯誤，這裏用不着多說。而後者是中國共產黨所主張，曾經惹起極大的糾紛，所以不得不說說：固然，歐美那種資產階級虛僞的民主政治，中國必須儘量避免；但中國絕不需要以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去避免在資本制度發達的國家裏，無產階級佔絕對多數，所以用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可以代表大多數或者竟可以說全體人民的意見。在中國資本落後的國家裏，大家都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的貧苦的人；既無。實本家，亦無所謂無產階級。更要在中國找出無產階級，那就盡是些無業游民。這些人素爲中國一般人所看不起；讓他們專政能有好的結果嗎？更能代表中國大多數人的意見嗎？而且他們根本也就不能專政提倡這種論調的人，無非別有用心，想利用他們以達到自己攫取政權的私意罷了。至於談到怎樣避免歐美那

種資產階級虛偽的民主政治的覆轍的問題，我認爲在中國有了三民主義革命理論的今天，這種思慮是多餘的。三民主義民權革命的方法，即是避免歐美那種資產階級虛偽的民主政治覆轍的最好方法。民權主義是包含了全民政治的理論，而三民主義民權革命的方法，更是符合全民政治理論，而且是一個有效的辦法。

以上各方面的敘述，說明了三民主義的革命，在方法上講，適於中國特殊的需要，最末我們不能不談到這個要——三民主義理論，方法爲原則的中國革命運動中，黨的問題。

三民主義革命的黨祇是一個國民黨

我們曾經說過中國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民族意識消沉，民衆知識水準低落，團結力薄弱，需要一個黨的組織，居於領導的地位，來推動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以達到三民主義革命偉大的目標。那末，既然中國革命需要依三民主義而進行，則領導中國革命的黨，必須能夠奉行三民主義，實踐三民主義，同時依照三民主義革命的步驟而革命的。這個黨就是中國國民黨。國民黨是三民主義創造人孫先生所組織，同時亦是最早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的黨。由它領導中國的革命，必然地，在理論上，在方法上，都能合乎三民主義的原則，適於中國的需要。國民黨最初的雛型爲興中會，後來幾經改組，才成爲現在的國民黨。

。從每次改組的宣言裏，都不難看得到它是一直都向着三民主義的目標而前進。這一點，我們現在不必贅述。只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國民黨是更具體地宣佈出革命的進行，完全依照三民主義的指示的。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裏說：「國民黨之主義維何？即 孫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義是已。本此主義以立政綱。吾人以爲救國之道，舍此莫由。國民革命之逐步進行，皆當循此原則……努力奮鬥，以求義之貫徹」。從這裏更證明了國民黨始終是完全合於三民主義，更進一步講，即是完全合於中國革命領導作用的要求的。所以領導中國革命的，必須是國民黨，要依各國的情形而論。一個國家有兩個以上黨派的很多。似乎同樣情形，中國應當可以容許第二黨或更多黨的存在。但中國畢竟有其特殊情形。從前面種種敘述裏，知道中國革命必須依照三民主義而進行。除開三民主義，任何方式的革命，都是不適於中國的，也即不是中國所需要的革命。別的黨派，倘依三民主義而革命的，則已經有了國民黨，大可不必另立門戶，徒然分散了革命領導統一的發揮性。倘不依三民主義而革命的，則中國除了三民主義以外，實在別的任何主義都不合於中國的需要，從而這個黨也就不合中國的需要，則又何必存在？徒然增加中國革命的困難，分散中國革命的力量。綜之，既然三民爲中國之必需，而國民黨又是依三民主義而革命的黨，則領導中國革命的黨必須定是國民黨。別的任何黨派，不問在理論上，在事實上，都沒有存在於中國的必要。

結 論

綜觀上面種種的敘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概念：即是中國的革命是應時代的要求；三民主義是應中國革命的需要；並且從理論上方法上各方面，說明了三民主義適合於中國的需要，而中國的革命，亦必須以三民主義為原則，中國革命才能前進，中國才有前途。從而又推知離開三民主義，任何的革命行動，都是違背中國國情，而且毀滅中國前途的。根據這些我們歸結到黨的問題。因為祇有中國國民黨，才是依三民主義而革命的。所以我們主張中國祇可容許一個黨——國民黨存在。別的任何黨，在中國都不需要，亦即中國應當不允許它們存在！這是很重要的一點。時至今日，在中國整個革命進行歷程最艱難的時候，種種事實上，都證明了中國必須只有一黨——國民黨來領導革命的進行；別的黨，在事實上表現的，祇是增加了革命的困難，分散了革命的力量，甚至有毀滅中國革命的危險。所以現在理論上提出了三民主義與中國革命，而歸結到一黨存在的問題，該不是無意義的事吧。

論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

雪琛

一、引言——三民主義的任務

總理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因為三民主義是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遠適存於世界。」又說：「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世界負一大責任、甚麼責任呢？現在列強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要學列強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先要決定一種政策，要扶弱濟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從這兩段話看來，已經明白表示出三民主義有兩大任務：第一是救中國，第二是救世界，並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祇顧自己國家的利益和前途。

不過，總理在民族主義第四講中又會這樣說：「我們要知道世界主義，是什麼地方發生出來呢？是從民族主義生出來的。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

就不能發達，由此便可知世界主義，實藏於民族主義之內。」同時又說：「世界主義……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該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方能講世界主義。」所以，三民主義並不是盲目的世界主義，其最迫切的任務還是救中國，必須先使中國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達之後，方能達成其第二任務——救世界。但是「救國即是建國」（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宣言，所以建設新中國，乃三民主義的主要任務。

三民主義爲着實行其建設新中國的任務，在歷史上可以觀察出有四個時期：

一、反對王朝時期 君主專制在中國，根深蒂固，有了幾千年的歷史，人民處在君權壓迫之下，已經習以爲常，滿清王朝入主中國後，專制尤更利害一層，人民簡直是在水深火熱中過日子，清時期，總理領導革命，千辛萬苦，但終把王朝推翻（是民族主義），民國建立（是民權主義），使三民主義達成了建設新中國第一期任務。

二、反對軍閥時期 三民主義雖推翻了王朝，建立了民國，但政權仍掌握在一般軍閥手中，這些軍閥，繼承專制時代的傳統思想，對內犧牲民衆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益，以保持其私人的地位，國民革命經過了討袁之役，護法之役，北伐之役，終於保住了民主共和打倒了北洋軍閥（是民權主義），完成了三

民主主義建設新中國的第二期任務。

三、反對割據時期 中國的封建割據局面，在滿清推翻之後，愈演愈烈，北伐雖告成功，但仍延展不已。經過了國民政府十餘年來的安撫討伐，如閩變、粵變、及最烈的共產黨圍剿等等，都於西安事變之後，使這種割據之局，一一掃除，確定了國家的統一（是民權主義），並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是民生主義），使三民主義完成建設新中國的第三期任務。

四、反對侵略時期 三民主義的最高要求，是達到平等的原則，其發展的結果，必然要反對侵略，在這時期所表現的最偉大的工作，就是今日的抗戰建國，抗戰是求民族的生存，也是建國所必經的途徑；建國就是建設新中國，在民族民權民生都得到理想的成功，就是這時期的目的達到，也就三民主義建設新中國的任務完全實現。

總之，三民主義的任務，在表面上雖然各時代有所不同，但在實際上却無二致，總是欲完成建設新中國的大業！

二、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的必要

所謂新中國，是與舊中國所對稱的，舊中國是孱弱的，封建的，貧困的；新中國則與之截然不同，它有特殊的發展與光明的前途，爲我們全國上下所希望而境域，至於三民主義新中國，則是別於其他方式的新中國而言，三民主義與新中國有密切的關係，三民主義要建設新中國，新中國的建設亦非三民主義不可，或者可以直接說，新中國的產生就是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並沒有其他方式的新中國，三民主義與新中國是兩位一體，永遠分離不開。

抗戰建國綱領第一條規定：「確定三民主義暨 總理遺教爲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第四章「建國之信仰」上也說：「救國與建國，義本一貫，事無二致，中國建國之最高原則，厥爲 總理孫先生所手創之三民主義。」所以三民主義是新中國建設的準則，新中國的建設必須依照三民主義而前進，以期達到「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五五憲草第一條）的最高目的。

三民主義爲新中國建設的準則，並不是抗戰以後才有，實爲民國以來一貫的主張，我們每天所高唱的國歌中就有這麼幾句：「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建大同。」建國大綱第一條也規定：「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

所以在事實方面，三民主義是新中國建設的準則，且如引言中所述三民主義爲着完成建設新中國的任

務，在歷史上有明顯的表示，有四個時期——反對王朝時期，反對軍閥時期，反對割據時期，反對侵略時期；新中國的建設已走上了三民主義的途徑，絕對不能變為第二方向，三民主義新中國實有建設的必要了。

在事實方面更有一點可以證明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的必要，在今日中國除開三民主義以外，並沒有其它主義，其他主義者皆已變為三民主義者，其他主義者如主張無政府主義的，始終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在宣傳上和組織上，均未有明白的活動；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在最初加入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繼後雖宣告分離，現在又要求加入，他們明白宣言「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願為其澈底實現而奮鬥；國家主義者和國社主義者，均一致表明他們的主張合於三民主義。既然沒有其他主義者，當然新中國的建設，有以三民主義為必要了。

我們再從理論方面研究，更有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的必要，因為三民主義是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者合起來的一個主義，並不是獨立分開的，是以一次革命為根據，最適於中國歷史進化法則。

總理在「軍人精神教育」中說：「歐洲當二百年前為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來為政治革命時期；現今則為社會革命時期。此三者一線相承，故須同時倡導三民主義，」似此足見三民主義是要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合而為一個主義，而把種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合而為一次革命。

三民主義爲什麼主張一次革命？總理在「中國前途問題」講演中說：「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費經營，至於着手時候，却是同民族革命並行，我們推翻滿清政府，從驅逐敵人那一方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方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又在「孫文學說」中說：「倫敦脫險後，則曾留歐洲……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從該國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願第一勞永逸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所云種族革命即是民族革命，從這兩段話中，可見三民主義所以要一次革命，就是在使中國，可與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舉其功於一役，使中國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問題同時解決。

進而言之，世界上的歷史進化法則，共分兩條道路，一是一般的，一是特殊的，一般的就是由民族革命而政治革命而社會革命，分成三個階段而實行，可以舉歐洲爲代表；特殊的就是將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三者一次實行，並不分成階段，這就是中國，歐洲因爲工業革命很早，資本階級成立，所以待打倒封建專制的君主制度以後，人民雖求得了政治的平等，但還要打倒資本家，實行階級鬥爭，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我們中國則因久存於閉關自守的封建社會，工業沒有發達，資本家沒有產生，勞資階級的對立尙不嚴重，所以鬥爭流血的社會革命，在中國根本用不着，中國的社會革命必須依照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

而實現，因之，一般的歷史進化法則，可以適用於歐洲，而決不能適用於中國；中國的歷史進化法則是特殊的，是合乎三民主義的，三民主義的一次革命，既適合於中國的歷史進化法則，與中國國情相適合，那麼新中國的建設，當然有以三民主義的必要。

所以在事實方面和理論方面，都有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的必要，將來新中國的出現，正是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出現。

三、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的程序

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有一定的程序，建國大綱第五條規定得很明白：「建設之程序，分爲三期：一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三曰憲政時期。」這三個時期，是總理所手訂，國民政府因之而實行，爲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的必經途徑，亦爲三民主義新中國成功的康莊大道！

軍政時期，是建國之始期，依據大綱第六條：「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方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這一期的特點，在「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這一期的任務，在「一面以兵力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

之人心」；而這一期的目的，在「促進全國之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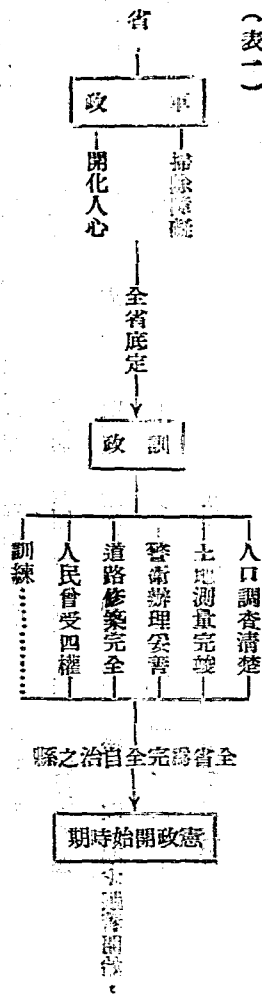
訓政時期，爲建國之中期，依據大綱第七條：「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爲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又第八條：「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考試合格之人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民衆縱橫之道路修築完成，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實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定一縣之法律，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這一期地任務，在協助人民籌備自治；而這一期的目的，在「達成完全自治之縣，以走上憲政的階級」。

憲政時期，爲建國成功之時期，依據建國大綱第二十五條：「憲法頒布之日，即爲憲政告成之時，而全國國民則依據憲法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之後，而授權於民選之政府，是爲建國大功告成。」又第二十四條：「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則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複決權，」這一期的特點，在「憲法頒佈，憲政告成」；這一期的任務，在「全國國民依據憲法而行全國大選舉，組織民選的政府」；而這一期的目的，在建國大業完全成功。

不過，在訓政時期到憲政時的中間，有一個過渡時期，曰「憲政開始時期」。建國大綱第十六條：「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於完成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爲本省自治之監督，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長受中央之指揮。」又十七條：「在此時期（憲政開始時期），中央與省之權限，採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所以這個時期，非常重要，假若沒有這個時期，則必一俟訓政完成，即籌備憲法實行憲政，那麼中央與地方責任不明，議決完成之事務不克完成，行政上也無法聯成一氣，而憲法不能實行，憲政徒負虛名。在廿八年度憲政運動討論激烈之時，對於這一點注意者甚少，實屬大錯！

在前面關於建國三程序的敘述中，吾人因其各有的特點與任務觀之，則知軍政訓政憲政三期的實施，有縱橫兩方面的意義，在縱的方面，以一省的實施爲準則，三期實是一線相承，絕對不能顛倒，不能超越，且不能並存，於某個省分說起來，首先降臨的是軍政時期，等到全省底定之後，訓政時期才跟着開始，而當訓政時期達到了全省各縣都完成自治時，或是訓政時期完成之後，纔是憲政開始之時，在這縱的實施方面，軍政、訓政、憲政三期的一線相承，可以按照建國大綱之真精神，列出下表，以便得更明確的一點印象：（見附錄：三民主義憲政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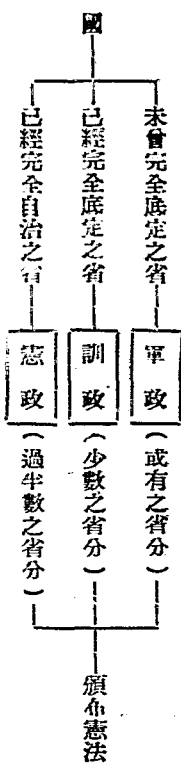
(表一)



在橫的方面，是以全國的實施而言，軍政、訓政、憲政三期不一定要機械的一線相承，可以同時並進，同時並存，例如甲省已經完全底定，開始訓政了，可是乙省因為某種原因，還要待軍政時期去掃除障礙，開化人心，因為軍政時期的底定省份時間不同，而訓政時期的訓練民衆成績又有遲速，所以當甲省已入憲政開始時期，而乙省還滯留在訓政時期，甚至還未脫離軍政時期。建國大綱第二十二條規定：「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佈之一」。這顯而易見的，當憲法頒佈之時，必然還有少數省分滯留於訓政時期；或是軍政時期的，除非是全國各省的完全自治在同時完成，那纔是純粹的例外。

在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開幕時，蔣委員長說：「現在爲抗戰要實行軍政，爲抗戰要實行訓政。」又說：「促成憲政和實行訓政，不但不相妨礙，而且是相需相成，所以爲憲政工作，不僅在訓政時期中要積極進行，而憲政也不一定需要訓政完全結束之日纔開始」，從這兩段話裏，更加可以表明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時期是可以同時並存的，在一國之中並不必一線相承，今列爲下表，就更加清楚：

(表二)



在這三期中，必須建設之工作，又可分爲三種。總理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其次爲民權，其三爲民族」。這三種必須建設的工作，是沒有實行的先後程序無論在軍政、訓政、或憲政三期，實行其一，則必同時實行其他二端，至於所謂「建設之首要在民生」者，不過着重在民生，民生建設的工作最爲迫切而已。「民生」建設，就是經濟建設，「民權」建設，就是政治建設，「民族」建設，就是國防建設。這

三種建設，必須一貫的實行，同時的實現，相輔相成，不能專向於一方面，而忽略其他二方面。

不過，三民主義的實踐，當然有階段性與側重性，在今日抗戰嚴重的階段中，誰也不能否認「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際則，應以民族主義爲「主」，所以「國防建設」爲「第一」，而「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應爲「從」，以爲完成國防建設的「手段」，這樣則一切建設工作有了重心，一切建設工作有了領導，新中國建設的目的必定達到！

四、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的工作

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是我們共同的要求，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的實現，是我們共同的希望，因此，我們對於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如何進行，以達到真正實行的目的，非加以研究不可，換言之，即對於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的工作，應加以研討。

關於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的工作，有下列數點：

(一)完成反侵略 民族主義的目的，在求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因此，民族主義發展的必然對象，就是帝國主義，要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民族主義的目的方可達到，同

時，因為帝國主義，有打倒，且日益壓迫，致使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也無法實施，國家岌岌可危，惶惶不遑終日。

要打倒帝國主義，使中國免於其壓迫，就在完成反侵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自鴉片一戰一直到抗戰開始，有百餘年的歷史，其間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割地賠款，由他們任意宰割，毫無正義之可言。

當然國際間的正義，是以利害爲前提，在利害之外，絕無真正主持正義者，正義的呼聲，要自己來吶喊；正義的實現，要自己才可以爭取，自七七抗戰以來，仰賴我最高領袖之領導有方，以不變應萬變，抗戰到底，不屈不撓，因此才使敵人泥足愈陷愈深，奠定我國最後勝利的基礎。在今日世界上反侵略陣線打成一片，國際情勢對我十分有利，我們可以說，祇有「侵略者」消滅，祇有日本帝國主義消滅，中國民族即得解放，不平等條約一律廢止，不但國際地位達到平等要求，即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也必得以建設，得以完成。

(二)實地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是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的最重要的工作，要實現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非實行地方自治不可，所謂地方自治，即是分縣自治，以縣爲自治的單位（建國大綱第十八條），而推行自治的工作。

因爲「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吏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吏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大綱第九條），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舉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預政事」，（大綱第十四條）所以地方自治的實施，其目的就在實現民權主義。

又大綱第十一條規定：「土地之歲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地爲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十二條規定：「各縣之天然富源，與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之力不能發展與興辦而須外資乃能經營者，當由中央政府爲之協助，而所獲之純利，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占其半」。各地方自治之縣，皆須極力以發展其民生，其實施之目的，又在使民生主義達到實現的目的。

至於如何實行地方自治？建國大綱第八條規定：「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的訓練，而完舉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一總理在地方自治開始實行途中，更明白訂定六事：（一）清戶口，（二）立農綱，（三）定地類，（四）修道路，（五）舉業種，（六）設學校。

關於地方自治之推行，政府當局有許多周密之計劃，二十六年九月所公佈之新縣制，更是具體之辦法，地方自治完成，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才可以真正的達到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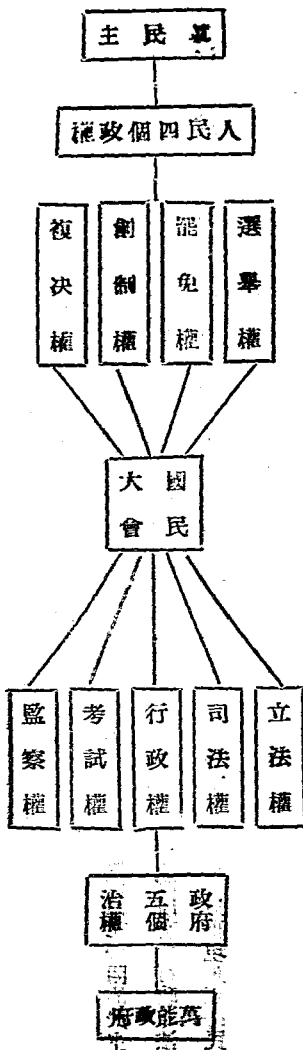
(三)實行權能分開的民主制 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在民權主義方面，應該實行權能分開的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是羅遜所獨創，主張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個政權，政府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個治權，政權叫做「權」，治權叫做「能」，「權」與「能」劃分清楚，以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而政府可以發揮無窮的能力，以收無窮的效果。

總理說：「歐美對於民權問題的研究，還沒有澈底，因為不澈底，日日相衝突。」又說：「中國有了強有力的政府之後，我們就不要像歐洲之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因為在我們的計劃中，想造成新國家，是要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政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機關以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見民權主義第六講）。所以，權能分開的民主制的特點，就是「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管理國事」，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免除代表民主制的缺點，而取其所長，同時也免除直接民主制的缺點，而取得其長處。

總理在民權主義第六講中有一段話，更明白地說出這種權能分開民主制的優點。他說：「政府種人民做事，要有五個權，就是要有五種工作，要分成五個門徑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動靜，要有四個權，就是要有四個節制，要分成四方面來管理政府，政府有了這樣的能力，有了這樣的工作門徑，才可以發出無限的威力，才是萬能政府，人民有了這樣大的權力，有了這樣多的節制，便不怕政府到了萬能，沒有力量來管理，政府的一動一靜，人民隨時都是可以指揮的。」

我們對這種權能分開的民主制，可以列成下表：

(表三)



權。分開的民主制，是民權主義的精神，也即是五權憲法的要義，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非如此不可！

(四)發達生產 發達生產是民生主義的基本工作，要使民生主義實現，必自發達生產始，同時新中國的建設完成，亦惟發達生產是賴。總理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民生主義的要務，就在「經濟建設」，而經濟建設的事項，照着建國大綱第二條規定：「對於人民的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鑄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房屋，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爲着要完成這些任務，當然非發達生產不可！

發達生產也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所必需，因為民族主義要使中國解放，要得抗戰勝利，需要無窮的物質力量；而這種物質力量，必須發達生產以得，民權主義要培養地方自治，而普及教育的經濟條件，與發達生產就有密切關係，發達生產的實行方法，就是國營實業，國營實業的結果，國家資本必然發達，私人資本在此時雖然也受政府的提倡與保護，仍會日益發達起來，但因其發達的程度不及國家資本之快而高，結果依照大資本吸收小資本的法則，自然發生極大的困難，而受到節制，所以國營實業無形中實行了節制

實本的工作，使資本不致集中在少數個人，而集中於國家，完成民生主義的第一手段。

同時，國家資本發達之時，可以走入農村，實行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並且實行合作社，以使土地所有權的商業化的繁盛停止，直接間接都有助於平均地權的發展，使民生主義的第二手段完成。

(五) 提倡工業建設 工業建設本是發達生產的一個部門，但是特別提出來，在於特別重要，我國是一個以農立國有數千年來歷史的國家，工業從來不注意，雖然有時候也有些工業建設的事實，但都是不足道，毫無成績可言，因之，工業比、上別人更遠，國防隨之落後，以不安全不鞏固的國防，所以受不起敵人的襲擊，抗戰以來，蒙受了極大的損失，河山爲之破碎，同胞爲之屠殺，這一種血的教訓，誰也不能忘記！

工業建設發達，我們則不必依賴他人，對於國防上所必需的東西，在物質方面都可以供給。因重工業的發達，我們就有機器，有槍砲，有飛機，有兵器，……一切軍事國防所必需的都可以配備充足，因輕工業的發達，我們就有毛織品，絲織品，……等等，足以抵制舶來品，以圖貿易，以定金融。

蔣委員長說：「建國必須建設國防絕對安全。要有絕對安全的國防，舍工業建設外別無他法，所以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提倡工業建設也是一個重要方案，因工業建設完成，新中國的建設，可以完成。」

關於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的工作，當然需要詳細規劃，窮盡五端，不過其原則而已，也可說是最重
要的原則而已。

五、結論——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展望

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三十餘年來在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下，積極地推動其工作，在今日是一面抗戰，一面建國，抗戰爲的也是建國，建國可隨抗戰勝利而完成。

抗戰是反侵略的必經途徑，也是反侵略的必要工作，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第一要務就是完成反侵略，抗戰勝利，反侵略即可告完成，因爲我們四年半的抗戰，是反侵略的先鋒，反侵略的國家，如英美蘇聯等，都是我國的盟友，我們唯一的敵人，就是日本強盜，日本強盜消滅，即我們抗戰勝利，也即反侵略完成，今日日本強盜已闖下了瀾天大禍，掀動世界大戰，在太平洋自陷深淵，將來必自沉溺，由於中英蘇等反侵略同盟的制裁，豈可獲援？所以抗戰是一定勝利，反侵略一定完成。

在抗戰中，我們政府一面成立參政會，一面積極推行新縣制，要趕快完成地方自治，這是在培植全國人民的參政，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統籌完成地方自治，實行權配分開的民主制，這點點都很快要達到

目的了。

至於發達生產方面，今日國營實業的事務特多，無論那一省都有國營工廠，（所謂國營，就是用公家的經濟來經營，故省營縣營……皆在其內）國營商場，而西南諸省的實業，國營更差不多佔了大多數，所以發達生產已在努力進行中，功效且有相當顯著，提倡工業建設，在今日已不成爲問題，各地工廠之數目，無論是重工業或輕工業，數目上大有增加，質量上亦特有進步。

既是反侵略可以完成，地方自治與權能分開的民主制可以實現，發達生產與工業建設已在努力推進，那末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其成功之期必不在遠，其前途有無限的光明！

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完成，其光明的前途，真是令人難於筆述，令人愉快至極，但由其必然表現的事實，則可分爲下列三點：

（一）民族獨立 民族獨立即是三民主義所要求的「國際地位平等」。三民主義新中國就是一個「國際地位平等」的國家，在抗戰勝利後，反侵略即告完成，而我中華民族即不受世界上任何列強的壓迫，當然獨立於地球之上，在國際上完全平等互惠的原則與各友邦交往，同際地位完全平等，以前所有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必定取消，領土與主權完全恢復，獨立平等。並且，我們的國防絕對安全，自己民族已經獨立。

，進一步可以援助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使其同樣達到獨立平等的國際地位，以完成民族主義的最後一著。

(二)民權普遍 民權普遍就是三民主義所要求的政治地位平等。三民主義新中國就是一個「政治地位平等」的國家，在地方自治完成，權能分開的民主制實現以後，我國政治即上軌道，全國人民都有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都可以管理政府，使政府大權不墜落於少數特殊階級的手中，以行其專制與暴虐，我們三民主義新中國的政權，是人人平等——並沒有財產之分，也沒有階級之分，民權以普遍為要求，以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

(三)民生發展：民生發展即是三民主義所要求的「經濟地位平等」，三民主義新中國，在發達生產的結果下，經濟建設即可告成，全國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問題都可獲得解決，不致有貧苦孱弱的現象。同時因為國家資本發達，私人資本不致膨脹，社會上不會有勞資階級對立的存在，民生問題必告解決，在經濟地位上全國人民都是平等的。

三民主義新中國是我們希望的境域，是我們幸福的樂園，是民族平等民權普遍民生發展的國家。我們要使他迅速建設完成，要為着她的建設完成而努力！

卅一年一月十日脫稿於中正大學

怎樣完成 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

學壽松

(甲)引言——基本認識

(一)三民主義為建設新中國之必需。大凡民族的盛衰興亡，國家的富貧強弱，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要問這個民族國家有沒有立國的根柢精神；用現代話來說，就是要問這個民族國家有沒有立國的特定主義。在世界歷史中，斷沒有缺乏這種根本精神與特定主義的民族國家還能屹立長存的，也斷沒有富有這種根本精神與特定主義的民族國家却會流於消滅的。中國立國的根本精神與特定主義是甚麼呢？在中華民國紀元以前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的正統倫理政治思想；在中華民國紀元以後，就是總理所創立的三民主義。這個主義完全是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思想，同時參酌中國國情，擷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治制度的精華，再加以總理自己獨自見到的真理所融鑄而成的一個體系。故三民主義在世界各種主義中，要算最精博最進步。他的空備性，實在空前前的。中國用他做立國精神，並決心力行而實現之。此不特中華民族獨自享有他的利益，即全世界的弱小民族也能得他幫助與提拔。因為他是我們救國濟世的柱石。

，所以五五憲法開宗明義的第一條就規定「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今日我們要在抗倭戰爭中完成新國家的建設，必須以三民主義爲指導原理。故三民主義之成爲建國信仰，自有其必然性，並且也是十分需要的。

（貳）「三民主義新中國」正在建設中 自辛亥革命成功後，滿清專制推翻，中華民國建立。從那時候起，中國國民黨領導全國人民，從事於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神聖工作。不幸新生的中華民國初年中，政治基礎尙未鞏固，外患國內亂而頻仍，軍閥藉外力而猖獗。以致整個國家民族，飄蕩於落濤駭浪之中。幸而國民黨繼續努力，奮鬥到底，使國家民族得以存在。總理逝世，遺囑革命導師，全國上下惶恐。總裁繼起，承志遺事，期完成革命大業。他統率黃埔勁旅，揮戈北伐，聲勢浩大，所向披靡。卒於三年之內，打倒北洋軍閥，鞏固國家的基礎。軍政工作既然告成，訓政大業即已同時開始。各級政府均能勵精圖治，全國人民亦知奮勉自新，於是整個國家遂向著富強的光明大道邁進！其間爲攘外而安內，爲準備而忍耐，豈政府之本意？實爲建設新國家着想！而推行新生活運動以強化國民精神，實施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改善國民生活，勵行保甲制度以培養國民武力者，尤爲建國的基要素。凡此均可證明「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很早就在積極進行中。但內外多艱，一時未收宏效。欲謀建國工作之徹底完成，尙須稍待

時日耳。

（參）抗戰期間加速完成「三民主義新中國」之建設的重要性。

最近十年來，正當我國積極進行「三民主義新中國」之建設的時候，東隣倭寇視中國之富強爲其眼中釘，對於我國的一切建設，力謀破壞，每每在我國通商口岸，妄造虛謠，藉故生事。民國二十四年南京的「基本步驟事件」便是一個最顯著的證明。在歷次中日外交糾紛的交涉中，我國政府總是儘量容忍，無奈倭野心勃勃，竟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藉端發動蘆溝橋事變。政府洞燭其奸，深知和平已至絕望時期，犧牲已至最後關頭，遂下全面抗戰的決心；同時動員全國軍民，展開民族自衛的神聖戰爭。吾人深知此次全面抗戰是在排除建國工作的障礙以建設新的國家。故目前建國必須抗敵；抗敵必須建國，二者相輔而行。惟有從建國方略上抗敵，乃能換取抗敵的最後勝利；惟有從抗敵戰爭中建國，乃能把建國的圓滿成功。今日抗戰方酣，全國上下已趨一致，各種力量亦已集中，大家共同在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政府——國民政府、一個領袖——蔣委員長約統一指揮下，協力抵抗一個敵人——東洋軍閥。藉此千載一時之良機，舉行建國工作，只有便利，斷無阻障，事半功倍，克奏膚功。此即在抗戰期間加速完成「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的重要性也。

(乙) 怎樣完成「民族主義的國家建設」？

在「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過程中，「民族主義的國家建設」是第一步工作。它的最後目的是在實現民族獨立——集中全民族的力量，把國家和民族的地位鞏固起來，排除一切的侵略壓迫，造成完全自由的國家。至於應該怎樣完成「民族主義的國家建設」之問題，讓我們分兩部來討論。

(壹)「民族主義的國家建設」之真理根據 二十世紀是科學昌明的時代，凡百事業必須以真理為根據才有實現的可能。否則就是烏托邦，儘管有美妙的理想，永遠不能付諸實現。況且我們要幹國家建設的艱鉅工作，更應該事事合真理，件件有根據，然後民族主義的國家建設才有實現的可能，才能達成民族獨立的最後目的。

(一)民族主義發生的時代背景與特殊任務。一件事情的發生，必有其時代背景。民族主義亦然。她有兩重時代背景。據此民族主義就負有完成三個特殊任務的責任。

兩重時代背景：(1)民族地位危險的刺激。中國民族在滿洲與西洋雙重壓迫下，大有淪喪的危險。原來明末以後，四百餘年之間，中國皆為滿族所支配，而自一八四〇的年鴉片戰爭後，列強紛紛向中國插鉅

商品，攫取原料，並且大量投資。在此場合之下，國民經濟固受其害，而民族的獨立性也因之破壞，中國簡直是『次殖民地』，連殖民地都不如了。民族的地位這樣危險，怎叫愛國志士如 總理者不圖革命救國呢？(2)日本總領事強烈的鼓勵。當時世界上的弱小民族，爲挽救危亡奮起革命卒能轉弱爲強達成解放獨立者，例證頗多，當前的一個就是日本的復興，日本原是東亞的小小島國，十九世紀中葉，關稅不能自主，司法不能獨立，且內有藩侯割據，國勢岌岌可危，乃彼邦志士起而奔走呼號，倡言尊王攘夷，勵行維新要政。果然數年之後，政治上完全統一，外交上又能節節勝利。並進而稱霸東亞，競勝於世界列強之林。總理曾稱述此事，引爲中國亦可復興之證明，而自信益堅。遂挺身而出鼓動革命風潮，民族主義乃應運而生。

三大特殊任務：(1)中國民族自求解放。要求得中國民族的真正解放，除了傾覆滿清專制之外，還要打破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只有把這種種民族獨立的障礙完全消滅，中國民族才有自強的可能和發展的機會。(2)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我們在反對帝國主義之革命戰爭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使國內各民族同享和平安樂的自由生活，而融合成爲一個大中華民族，以爲構成強固的民族國家的基礎。(3)世界各民族一齊獨立。我們不單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求得本國民族的自

並舉。這更無從思考「國家」這一重大問題。要緊要決定一種新基礎與政策。對於弱小民族要更緊要；對於世界帝國主義要死抵抗，必須把帝國主義完全消滅，才能用固有道德和平做基礎，去完成大同之治。

(二)實行民族主義的基本方針。民族主義的時代背景和特殊任務，表明了民族主義確有實行的必要。但是實行的基本方針是什麼呢？我們從總理遺教中，可以找到最重要的三點：(1)利用中國固有團體結成鞏固的民族。(2)首先使全國民族明瞭中國民族現在地位的危險，而促成民族自覺，然後利用中國社會上固有的組織團體，予以改革，使組織成堅強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基礎。(3)恢復中國的固有道德。道在奠定自有團體的基礎，是極重要。這固有道德，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我們不贊同唯心論者的主張，可是我們却不能不承認忠孝仁愛也是人類生活中的一部份。我們要求中國民族的生命永久繼續，就要把中國民族固有的精神發揚起來。(4)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這是加強自己幫助他人之所必需。相應站在平等立場，以互愛互助為原則，以共在共榮為依歸，絕不能失其所守，而盲目地追隨他國，如共產黨之所言所行。

(貳)民族主義的國家建設之徹底實踐 「民族主義的國家建設」，不僅要有高深的理論做根據，並且

特別着意實際的執行，澈底的實踐。近年以來，我政府當局，格遵 總理關於民族主義的訓示，提出了許多方案，分別予以實施。最重要的有如下列幾點。

(一)促進「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的主要目的，是在轉移風氣、發展德性、掃除社會上腐敗的惡習，培養社會上活潑的生機，使國民的一切行動都合乎整齊、清潔、簡樸、勤勞、迅速、確實的標準。因此，這種運動可以革新我們的精神，大有助於國家建設。我們全國同胞，必須各自奮勉，以最大的恆心與努力來求其實現。

(二)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國民精神動員的主要目的，是在發動全國國民的意識思想智慧等，成全國民的整個精神，以發揮力量，運用物質，而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在實施綱領中，明白規定以三民主義為建國信仰，並須改正醉生夢死的生活，養成奮發蓬勃的朝氣，革除苟且貪生的習慣，打破自私自利的企圖，糾正紛歧錯雜的思想。全國黨政軍學各界人員，應負責領導以國民月會，遵守國民公約。

(三)勵行「保甲制度」。我國昔時組訓民衆，就用「保甲制度」，至宋王安石而大備。現在我政府繼續採用這個制度，並斟酌情形而改善之。現在全國各地，都已切實奉行。這是普遍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並使民衆有組織，社會軍警化之一舉而數得的辦法，有使其十分嚴密的必要。

（四）舉辦「軍政幹部訓練班」。黃埔、重慶、瀘州、成都的軍事訓練班和重慶將校訓練班、重慶軍官訓練班等，都有重大的意義。黃埔軍校的創立，其目的在訓練革命的幹部人才，樹立革命的基本力量，完成北伐的使命。廬山和峨嵋軍事訓練團的目的就在訓練身心健全的軍官，以剿滅匪類完成統一的使命。重慶中央訓練團，在訓練全國黨政教等方面的中級幹部，並指導各省訓練團，以加強工作效能，完成抗戰建國的使命。

（五）貫徹「自助自求的外交政策」。總裁說：「總理在民權主義第五講中，所懇切昭示吾人者，則以爲可能滅亡我中國者，不止一國。當吾人自暴自棄而不能自立自強時，則今日之友，皆成爲明日之敵，反之我全國上下，一心一德，自立自強則今日之敵，未始不可成爲明日之友。古人所謂自助助人助與自求多福者，皆此理也。吾人在此國難嚴重之際，唯有努力於自助自救」。這是十分正確的。以後總裁說的「以不變應萬變」，就是以此種自助自求的外交政策應付千變萬化的國際形勢的意思。我們憑着這種外交政策，打破了依附着風雨外交，培養了靜待命運節節外交，更能掃蕩了投機搖擺的外交。現在我們有合理的外交政策了。

（六）爭取抗倭戰爭的最後勝利。民族主義的革命工作，可分爲三個步驟：推翻滿清專制，建立中華民國

國，是第一步的工作；消滅封建軍閥，鞏固民主政治，是第二步的工作；抵抗日本侵略，完成民族復興，是第三步的工作。現在第一步工作已經全部完成，第二步工作也完成了十分之九，只有第三步工作還在進行中，抗戰勝利，第三步的工作就完成。現在勝利的曙光已現，只要我全國上下，再記念苦耐勞，努力硬幹下去，勝利不成問題。這就是民族主義的完全實現。

(七)融合組織大中華民族。在民族主義的國家建設之全部工作中，融合組成大中華民族，建立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是一樁比較遙遠而最爲重要的工作。我們知道構成民族的因素，不外語言文字、血統、生活、宗教、風俗習慣諸端。我們要融合組成大中華民族，就應該把各組成的民族的語言文字、血統、生活、宗教、風俗習慣完全統一起來，消除彼此的歧異，加強共同的意識。我們實現的具體方法，首須注意語言及文字的統一。語言文字爲溝通思想感情及共同生活的媒介，是民族文化的基石。必須推行國語運動，以收統一之功。此外即須採取如次辦法：一、發展邊疆交通，使內地人民與邊疆人民互相來往，雜居通婚；二、發展邊疆教育，以提高文化，改革陋習惡風；三、發展邊疆社會事業，如社會救濟及醫院等，以增強其向心力；四、發展邊疆生產，以改良其生活，使得我們的幫助的實利。這是最重要的辦法。

科學方法——實行計劃訓練，因爲民族主義有兩重時代背景，就必有三大特殊任務；爲要實踐「民族

主義的國家建設」，訂有三個基本方略；根據這三個基本方略，推進多種的建國運動；實行新生活以改造平時的國民精神；推進國民精神總動員以改造戰時的國民精神；勵行保甲制度以培養國民武力；舉辦軍政幹部訓練以創造革命力量；實現自主外交以博取國際援助；爭取抗戰勝利以排除民族團結障礙；融合組成大中華民族，為促進世界大同的準備。凡此種種，都屬教訓與鍛鍊的工作範疇。我們國民在平時既然改造了精神，一到戰時，國民精神就可發揮偉大的力量，加以培養了雄偉的民衆武力，創造了強固的革命武力，以此忠勇奮備的將士，參加神聖抗倭的戰爭，是先明恥而後教戰，士氣必倍增旺盛，又能得着國際的援助，藉供抗戰的急需，那末最後勝規，必屬於我無疑了。抗戰既得勝利，在中國以內的其他帝國主義，將必退還已得權利，於是我國各民族間再無挑撥離間的惡魔；而大中華民族的融合，亦必迅速實現。像這樣的教訓與鍛鍊，是有步驟的訓練，有計劃的訓練，有目的的訓練，這就是「計劃訓練」。從實踐「民族主義的國家建設」的方法上來說，這種「計劃訓練」就是一種科學方法。

必然結果——促進中國國際地位的平等。民族主義一經澈底實踐之後，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共享和平安樂的幸福，同時以民族自決的精神宣揚於世界，並進而領導世界上各弱小民族，進行民族解放戰爭，務使世界上的優秀民族能善導弱各民族漸漸進步，結果必同躋於富強康樂之域。故促進中國國際地位的平

等，是實現民權主義的必然結果。中國經過這種積極的建設之後，「民族主義的國家建設」，就能徹底完成。

(丙) 怎樣完成「民權主義的國家建設」？

在「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過程中，「民權主義的國家建設」是第二步工作。它的最後目的是實現民權平等——要使中國國民都能夠享受充分的民權，先要由國民全體共同設法解決民生需要和民族解放的問題，來奠定民權的基礎。然後全國人民，才有餘力參加政治活動，練習行使四權，進而實際執行政權，管理國家大事，得到真正的平等，現在我們要討論怎樣完成「民權主義的國家建設」問題，應該分理論實踐兩部分來觀察。

(壹)、「民權主義的國家建設」之原理根據。現在要進行「民權主義的國家建設」自有牠的理論和事實根據。從下面的討論中，可以完全表現出來。

(一)民權主義發生的時代背景與特殊任務 民權主義的發生，有兩重時代背景，根據這個時代背景，

夏曉華《新民主主義研究》

而最爲重要者：(1) 清廷雖然在民權的反抗，明亡以後的兩百多年中，猶清統治中國，在政治方面不准人民過問，他們抱着「寧遠雖安不給生威」的觀念，竟是一虎成變法」一類的君王立憲運動，也要數加阻止，使保皇黨廢帝者的，也被迫流亡海外。這等專制而政治特種，造成了中華兒女根本推翻滿清專制勇立共和政府的思想。(2) 歐美民權思想的發達，自西曆十七世紀以來，民權日益發達，由歐而美，形成一種世界潮流。中國受其影響應力求適應。否則在吾人後，沒有進步可言。這就發生了民權主義的時代背景，那末根據時代背景而負有的特殊任務，又是甚麼？這裏，且讓我們討論並讚頌 總理在政治學上兩個重要的發明。

二大特殊任務：(1) 創造「機能區分」的最新政治，機能區分的民主制，爲 總理所發明，主張政府有治權，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人民有政權，即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府有了五種治權，就像一架新的機器，是高能的；人民有了四種政權，就像一位幹練的工程師，可以管理萬能的機器，如此，政府與人民的力量，保持平衡，國家的政治可走上正軌，民權問題亦可得真正合理的解決了。這是政治學上的大貢獻。(2) 確立「均權制度」的理想政體。歐美現行政體有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和地方分權的聯邦制兩種，各有利弊，均不得稱爲完善的政體。 總理見識高超，發明一種盡善盡美的政體，這便是「均權制

度」。它的特質是：「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兼顧或地方分權」。照此看來，「均權制度」的實行，有單一制的利益，無單一制的弊害；有聯邦制的優點，無聯邦制的劣點。它能使中央與地方各在其權力範圍內，完成自己的責任。這是最完善，最合中國需要的制度。

(二)實行民權主義的基本方略 如上所述，民權主義就為中國所必需，有實行的必要了。既要實行，就應先定方略，有如下列三點：(1)促進「地方自治」。依照「建國大綱」的規定，在軍政完成後的訓政時期，應該由政府協助人民籌備地方自治。其應先辦的事業，如設立機關，調查戶口，開闢荒地，測量土地，設立學校，修闢道路等。(2)人民練習行使四權，所謂四權，即前述之選舉、罷免、創制、複決。這是最完備的民權。但是人民要執行這四種政權，必須遵照 總理手著「民權初步」的意思，多多練習，才能靈活運用，庶使名實相符，流弊不生。(3)中央政府試行五權。總理對於治權，主張五權分立。又稱五權憲法，是憲政時期的政府制度。但在訓政時期即已試行五權，為憲政之準備。將來經驗日多，推行順利，憲政時期便有完美的五權分立的政府之出現了。

(貳)「民權主義的國家建設」之徹底實踐 政府對於民權主義的實行，早已深切注意。但要完成民權

主義的國家建設；貫全國上下，一心一德，完成下列四項急務。

(一)實施「新縣制」——新縣制的成立，是由 總裁多年來根據 總理遺教的訓示以及實際的施政經驗，加上專家供獻的意見，綜合研究而成的偉大成果。新縣制的規章，就是「縣各級組織綱要」。對於縣以下各級行政機構的組織與調整，深能切合實際的需要；其擴大鄉鎮公所的職權範圍，尤為鞏固基層政權機構的要圖，在「縣各級組織綱要」中，規定各地方應先急辦的事務，有下列十七項：編查戶口；規定地價；健全機構；調整人事；整理財政；設立學校，訓練民衆；推行合作；辦理警衛，推廣農業；修治水利；發展工礦；開闢交通；推行衛生；實施救卹；社會調查；厲行新生活。這些都是實行地方自治基層工作，著人應即迅予實施。

(二)促進「三民主義憲政」的實施 中國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其必經過程，即為促進「三民主義憲政」的實施。一建國大綱一中，規定建國的程序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抗戰以前，即由軍政而進入訓政，並已準備頒行憲法，實施憲政。抗戰發生，政府雖忙於軍事，而對於憲政的實施，仍能積極注意。除一再召集國民參政會外，又一面有召集國民大會之籌備。這在抗戰以後，必有圓滿之成功。

(三)推行「管」「教」「養」「衛」的政治 政府為要培養國民能力，造成健全公民起見，注意管、

救、養、衛四種要政。具體言之，有種種辦法。將來成功，中國人民便有秩序、有智識，生活改良，地方安寧，國防鞏固。從而中國也就富強起來，更加文明起來。

（四）實行「行政三聯制」——我們的政府，一方面努力建國的工作，一方面協助人民推進地方自治，要完成這雙重艱鉅責任，就非得加強行政效率不可。要加強行政效率，就唯有實行行政三聯制，現代行政學，都以科學為根據。總裁提倡的「行政三聯制」——計劃、執行、考核、三者分工合作，就是運用科學方法以處置行政，加強行政效率的辦法。這是大有助於政治之推進的。

科學方法——實行「計劃政治」——民權主義的實行，就是「計劃政治」。我們從他主張建國三時期來看，即可明瞭。而「建國大綱」，尤為鐵的證明，所以民權主義是有步驟的，有計劃的，而且是最合理性的民主政治，可以名為「計劃政治」。從實行民權主義的方法上來說，這種「計劃政治」就是一種科學方法。

必然結果——促進中國政治地位的不等——民權主義主張「權能區分的民主制」，對於中央與省區又採行「均權制度」。這種制度的完美性，為世界其他各種政治制度所不可及。同時人民行使四種政權時，並沒有財產、階級和性別等不合理的限制，我句話說，凡是中華民國的成年男女，只要志願信奉並力行崇高

政治理想的三民主義者，都有同等的政權，都能享受政治上平等的權利，進而在世界政治鬥爭中，亦必能爭取光榮的勝利。故實行民權主義的必然結果，是促進中國政治地位的平等，而民權主義的國家建設，也就能求得徹底的完成。

(丁) 怎樣完成「民主主義的國家建設」？

在「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過程中，「民主主義的國家建設」是第三步的工作。牠的最後目的是實現民生自由——人民一切的生活需要，都能得到普遍的滿足，不受到任何限制，不感覺任何缺憾。總理說過：「民生爲歷史重心」，又說：「建國之首要在民生」，故完成「民主主義的國家建設」，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但是這個建設，應怎樣去完成牠呢？讓我們在下面分兩部份來討論。

(壹)「民主主義的國家建設」之原理根據△△民生主義的目的，既是要解決民生需要的問題，當然牠的理論應該是千滋萬蘊的，同時牠的根據，也應該是絕對合理的。等到我們討論了它的全部理論之後，就可以發現它的原理根據。

(一) 民主主義發生的時代背景與特殊任務 民主主義的發生，可說有二種時代背景。一方面是內在的

，就是當時中國人民生活的疾苦的反應；另一方面是外在的，就是當時歐洲民生問題的嚴重的教訓。有了這種時代背景，民生主義就有二大特殊任務了。現在把它分論如下。

兩重時代背景：(1)民生艱苦情況的反應。中國向來以農立國，自給自足。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之後，世界各種國主義者按其機器生產的力量，移貨傾銷，吸取原料，並為種種經濟侵略。影響所至，我國農林日形凋敝，手工業盡被摧毀，商人也變成帝國主義者的買辦。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農工商業都遭受嚴重的打擊。人民生活的痛苦，簡直不堪言狀。一班愛國志士受着這種惡劣現象的反應，就不禁激起救國良民的意志了。(2)歐洲社會革命的教訓。自從歐洲產業革命以後，機器代替了人工，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工人就被迫聯合起來，掀起解放求生的鬥爭。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後，社會革命運動更如雨後春筍，既起而更激烈。法國的「巴黎公社運動」最能具體象徵當時革命怒潮洶湧澎湃的情形。一八九六年 總理到歐遊歷，親眼看見這種情形，深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救新民於極樂之境，於是對於中國的革命，決心將民生問題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以防止中國的社會革命於未然。這是一次革命的基本理論，也就是民生主義發生的外在的時代背景。我們既然明瞭它的時代背景，那末它的特殊任務又是甚麼呢？

二大特殊任務：(1)滿足人民食衣住行的需要。關於實際上的主要問題，還不過是全體人民的日常生計，即食、衣、住、行、的四大需要。要解決民生問題，政府就應該與人民通力合作，共謀農業、蠶造、建築、交通的發展，務使大家對於這四種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要，都不感到缺憾，然後又進一步去求改良，使其享受美滿安樂的生活。(2)求得社會經濟的合理發展。這就是一方面要發達國家資本，以免如歐美各國那樣，一切企業都被少數人操縱，獨享厚利。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是以發達社會經濟為目的，使它完全社會化，同時注意生產與分配的合理調整，而達成完滿解決中國民生問題的目的。

(二)實行民生主義的基本方略。民生主義的目的是要滿足人民一切生活的需要，以增進全體國民的幸福。現在我們要實行它，應該遵照下列三項基本方略：(1)實行平均地權。平均地權可以解決土地問題。它的實施辦法，就是由地主報價登記，政府照價抽稅，必要時又得照價收買。而自地主報價登記以後，如果土地漲價，所漲之數，撥歸公有。這樣，土地權利可漸達到全國人民的平均享受。(2)節制私人資本。這在總綱的主張，是一方面允許並保障私人經營的合法事業，一方面對於操縱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都要加以限制。後者的方法，就是實行累進的直接徵稅，如遺產稅，所得稅的稅源，都要按照累進稅率重徵其稅。(3)發達國家資本。解決民生問題，單靠節制私人資本的辦法還是不夠，必須發達國家資本，以振興

實業，這裏第一是交通事業，第二是開鑛事業，第三是輕重工業。而且一切的生產事業，都要使用機器，使全國各地都有工廠，工人都有工作。

(貳)民生主義的國家建設之徹底實踐△△遵照總理遺教的訓示，根據今日中國國情的需要，下列五項要政，就是完成民生主義的國家建設之基礎工作，我們要努力完成它，俾能奠定建設新國家的基礎。

(一)擴大「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我們在建國進程中，最感物質缺乏的痛苦，因而民貧國弱。總裁提倡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其主要意旨就在使全國各種人力與生產要素，有全體適當的配置，而達到有效的發揮。其目的為：「人盡力、地地利、均供求、暢流通，以謀國民經濟之健全發展」。實施的要務凡八項：發展工業，增加農業生產；鼓勵墾牧，鼓吹墾規模之移民墾荒與經營畜牧；開發鑛產，以闢天然之富源而容納後步之勞力；提倡役工，協助政府舉辦開發交通道路，修治水利等工作；促進農村之簡易工業點，於一般之工業亦應獎勵之；調節消費，使必須消費者盡量自己生產之，不能生產者盡量節約其消費；暢通貨運，便利水陸交通，並設運輸機關專營此業；調節金融，鞏固法幣政策，鼓勵國民儲蓄，使資金活潑融通。這都是非常切實的法。我們應該擴大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期達美滿之成功。

(二)鞏固「法幣政策」——查「法幣政策」的確立，淵源於「總理「錢幣革命」的遺訓。我中央政府自

民國二十四年決定實行。政府爲維持法幣信用起見，對於法幣之準備金，當能保持百分之六十爲現金準備，百分之四十爲保證準備，並設置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負其責任。抗戰發生，得力於法幣政策之廣泛多。到現在，尤有鞏固法幣的必要。平準基金委員會成立，必有良好貢獻。鞏固是會成功的。

(三)實現「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 總理解決農民問題的最高理想，也是民生主義的一個目的。其實行方法，由政府以政治法律的方式或金融經濟的方法，協助佃農僱農等取得所耕土地的所有權，以保證勞動的結果，全部歸耕者所得。其爲平均地權的方法，益爲顯然。

(四)勵行國營實業 現代國際的經濟鬥爭場中，生產不發達的中國，要實行國家經營，才能對優勢的外國經濟作有力的抗衡。對內解決民生問題，單靠節制資本的方法還是不夠的，必要發達國家資本，以國家的力量去經營工商事業。這是一舉兩得的辦法。

(五)切實進行「實業計劃」 總理「實業計劃」一書說，「爲國家經濟之大政策」。他的內容，第一是講中國實業應如何發達的問題；第二是講國際共同發展實業計劃。分別言之，有六大計劃，項目很多，有且非常完備。最近若干年來政府當局已經努力做到了一部分。但是我們既然知道它的重要，我們就應該切實奉行這部實業計劃。使他完全實現。

科學方法——實行計劃經濟——總理主義實業計劃二書，成於一九一九年，遠在蘇俄倡行計劃經濟之前。我們說完他以後，就知道一國國防民生（即食衣住行）的經濟建設，莫不應有盡有。而且步驟分明，規劃詳細。今日政府當局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方談到國法幣政策，勵行物資統制，同樣是有計劃的實行戰時經濟政策。凡此種種，都「計劃經濟」。從實行民主主義的方法上來看，這種計劃「經濟」，就是一種科學方法。

必然結果——促進中國經濟地位的平等 民主主義為民權主義的民主主義，對於民生問題的解決，極端注重平等的原則。故民主主義必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和國營實業的方法，去達到財產的目的，等到財產公有之後，人民不可不「各取所當」，即不受任何剝削。並且可以「各取所需」滿足日常生活上的一切要求。那時候，全國人民就可以享受共同的生活，既豐美而又完滿，無絲毫缺憾。所以實行民主主義的必然結果，便是促進中國經濟地位的平等；而「民主主義的國家建設」，也必能得到澈底的完成。

（戊）結論——力行主義

（壹）「民生哲學」是三民主義思想的基礎 總理說過：「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歷史的重心是

「民生不是物統」。又說：「民生就是政治一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並且肯定的說過：「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種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由此觀之，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都是以求生為終極的目的。這個「民生哲學」，就是三民主義思想的基礎，確實如此。概括說來，民族主義是領導我們從異族外邑的壓迫下爭取民生，民權主義是領導我們從專制軍閥的壓迫下爭取民生，民主主義是領導我們從地主資本家的壓迫下爭取民生。故三民主義思想的基礎就是「民生哲學」。

（貳）「力行哲學」是完成建國的原動力。總理鑒於中國流行的「知易行難」一說的錯誤，阻止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妨礙着革命主義的實行，因特別提倡「知難行易」的學說，告誡國人專重實行。總裁根據這個學說，作「明切的闡揚，以「力行哲學」為言。國人注重力行，要兼備智勇的能力。在行的目的及方法上，要以敏銳的識力認識一切的原理；同時要以偉大的魄力，實踐已經認識的原理；並且要藉恆心和毅力而澈底完成之。我們不講唯心，也不講唯物，而只講「知難行易」中的「行」字。我們要負建國的責任，首先就要確定「力行」為我們的人生哲學，故三民主義的信奉者，必須，識力行哲學。必如是，有可以實行三民主義，才可以完成「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

（參）「三民主義新中國」奠定百世不拔的基礎。總裁曾經昭示我們：「民族主義為心理與政治建設的

原則，民權主義爲社會與政治建設的原則，民生主義則爲物質與政治建設的原則」。簡言之，三民主義卽爲統攝心理、社會、經濟及政治四大建設。此四大建設一齊成功後，國防建設，卽告完成，然後對內求自強自衛，對外求共濟共榮，三民主義就能完全實現，而新中國的建設亦能澈底完成。自此以後，三民主義中民族、民生、民權的發展，永不止步的，能夠適應世界的潮流，適合中國國情，雖歷千秋萬世，亦必能維持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所以完成「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能夠奠定百世不拔的基礎。

(肆)「三民主義新中國」促進世界大同的實現 總理發明三民主義，領導國民革命。其全部目的是能先救中國後救世界。所以三民主義新中國乃是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的基礎。因爲三民主義實現後，我們才先在世界上海揚公理抑制強權。世界上沒有野心家，然後實行民族平等，促進世界大同，以增進全人類的和平與幸福。同時，這一切，只要「三民主義新中國」之建設澈底完成，便獲得可靠的保證，一點也不空想。

論三民主義的一次革命

陳資勳

在社會主義者的煽惑下，許多青年人被麻醉了，明明處在當前三民主義革命的大時代中，偏偏自認爲在資本主義的黑暗社會裏，作無病呻吟，自尋煩惱，還幻想着有一個什麼社會革命的到來，這是一種可憐而錯誤的看法，根本沒有認識三民主義的革命是什麼。

當然，我們不能掩飾事實，中國社會確在開始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依照歐洲歷史的發展，在資本主義開始支配歐洲社會的時候，曾掀起過一次民主革命。因爲民主革命的成功，更加速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步伐，許多這個在這個因果關係內的先生們，便認爲中國既在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程途上，其掀起來的革命當然是歐洲式的民主革命。不過是完成其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由於這種武斷，由於這種用看歐洲歷史發展的眼光來判定中國革命性質的錯誤，喊出了一套什麼階段革命，什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後還要無階級的社會革命的理論。

這種可憐的認識，我們可以不管，可是他們一口咬定中國今日三民主義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是僅僅完成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一段歷史任務，却是一種可怕的殘酷，是給予當前三民主義革命的

志士們一個毒辣的殺害。我們不能不起來爲三民主義的革命者作一番有力的伸辯了。

三民主義的革命究竟是一種什麼革命呢？我們的答復是：既不是不窮革命，也不是階段革命，而是一次革命。所謂一次革命，很明顯地是革命只有一次，決不會有兩次或多次，具體的說：就是三民主義的革命是在解決種族問題和政治問題中同時解決經濟問題的革命，也就是驅逐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以創造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即國父所謂「專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意思。

這是很明顯的，三民主義的一次革命，在社會主義的唯物論者看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如果我們只依照唯物論者所談的唯物史觀來判斷一次革命的合理性和可能性，當然會得出否定的結論來。

唯物史觀，特別是馬克思社會的物質史觀，它完全以生產工具爲社會歷史的根源和動力而說明社會歷史的起源和演變，因此他認爲有什麼樣的生產工具，就有什麼樣的生產關係，有什麼樣的生產關係，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因而構成整個社會和歷史。所以馬克思在社會權的結構方面，認適應當時生產工具的生產關係的總和爲社會的經濟結構，即社會下層的土台，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是社會上層的建築。在社會縱的進化上，認生產工具之變動爲歷史演變的極動因，由於生產工具的發生變動，生產關係不能不作適應的變化。於是社會經濟結構也跟着變化，上層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更隨着改變。有這些變化

的不斷激進，歷史才不斷的形成。馬克思更根據這種認識而發明一個「質與量」的轉化法則，來解釋社會的
革命現象。所謂「質與量轉化」的意義，就是說一個社會各有其特「質」，這種特「質」形成以後，就逐
漸成長以至於成熟。這是由「質」的形成而逐漸到「量」的推廣，這種推廣是漸進的而非突變的；等到這
種「量」的推廣達到一定限度以後，反而阻礙了「質」的進步，於是由突變而非漸進的一種方式，形成了
一種新「質」。此處所謂「突變」很明白地是指着社會的革命。如果就實例來說，他認為「封建社會的生
產情形，達到他發展的一定階段，就極端地限制了生產力和物質富藏的增長可能性，限制了社會發展的全
體水準。這障礙，是由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勝利了的結果，才被打消了，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盡了進步的作用
，然而現在却變成阻礙社會前進的障礙物，又需要社會主義來打消這種障礙」。由這個實例中，我們知道
所謂「量」便是社會的生產形式——社會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結合的方式——所謂「質」便是生產力（包括生產
工具），需要統一生產力與生產形式的矛盾，創造新「質」的革命必然爆發。在封建社會末期則是資本主
義的民主革命，在資本社會的末期則是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中國社會的生產形式無疑地仍帶着濃厚的封
建色彩，由于外族侵略的刺激於，由西洋文明的傳播，生產力當然不能再限制於這種生產形式中，依照唯
物史觀的法則，來統一這種矛盾的必然是資本主義的革命，因之現階段中國的任何革命，其本質必定是資

本主義的，一定是完成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所以領導這個革命的人也必定是資產階級，因而在這種革命之後，是應該而且必有一次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完成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這是反三民主義一次革命的唯一理論基礎。

難道三民主義的一次革命真不合理真不可能嗎？我們的答覆是：決不。因為三民主義一次革命的理論基礎，不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而是 國父所創立的民生史觀。民生史觀比唯物史觀更合理更合歷史演進的事實，爲了解釋一次革命的合理和可能，請讓我從民生史觀說起：

宇宙中任何有生命的東西，無時無刻不在活動和變化，然而無論是怎樣活動和變化總逃不掉「求生存」這個目的。一切生命皆是爲了「生存」才去活動，才去變化。人類是有生命的東西，他之要求生存也無異於自然物，因此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和變化沒有不是圍繞着「求生存」這一點的。國父的「民生史觀」便是從這一點出發，所以他說：「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因而「民生史觀」不以物質的變化爲歷史進化的動因，而以人類「求生存」爲歷史進化的動因。人類求生存與自然物無異，假人類究竟是自然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東西。這個最高階段的自然物——人類，具有與平常自然物不同的原素——精神，就是 國父所謂「人性」。宇宙由物質進化到有人類後，由于人類的精神作用，才產生宇宙的社會界，人類才

時常是歷史之主體的自動因子，正如歷史哲學家拉波特爾所說：「人是客觀的被動環境中之唯一自動的因子，沒有人則絕對不會有歷史，歷史是人做出來的」。所以我們可以說人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體，他之求生存，一方面自然的，同時也是意識的，他不僅消極地受物質的影響，而且能積極地反作用於物質，使物質環境適應人類，而為物質的主人。國父在「軍人精神教育」中說：「人者有精神之質，非專恃物質之體也，我既為人，則當發揚我之精神，亦即所謂發揚我人之精神也」。這就是表明歷史的創造者是綜合物質和精神的種類，並不僅僅唯物史觀的根本否認精神在創造歷史的地位。

唯物史觀的根本否認人類之精神作用，在人類求生存之活動中，很難找到證據。唯物論者認定的社會歷史變化的究極因子——生產工具，其變化不如馬克思所解釋完全由生產工具自身內在的矛盾之結果，社會的物質生產工具要是完全失去了人力的作用，完全離開了人類的製造，完全離開人類「以行求知」——「因知進行」之精神活動，恐怕永遠不會有進步有變化。石器時代，沒有火，固然不會發明銅器，沒有人類為「求生存」而向上努力的意識作用，武器也恐怕永遠不會發明吧！甚至連火也不會拿來應用吧！我們把生產工具的變動不完全歸因於它自身內在的矛盾，而歸因於人類「求生存」之向上的努力是完全正確的。固然我們不能根本否認生產工具自身矛盾對工具變化的幫助，但生產工具畢竟是為人而存在，為人類的「生存」

而存在，要有人類要求不斷的生存，才能去接受生產工具自身矛盾幫助，不斷地改良生產工具，不斷的發展和擴大社會的生產力，因而社會乃不斷地進化，歷史乃不斷地形成。他們所謂「質與量」的轉化，也不過是人類生存活動在時間上空間上變化的兩方的表形，並不是歷史的本質。在這裏我們可以了解社會的任何演進既不是由物質決定也不是由精神決定，而是由綜合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生產問題」來決定。所以歷史的造成是精神與物質的統一，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沒有客觀的物質力量，固然不會有歷史，同樣，沒有主觀的精神力量，也不會有歷史。

生存既為歷史的中心，任何精神或物質的活動——社會歷史的演變——不能違反「生存」或妨礙「生存」。如果有一部分人剝奪或妨礙另一部份人的「生存」，被剝奪的一羣為了保持他的生存，必定起來與之鬥爭，此史的活動便變成爭鬥的形態，爭鬥到了極激烈的階段，乃爆發革命，亦即所謂「質與量」的突變。所以鬥爭雖是一個歷史過程，却為社會進化的病態，如果「生存」不變成問題，歷史決不會用鬥爭的形態來表示。國父認馬克思為社會病理學家，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鬥爭雖是歷史上的病態，但事實上，歷史却一代一代地用鬥爭的形態來表示。這是由於每一次革命的成功，並沒的將生存問題作根本的解決。每一次矛盾的統一，並沒有把矛盾永遠統一。為什麼不能呢？這

不可不歸罪於在客觀物質與主觀精神綜合活動的過程中，沒有把握住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不過是自然地盲目的摸索進行，畸形發展的現象當然是免不了的。正如大海中一條船，雖有他的目的地，但却不知道達到目的地的正確路線。只是盲目的摸索，自然不會很平穩很安全，許多艱難險阻需要他去克服，等他快要到目的地之前，快要打破最後一次艱險時，再回頭看看他的過去，自然可以發現他跑了許多不必要的繞道，受了許多不必要的痛苦，所以人類開始奴隸社會後便想到烏托邦的快樂，但却不知道怎樣去達到烏托邦，當然只好盲目的摸索，直到資本社會的末期，馬克思在研究歐洲歷史發展的過程之後，畢竟認清楚了這條歷史的路：原始共同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

同時，他也指出了這條歷史的路，每一個階段免不了病態的存在—階級鬥爭，而且鬥爭常佔了主要的地位，所以依照這條路前進必然地是艱險的也是痛苦的。

歐美社會依照這條路發展已經達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末期，勞資階級的對立，已經達到最尖銳的階段，當然無法倒轉歷史再去避免這種病態的產生，馬克思根據這種病態，乃指出以毒攻毒的辦法，即鼓動被壓迫剝削的大多數的無產階級來打倒資產階級，解除人類生存的桎梏，粉碎人類生存的障礙，以歐美資產階級的專橫跋扈，積重難返，國父也不得不說：「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鬥爭去打平它。這是一

種不得已的治病猛劑，正常的療法最好是在「不妨礙生存」不違反生存的原則下，避免這種病症的發生，也就是避免這條必然發生病症的路。

前面我們說過，歷史的形成，是由於精神與物質的統一，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而統一的原則應該是不違反生存的要求，現在我們既已把握了馬克思所發見的歷史法則，在主觀的意識上，我們可以預知將來社會所必然產生的任何影響，因而在精神方面我們多得到一點支配物質變化的力量，用着這點力量就可以使社會的震盪不再，動的盲目摸索，而可以有濃厚的目的意識性。依照這個目的我們可以調節社會活動，支配社會變化，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病症。正如自然科學中了解了雷電的性質之後，我們便可以裝避雷針去避免雷電的損害一樣。可是，如果社會的演進已經到了無法避免病症的時候，雖知道這個避免病症的法子也是徒然的，正如雷電快一接近屋頂時再去裝避雷針一樣の徒然。

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在主觀的認識上，我們受了歐美前車之鑑，決不能主張資本主義，幹張眼跳岩的勾當。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迎頭趕上」，「勞永逸」，因為要不張眼跳岩，要能「迎頭趕上」，要能「勞永逸」，便免不了用我們已具有的支配調節社會變動的主觀力量，來做「思想預防」和「社會生理」的命命工作，然而問題却在中國社會之發展究竟到了一個什麼階段，是否還允許我們爲它避免病症或另闢新

的遺蹟，如果社會確到了無法避病的境地，那麼，所謂「思患預防」，所謂「社會生理」，甚至所謂「一次革命」，都是枉然的，都是騙人的。

關於中國社會所處的歷史階段，我們可以從國父的遺教中得出結論，國父在民生主義二講中說：「中國今日雖離封建制度，雖然有了二千多年，但因爲工商業沒有發達，今日社會情形，還是和千多年以前的社會情形一樣」。在實業計劃中說：「中國今日尚用手工爲生產，未入工業之第一步」。這是說明中國社會尚停留在封建主義末期。國父又曾說：「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這是說明中國社會無階級的分化，階級意識更是淡淡。中國社會處于封建末期，中國社會是患貧不是患不均，沒有誰能否認，就是用唯物史觀來看中國社會的人，不是也口口聲聲喊着「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嗎？既然我們的社會尚在封建末期，那末，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再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長途中，我們的社會正站在賽跑的起點，正是適於改弦更張，改道而馳的時候，正是開始需要「思患預防」、「社會生理」的時候。難怪國父要大聲疾呼說：「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爲既往之陳迹，或於我爲方來之大患，要爲繕吾藥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馳之」，同時在「社會主義之派別與方法」

中教訓國人：「歐西各國，疾已纏身，不得不投以猛劑，我國尙未染疾，尤宜注意於衛生之道」

由於我們社會尙未染疾的緣故，我們的革命決不應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由於我國社會沒有階級的對立，我們不能走馬克思以毒攻毒的道路。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條，便是「行民族革命」時要行民權革命，行民權革命必須兼顧民主主義才可以免將來經濟革命，防患於未然」；也就是「以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革命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今天，我們不談革命則已，要談革命便必定是三民主義的一次革命。

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

李兆龍

我們要想把一種思想研究得透澈，首先便該知道這種思想核心之所在，然後才可以知道這種思想的『來龍去脈』。否則，研究的結果，僅是這種思想的一點皮毛，而不是他所要研究問題的核心。研究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也不能例外。我以為三民主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民權主義。

原來民權的意義，是用人民的力量，管理國家的政治，可是民權是專指政治一方面而言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又說：『今以人民來管理政治，便叫做民權』，他並且說道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在『求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民生主義『在求經濟地位的平等』，而民權主義則『在求政治地位的平等』。是見三民主義的創作者認定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是民權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不過這裏還要聲明的，並非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就脫離了關係，相反的，這兩種主義還是實現民權主義先決的條件，也就是實現三民主義政治思想必經的手段。總之，它們是完成三民主義政治思想的助力，而不是三民主義政治思想的核心，三民主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民權主義。這種看法是扼要的，是合理的。或許有人要問我：主義不見得是種思想，怎能說民權主義就是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我

的答覆是：這是術語的問題。從內容上看，主義當然是思想，而且還是有系統的思想呢！孫先生說：主義是「先有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思想是本體，信仰和力量不過是這種思想發生的作用。所以「民權主義可說是三民主義的政治主義」（葉青），即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

現在我們要問三民主義政治思想有何種價值？這是急須研究的一個問題。但是單拿它本身來檢討，是不易發現它價值之所在；猶如白晝裏不顯出電燈的光亮。我們必須將它與現代世界三大政治思潮作一個詳細的比較，然後才可以知道它的價值。所謂世界三大政治思潮：乃指歐美民主政治思想，意德法西斯政治思想，俄國蘇維埃政治思想而言。

首先從政治思想的基礎或出發點比較起。

歐美民主政治思想之出發點，是個人自由與平等。他們認為個人生來就是自由平等的，後來的不平等不自由是人爲的，只有個人自己的主張才能代表他個人的利益，「一個人只算一個人」（邊沁），與他人無關，各個人爲了要得着這種天賦的自由與平等，所以起來反對政府的束縛，實行民權革命。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三講曾經說過：「歐洲各國從前革命的人民，爲爭平等和自由」，足見歐美民主政治思想是基於自由平等之上或由它們出發的。

這新法西斯政治思想在這裏與民主政治思想相反，他們否認個人的自由與平等，而主張國家的自由，認為國家是「人爲人」的法人，是超時代的實體。國家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國家的自由先於個人的自由。個人若違害國家和擾亂治安，國家則加以制止或剷除。人類的天性生來就有優越拙劣的區別，始終是不平等的，這是意德獨裁政治思想的出發點。

蘇維埃政治思想在求無產階級的自由與平等，反對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因為個人自由只便於私有財產的發展，尤易形成經濟上的階級分化，使政治地位不能平等。馬克斯云：「神祕的基督教的平等，固已裝成自然的合法的民主政治的平等模樣，從天上開步走下來，然而他還不曾降到地面，因為地面上有經濟的基礎」。列寧也以爲「民主政治……下面的人民貧富不均，有的是有產階級，有的是無產階級，……對於自由權不能平等享受」。他們「求保障無產階級在經濟地位的平等及無產階級的自由，就主張由無產階級來組織政府，獨享大權，可見蘇維埃的政治思想的出發點是求無產階級的自由與平等。

三民主義政治思想的出發點爲人民的政權，簡稱爲民權。它以爲人民要取得自由與平等，首先就要實現民權主義。因爲人類的自由平等不是天賦的，而是人爲的。民權主義主張實現全民政治，以擊破政治地位上人爲的不平等，掃除專制政治下人爲的不自由，所以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是在求民權主義的實現。

它不像歐美的民主政治思想，僅爲爭個人自由平等去實現民主政治；也不像德意志法西斯政治思想完全忽視人民的自由平等；更不像蘇維埃政治思想只偏於無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民權主義一旦實現，人民有權，自由平等自然獲得。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二講中說：「……真平等自由是在什麼地方立足？……是在民權上立足的」。『所以平等自由實在包括於民權之內』。那末我說三民主義政治思想的出發點是民權，就更有理由了。

其次比較各種政治思想對於政權的主張。

歐美民主政治思想，受了盧梭民約論的影響，主天賦民權之說，認爲人類生來就有管理政治的權利。因此政府是爲執行民意而存在的。所以這種政府，非衆人民選舉代表去組織不爲功。於是產生代議政治，但是他們的選舉權有等級界限和性的界限，現在普遍選舉雖已發達，祇以經濟上的階級未曾消餘，被選舉權尙多操於資本家之手。雖曰民主，實則不然。何況只有選舉代表那種間接民權呢？如果議員在任期內不聽民意做事，國民亦無奈之何。所以人民的權實在是小。

德意志法西斯的政治思想，以爲人類的智慧才能，生來就是不平等的。如強求平等，認爲人人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則選出的官吏不見得都有担负國家大任的才能，結果誤國害國。他們認爲個人的權利應包

括在國家權利之內。現今德意雖未廢止選舉權，然而他們業已一面（由國社黨，法西斯黨）操縱選舉，一面反對民主而主張獨裁。所以在法西斯的政治思想內，政權是日益縮小，不容許發展的。

蘇維埃政治思想，以經濟地位平等為準則，所以反對歐美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思想，列寧說：「第一民主政治思想（指歐美而言）的意義本為狹小，只偏重於政治一方面，把經濟的範圍擱在一邊。第二民主政治所到的程度並沒有使資本家的基礎搖動」，所以「這種民主政治是被褊狹的資本主義組織所籠罩着，其實只為少數人利益的民主政治……大多數的人民是被摒棄於政治之外」，他們為剷除資產階級計，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由無產階級操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足見蘇維埃的民主思想只限於無產階級，乃歐美為有產階級所把持的民主思想之反動，都不是真正發達民權的政治思想。

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是主張全民政治的。因此它的政權不是歐美的「間接民權」，也不是法西斯的「限制民權」，更非蘇維埃的「片面民權」的思想。因為這些政治思想，「對於民權問題還沒有澈底解決的辦法」。「我們主張的民權是要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孫）。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應有充分的民權，即人民除有選舉權外，還要有罷免、複決、創制三權。「人民有了這四種權，才算是澈底的直接民權」。（孫）。這才不會有像間接民權那樣的流弊：人民在選舉時是主權者

，選舉後就變成了議員（代表）的奴隸，或爲獨裁政府的驅使者。但是我們所應該注意的，是這種民權思想不主張天賦民權，而主張革命民權。

再次比較各種政治思想對於治權的主張。

歐美民主政治思想，主張孟德斯鳩三權分立之說，把政府的治權分屬於立法、司法、行政三個機關，使之互相牽制，以免發生過去君主專制的流弊。這是很對的。但三權分立的思想，將強勁權屬於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則不免受其阻撓，使行政主張不易貫徹。而且考試權屬於行政機關，則行政機關可濫用私人，使有才者不能爲國用。這樣的政府，還能夠做出很好的工作嗎？所以實行三權分立的政府多半弄到政府無能。

悉德法西新的政治思想，重視政府的治權。因爲他們認爲國家是至高無上的，政府是代表國家行使意志的機關，所以政府的行政權是最高的，於是極端削弱民意機關的議會。莫索里尼在第一次出席議會時，就明目張胆的說：「……要知道我對於議會是隨時都可以立即解散的，明天後天也行，二年後也行，全憑我的心意如何耳。……」行政權加強的結果；國家的一切大權集中於唯一的領袖之手。他是一位超羣的優越者。全國人民「毫無疑問地遵從領袖的任何命令」。因此在法西斯政治思想支配下的國家，政府是極權

的，有能的。

蘇維埃政治思想，承認國家的階級獨裁，因為只有無產階級獨裁才能壓倒有產階級，執行無產階級的意志，保障無產階級的利益。要想政府有這種力量，不能不反對主權分立之說，實行國家機能的統一。因此蘇維埃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集中於全俄蘇維埃大會。而後由該會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去執行，（人民委員會對該會負責）。中央執行委員會就是最高權力機關，總攬一切。因此，政府有能。

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機關，去做很好的工夫……」（孫），就不能像獨裁國家三權合一那樣的簡單；便是三權分立的政府也嫌不夠。它主張把彈劾權從立法機關分出來，另成立一個獨立的監察機關，使行政機關不受立法機關亂用彈劾權的牽制；復把考試權從行政機關分出來，另成立一個獨立的考試機關，使行政機關不致亂用私人，減低行政效率。所以三民主義把治權分之為五個大權。即「採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它們分立為五個獨立的機關，使之平衡並進。這是孫先生「破天荒的……發明」，非其他政治思想所可媲美的。

最後比較各種政治思想對於政權與治權的關係之主張。

歐美民主政治思想，前面在政權裏已經說過，人民只有間接的選舉權，人民所選舉出來的是議員而不

是執政的官吏。（除少數國家行使直接選舉權外）。執政的官吏是自議會選出，官吏多對議會負責，政府官吏均以議會之意志為意志，人民的意志很少實現。因為議員在當選後的任期內，人民就無法去干涉，他們可本著自身的意志去管理政府，所以人民的政權與政府的治權，很少發生直接的關係。

德意志法西斯底政治思想，認為「國家是超越個人神感的實體。」國家超於各階級之上，國家的力量可以調和各階級的利益，使之互相並進，個人只有服從國家的法律才能存在。「個人對國家只有義務，後者可以要求前者犧牲一切，甚至拿生命來履行此種義務。」這種政治思想，好似把國家的政府看做主人，反把人民看做國家政府的奴隸，政府可以命令人民，人民不能管理政府。這種獨裁政治思想，無異是君主專制的變形。

蘇維埃的政治思想，因為它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所以政權與治權的關係，也完全是無產階級的。但治權的表現為獨裁；政權則是以選舉權為主，「罷免權和複決權是附屬的，不是正式的，創制權根本沒有」（葉青）。所以人民的政權不如政府的治權之有力。

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對於政權與治權的關係，頗慮非常周詳。人民的四權，「是管理政府的力量」（孫）；政府的五權，「是政府自身的力量」（同）。因為「國民是主人，政府是……有能的人」（同）。這

權，權能平衡，人民既有權參政；政府復「有能」盡責，這種權能平衡之制，真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

綜觀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與世界三大政治思潮比較的結果，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三個討論：

(甲)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在歷史的進程上是前進的，情形有如次式：



傳統的君主政治與民主政治，現代的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皆各走一端，形成兩種對立的思想。這真如孫先生研究歷史時所得到的結論：「政治裏頭有兩種潮流，一個是自由的潮流，一個是秩序的潮流，」「自由太過則成專制」，都不適宜。惟有兩者「平衡，方能適當」。這種權能平衡的政治思想，最是完美。它是「後來居上」(孫)，為歷史進程上的前進思想。

(乙)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在目前政治思潮中是合理的，情形則如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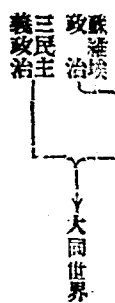


三民主義研究集

天賦民權說只合於人類解除君權束縛的時代，它所根據的自然的平等，不合事實，因此發生根據自然的不平等而有法西斯獨裁，根據社會的不平等而有蘇維埃獨裁。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不根據自然平等，而承認自然不平等；但又主張以社會的平等來補救自然的不平等，民權是由神權而君權而民權之歷史的必然。我們當順應歷史以反對君權，主張民權，所以革命是實現民權的方法。人類，「根據於各人的聰明才力……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第一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孫）。這樣的分法是合乎教育家已做過很多實驗的，即各人的「智慧」有高低之別。但三種人合作，造成革命；而革命也非三種人合作不可的，如此，民權就應該平等享受了，所以革命民權較天賦民權之說合理得多。現在只有革命民權的理論才有根據，才可以站得住腳。

（丙）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在未來政治思想的趨勢上仍是前進的與合理的。請看次式吧：

民主政治
新法政治



我們知道，「世界歷史的進化，是由真正的全民政治，以進於大同之治」(孫)的。這樣，法西斯政治思想更不必說，即如歐美少數人的民主政治，都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非革命不可。俄國雖已開始離開資本主義，而在政治上，同樣不是全民政治，沒有充分的直接民權。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是主張一次革命的，並以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為基礎，乃真正的全民政治，又有了充分的直接民權，它之到大同世界，是可「免於第二次之革命」(孫)的。它能「長治久安」，「一勞永逸」，(同)。所以三民主義政治思想是合乎歷史進化的原則，前進而合理的。可以說：「大同之治」就是民權主義的目的；民權主義就是「大同之治」的實行，由此觀之，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在未來的趨勢上，仍是前進的和合理的。

所以三民主義政治思想有崇高的價值，非其它政治思想所及。它對於中國非常適宜。這一點，尤應注意。

但在「民權主義」的講演裏所說到的許多歐美人士，則以為中國不適宜於民主政治，只適於君主制度

，因為中國的民智夠不上實行民主政治。就是國內的人士乃至黨員，從前也覺得孫先生所主張著「理想太高，不逮中國之用」。誰知他們見到的，孫先生早經顧慮周詳，而且有很好的辦法來排除這些困難以求實現。他因為民智的不夠，把實現全民政治的理想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軍政時期，其任務在用軍事的力量，排去一切障礙；一方面宣傳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開化人心。第二個時期是訓政時期，派員補助各縣自治工作，訓練人民運用四權。第三個時期是憲政時期，地方自治大多完成，召開國民大會，訂定憲法，完成全民政治的理想，這種分成三個步驟的辦法，依我看來，孫先生是採用教育學的處理來教育國民完成全民政治的，而不是如有些黨派徒唱高調或利用民權的企圖，因為在軍政時期，人民不知不識，是一個不能獨立的時期，須要依賴政府，猶如兒童受小學教育一樣。在訓政時期，他們的知識能力到了半獨立時期，不過這要政府的力量去補助他們才行，猶如幼年受中等教育一樣。在憲政時期，人民的智識能力已到了能自立的時期，就無須政府的力量去補助，可以完全自治了，猶如青年受高等教育一樣。用這種教育原理去推行崇高的理想，一定是能成功的，否則教育也就失去了效用。

我們看到這裏，總可明白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是能適合國情的吧。因此，我希望國人不要再主張其它紛歧錯雜的政治思想；並且一心一德地與國民黨同心協力以促其實現。

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

李煥文

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國父手創的一種劃時代的政治制度。它的根據是五權憲法，如總裁所說：『五權憲法，則是總理所苦心創制的政治理想和制度』。所以我們研究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當從五權憲法着手。國父關於五權憲法的遺教很多，以民國十二年廣東教育會關於五權憲法的講稿，及民國十三年「民權主義」演講中關於五權憲法的許多原理為最重要。現在我們根據這兩部分遺教，對於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加以分析與研究。

(一)三民主義政治制度的原理

三民主義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在權與能的區分，以求得一個為人民所使用的萬能政府。國父鑒於歐美各國自實行了民權以後，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不能夠做事。考其原因，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他。所以人民總是防範政府，不許政府有能力，不許政府萬能。像這種人民對政府常常抱反抗的態度，國父認為是權與能沒有分開的緣故。我們中國不應再蹈歐美的覆轍，應該把權與能清楚地分開，

如阿斗之和藹焉。若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作藪焉莠，把國家的全權都交給他；若果政府不好的，我們四萬萬人可以實行暴帝的職權，罷免他，收回國家的大權。國父在「民權主義」上說：「現在講民權的國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他；最好的是得一個萬能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爲人民謀幸福。這一說是最新發明的民權學理，但是所怕所欲，都是在一個萬能政府。要怎樣才能夠把政府變成萬能呢？變成了萬能政府，要怎樣才聽人民的話呢？我的解決方法，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又說：「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在我們的計劃之中，想造成新國家，是要把國家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權，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由此可見，與能的區分，是主張一方面人民要有充分的控制政府，管理國事的「權」，一方面政府要有萬能的治理政事，造福人民的「能」。在這裏，我們更應進一步認識權與能的區分，是根據互相平衡的原理。國父於民國十二年在廣東教育會關於五權憲法的講演中說：「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

是維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這兩個力量，正如物理學裏頭有離心力和向心力一樣。離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離開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吸收向內的。如果離心力過大，物體便到處飛散，沒有歸宿；向心力過大，物體愈縮愈小，擁擠不堪，總要兩力平衡，物體纔能夠維持平常狀態。政府裏頭的自由過大，便成了無政府；束縛過大，便成了專制。中外數千年來的政治變化，總不外乎這兩個力量之往來的衝動」。又說：「兄弟所講的自由專制這兩個力量，是主張雙方平衡，不要各走極端，像物體的離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常態的，總要兩力相等，兩方調和，纔能夠使萬物均得其平，成現在宇宙的安全現象。」這批權能平衡的道理已說得非常明白。至於權能要怎樣才可以分開清楚，國父認爲根本是要從政治的意義上來研究。政是衆人之事，集合衆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權，政權可以說就是民權，治是管理衆人之事，集合管理衆人之事的力量，便叫做治權，治權可以說就是政府權。所以政治之中包括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即管理政府的力量，一個是治權即政府自身的力量。兩力互相平衡，始可發揮政治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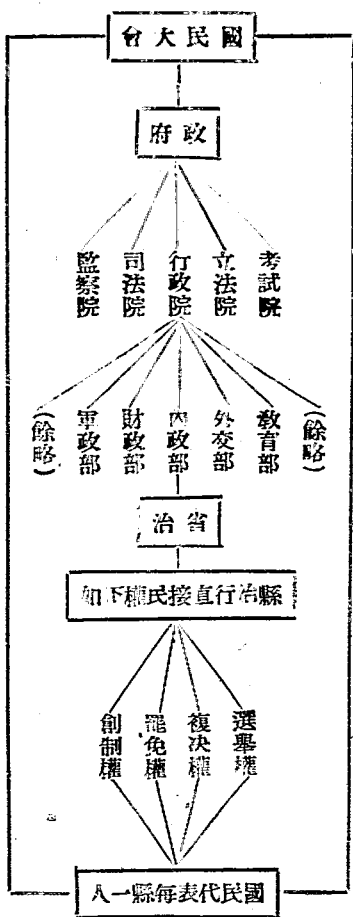
(一)三民主義政治制度的體系

三民主義政治制度的原理，既是在將權與能清楚地區分，使人民有政權，政府有治權，然則何者爲政

權？何者爲治權？人民和政府兩方面的權，要如何才可以平衡？以及政權與治權的機能如何？都應該詳細地加以研究。依國父的意思，關於人民的政權，應該有四個，即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與複決權。關於政府的治權，應該有五個，即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與監察權。關於選舉權，國父謂現在世界上所謂先進的民權國家，普遍必實行這個民權，專行這一個民權，在政治之中是不是夠用呢？專行這一個民權，好其是最初次的舊機器，祇有把機器推向前進的力，沒有拉回的力，現在新的方法除了選舉權之外，第二，就是罷免權。人民有了這個權，便有拉回的力，這兩個權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這兩個權，對於政府中的一切官吏，一方面可以放出去，一方面又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這好比是新式的機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機器的自動。國家除了官吏之外，還有其他重要的東西，這就是法律。所謂有了治人，還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麼權，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以爲是便有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決定出來，交給政府去執行，關於這種權，叫做創制權，這就是第一種民權，若是大家看到了從前的法律，以爲是很不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後，便要政府執行修改的新法律，廢去從前的舊法律，關於這種權，叫做複決權，這就是第四個民權。人民有了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才算是直接民權。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

，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用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不能夠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民權，人民能夠實行四個民權，才叫做全民政治。人民有了這四個大權來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工夫，在政府之中要用什麼方法呢？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機關，去做很好的工夫，便要用五權憲法，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用五權憲法所組織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機關。有了這種的政府機關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得很好很完全的工夫。從前說美國有一位學者，對於政治學理上的最新發明，是說在一國之內，最怕的是有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一個萬能政府，爲人民使用，以謀人民的福利。有了這種政府，民治才算是最發達。我們現在分開權與能，說人民是工程師，政府是機器，在一方面政府的機器是萬能，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做；在他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師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萬能的機器。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平衡。

歸納三民主義政治制度的體系，圖文有圖表如下：



(三)三民主義政治制度的機關

具體表現三民主義政治制度的機關，按照政權和治權的體系可以分述如下

(甲)政權機關的國民大會——國民大會由每縣選舉代表一人組成，為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機關，為國家最高意志之所托。它的產生，是基於人民行使政權的結果，同時，因為這個政權是取得革命民權的人民自身所具備，不是由於國家或政府所給與，所以它不是普通民治國家的參政權，因而國民大會也就不是參

政權的結果所產生的議會。行使政權的國民大會，是有創造國家的權力，它的活動，就是國家實體的表現。而一般的議會，是國家的一個機關，而且是憲法上統治權行使的一個機關。國民大會是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實質活動的當然結果，在國民大會以外，再沒有行使主權的機關，和高於國民大會的任何政治或法律的觀念，所以國民大會就是主權的直接活動。而一般的議會，乃是統治權行使的一部分作用，在議會的法律地位之外，還有主權屬於國家的一個觀念。由國民大會直接選舉官吏，產生政府，付與政府以極大的權限，使政府得以盡量發揮其力量，成爲萬能政府，爲人民謀福利。而國民大會本身，則僅保留有選舉官吏，罷免官吏，創制法律，及複決法律等四權，以駕馭政府。不像代議政治的議會，一方面是事事牽制政府，減低行政效率，一方面又可爲政府所解散，造成內閣的專制。亦不像總統制的議會，與總統處於對立的地位，不能行使節制治權的作用。更不像陪律政府談話，或離民意甚遠的法西斯主義國家及社會主義國家的議會。國民大會是居於工程師的地位，指揮機器工作，遇到機器出了毛病，負責修理，使整個國家的政治事業，不致進推。

(乙)治權機關由政府五院——政府爲行使治權，有五院的組織。五院院長除立法院長及監察院長由國民大會選舉外，其餘行政院長，司法院長，考試院長，皆由總統任免。但除行政院長對總統負責，由總統

對國民大會負責外，其餘四院長，皆直接對國民大會負責，沒有聯帶的責任。五院彼此獨立，不受他院的命令或指揮，各本所長，發揮政治之廣大效用。在另一方面，五院之間又有相互箝制之處。如監察院爲中央政府行使監察權之最高機關，掌理彈劾，懲戒，及審計等工作。這樣在政府五院之內，設立一個監察機關，以監督政府各院的行動，各院人員有失職的地方則向國民大會提出彈劾，即是治權本身之內，有互相箝制的作用。關於監察權的重要，國父在五權憲法的講演中曾特別指出，他說：「說到彈劾權，在中國君主時代，有專管彈劾的官，像唐朝諫議大夫，及清朝的御史之類，就是過到了君主有過，也可冒死直諫，這種御史，都是梗直得很，風骨凜然。……可見從前設御史諫臺的官，原來是一種好的制度。從前美國有一位學者叫做巴直氏，他是很有名望的，著過一本書，叫做自由與政府，說明中國的彈劾權，是自由與政府中間的一種最良善的談和方法，由此可見中國從前的彈劾權，都是很好的制度，憲法裏頭是決不可少的」。其次，如考試院是中央政府行使考試權的最高機關，掌理考選銓敘，規定凡公務人員及公職候選人，都須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如此，關於政府人員，非是經考試院考試及格者，便不得任用，這可說是考試院給與各院的一種箝制。關於考試權之重要，國父也曾談到，他說：「凡是我們人民的公僕，都要經過考試，不能隨便亂用。兄弟記得剛到廣州的時候，求差事的人很多。兄弟也不知道那個有才幹，那個沒

有才幹。這個時候，政府正要用人，又苦于不知道那個是好的，那個是不好的，反受沒有人用的困難。這個緣故，就是沒有考試的弊病。沒有考試，就是有本領的人，我們也沒有方法可以知道，暗中便埋沒了許多人才。並且因為沒有考試制度，一般不懂政治的人，都想去做官，弄得弊端百出，在政府一方面，是烏烟瘴氣，在人民一方面，更是非常的怨恨……因此便可知考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沒有考試，我們差不多就無所適從」。其次，立法院是中央政府行使立法權的最高機關，在五權制中，立法院是屬於治權機關，與代議制之議會為政權機關者不同。關於這一點，當特別加以說明：制訂法律，本來是一種能的問題，需要專門人才，觀近年委任立法的發達，可以證明立法事業，千端萬緒，自以由治權機關來行使較為妥當。立法院在性質上雖與議會不同，但在運用上却兼有總統制與內閣制二種議會的優點，而無其缺點。立法委員由國民大會選舉，不如議員之受政黨的支配。立法院獨立，不受他院影響，可以集合專門人才，制定優良法律。其與行政院之關係，不如內閣與議會之打成一片，亦不如總統與議會之絕對對立。兩院因同屬治權機關，彼此之間，無權力可爭，則協調合作之精神，當較為充分。又行政院得提出法律案及預算案於立法院，同時關於立法事項，立法院可以向各院提出質問，利用實際行政經驗，作為立法的參考。其次，行政院為中央政府行使行政權的最高機關，有實際處理國政的大權，行政院長對總統負責，不對國民大會

負其責任，也不受別種機關的牽制。行政院之下，分設內政，外交，軍政，教育，財政……等各部，分別辦理各項事務。其次，司法院為中央政府行使司法權的最高機關，獨立行使司法權，對國民大會負責。總之，五院制度，是政府之間的分工合作，共謀國家事業的發展。

(丙)國家元首的大總統——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由國民大會選舉，對國民大會負責。除了一般國家元首所應有的職權外，還有其最大的功用，此即對五院關係之調整，與非常事變的應付。當院際發生衝突的時候，總統可以以其高超的地位與個人的威望，盡調解疏通之責。如仍不得要領，則可召集五院院長，本彼此諒解合作之精神，以會商一切。如仍不能解決，則可召集臨時國民大會，以為最後之決定。其次，總統得依國家迫有戰爭或非常事變的時候，召集臨時國民大會，使其授權行政院長，得相援處置一切。這種種功用，在五權政治的運用中，關鍵非常重大。因為五院各對國民大會負責，是五院皆處於平等之地位，沒有高過獨立的總統以居間疏通調解，則五院政治之運用，必易發生扞格不通之弊。再當應付非常事變的時候，亦須總統召集臨時國民大會，通過決議，增強行政院的權力。所以總統在五院制中，其權力之適當與集中，實遠非他種制度所能相比。又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關係院長之副署，尤可避免總統的專權，顯出職責之分明。

以上，我們研究過三民主義政治制度的原理，和他的系統及機關，我們深深地了解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一種機能分明的五權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的政府，是一個爲人民謀幸福，受人民指揮的高能政府。較之議會政治的遲緩無能，集權政治的跋扈專橫，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實有將二者結合調和，取精用宏的精神，自成一種民主集權的政治制度。現在，用國父的一段話，作爲本文的結束，他說：『五權憲法就好像一部大機器，大家要想自行千里路，就與坐自動車，想飛上天，就要駕飛機，就想潛入海，就要乘潛水艇，如果要想治一個新國家，就不能不用這個新機器的五權憲法。』

五權憲法理論的研究

陳兆奎

序言

五權分立的原則，是根據三權分立而創設。而三權分立的產生，又是根據兩權分立論。所以我們要探究五權憲法的產生過程，必須從兩權分立和三權分立說起。

權力分立學說的倡導，遠在希臘時代的亞里斯多德和羅馬時代的波里比阿。但到近代才有較完備的權力學說。這就是英人洛克的兩權分立論。洛克以爲可以防止執政者越權侵害人民自由權利的唯一辦法，就是實行分權。國家的權，他以爲祇有兩種，一是制定法律，二是執行法律，法人孟德斯鳩繼起，主張把執行法律分爲行政權和司法權兩種，提出了三權分立的學說，這三權分立的原則自從美國憲法採用之後，其他各國相繼採用，遂成爲一種普遍的制度。

可是美國實行的結果，總理發覺三權分立的弊病仍是很多，並且發覺三權分立致弊的原因是立法機關兼領勅權和行政權兩兼考試權。這就要看總理自己在「五權憲法」講演中，所說的話，就可知道這裏不用

引述。

怎樣救濟呢？就是把彈劾權和考試權獨立起來。中國從前即具有這種規模。總理說：「我們現在要集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司法權、立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彈劾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整造成五權分立的政府。」有名的五權憲法於是出現了。

由此可知總歸的五權憲法，是直接採中外政治制度的精華而成的憲法原則。至於它是由於三民主義的中外時代背景互相激盪而成更用不着說了。

(一) 五權憲法的縱橫衡制性

衡制的原理，在西洋中古時代波里比阿所著的羅馬史中，就已經討論過。到了近代孟德斯鳩倡三權分立說後，才大放異彩。不過他們兩人討論的基本原理，却完全是兩樣的。波里比阿是把衡制的原理建築在混合政體上，孟德斯鳩是把衡制的原理建築在治權分立上。但是這兩種不同原理的融合，又構成了五權憲法的衡制性。

五權憲法中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脫胎於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所以這三權的衡制原理是和孟德斯

篇所說的完全相同。孟氏以爲要預防君主專制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應將治權分爲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獨立的權，使他們互相牽制。就是立法機關根據自然法則及人民應有的權利制定法律，以爲司法和行政機關治事的準繩。如司法和行政機關發生違法案件，立法機關且有實詢糾正之權。司法機關應用法律解釋人民的爭端，並對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機關所採用的執行命令是否違憲和適合當時的情形又有解釋之權。行政機關執行法律，以保障和增進全社會的利益，而於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和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執行命令的解釋有違背全社會利益的，又有提交提議之權。可是孟氏的分權，祇注重治事的一方面，並沒有顧到治人的一方面，因此立法機關可以運用他們的監察權，去挾行政機關，強迫它安置私人；行政機關也因用人可以有全權，於是它拿職位引誘議員。結果，行政方面的官吏一天壞一天，人民的自由權利不僅也要被侵蝕了；所以要有考試權和監察權的獨立。考試權獨立了，考試機關專司人材選擇之權，行政機關專負考績之責。如果行政機關要濫用人員；沒有經考試機關的考試，就不能任用。考試機關要濫用庸人，行政機關可以考績的結果而撤換。萬一用考試所選拔的人材有一部是不好的，而又爲行政機關所勾結營私，監察機關又可運用獨立的監察權去彈劾他們。如此五權互相牽制，三權分立的缺點固已掃除淨盡，而人民的自由權利也因此得到進一層的保障。

不過，祇有政府方面橫的分權，仍不足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如果橫的分權可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假使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機關統由君主任命組織，是不是一樣可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呢？而且權的分權彼此間權力平等，勢必各不相下，那末各權力機關間所難免的糾紛衝突，又怎樣可以調處呢？所以要橫的分權達到它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目的和妥善調處各分權間的糾紛和衝突，必須有縱的分權為輔助。縱的分權就是總理發明的政權和治權的分離或權能的區分。這點，總理在民權主義講演裏說得很清楚。區分了權和能，政府有一部份力量，人民也有一部份力量，可以得到一種平衡。政府用他的力量去治理人民，為人民謀幸福；人民用他的力量去控制政府。政府所有的權便是能；人民所有的權便是權。能就是治權——行政、立法、考試、司法和監察。權就是政權——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五權的組織形態是五院政府，政權的組織形態，是國民大會。政權和治權平衡以後，人民就不怕政府用它的權力來做危害人民自由權利的事，而五權間的糾紛和衝突，也可由政權機關來調處。

這種縱的權能衡制原理，和古代波里比阿的混合政體的衡制有些相仿。波氏不承認君主政治或貴族政治或民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因為凡是單純的政體，祇有一種原素在內，無論如何，總免不掉有敗壞的分子。若想預防敗壞分子操縱各種政體而成爲專制政治寡頭政治和暴民政治，祇有把把君主貴族民治三種政

體混合起來，叫他們互相牽制。羅馬政治，就是由這三種元素混合而成，彼此互相牽制。譬如執政官雖有行政的全權，但在軍需的供給，期滿的連任和戰勝的功賞等方面，元老院都有衡制的權力；而軍事和戰的決定，平民議會又有決定的權力，又可以衡制執政官。元老院雖說有行政和財政的權力，但是平民會議又可以制定法律去決定他們的權力。平民會議雖說是獨立的，但是關於財政方面的事件，不得不受元老院的牽制。人民無論如何都要當兵，又須由執政官的指導。我們分析波氏的衡制原理，知道執政官和由貴族構成的元老院，是代表當時政府的一方面，平民會議是當時羅馬人民的代表會議，所以他們三種權力的制衡，很相當於約理政權和治權的互相牽制，不過總理將政府的組織和人民的權力格外分析清楚得多。

波里比阿和孟德斯鳩雖已很早提出衡制的原理，但是都有很大的缺憾。直到總理創製五權憲法。衡制的原理始達到完善的境地。

(二) 五權憲法的强大效能性

孟德斯鳩說：「人類團體總有一個目的。國家如失了自由，就要滅亡。馬羅斯巴達和迦太基不是滅亡了嗎？假如行政部比立法部還要腐敗，國家也要滅亡。」

因爲國家失了自由就要滅亡，所以孟氏創三權分立的學說，保障個人的自由。但是如何使立法部和行政部不腐敗而有效力，以鞏固國家的存在，他却始終沒有想出方法來。總理把考試權從行政權裏抽出來，把監察權從立法權裏抽出來，才把孟氏的缺憾彌補了。何以故呢？因爲監察權操於國會和官吏任用權委於行政部及人民選舉，便要發生減弱政治效能的結果。

若以立法權兼監察權，不是議會濫用監察權，就是使監察權等於虛設。因爲近代政黨政治的議會議員，常分爲政府黨和反對黨。政府黨對於政府，都盡力擁護，揚瑜掩瑕；反對黨對於政府，却肆意攻擊，吹毛求疵。而國會的意思，又以多數的意思而決定。所以反對黨若在會議中佔多數，一定濫用監察權，對於政府所行不應糾正或彈劾的事，也加以糾正或彈劾，務使政府不能保持地位。於是政府一切措施都不能順利進行，而有能的政府也不能實現。如果政府黨在議會中佔多數，監察權就會等於虛設。因爲他們要維持政府的地位，所以對於政府應予糾正或彈劾的事，也不提出彈劾或糾正。此外，議員中的不肖分子，因爲要打算他的私利，難免要以監察權爲工具，要挾政府，政府要免去他們的牽制，亦不惜以官位和金錢與他們交結。而且，議會的主要職務在於立法，如果兼掌監察權，議員就會日處於政爭的漩渦中，而放棄立法的本職。這樣，政府的力量便削弱小了，不能發生強大的效能。

再談沒有獨立的考試權而把官吏的任用委於人民的選舉或行政部，也會使政府腐敗而沒有效能可言。若官吏純粹由人民選舉，沒有學問而能夠活動的人，常常可以當選。有專才高能的人，因為不喜歡活動，反而落選。這個流弊，總理曾經舉過一個很有趣的例子說：『美國選舉的時候，常常鬧笑話。記得有一次兩個人競爭選舉，一個是大學畢業的博士，一個是拉車子的苦力。到將要選舉的時候，兩人去演說。博士學問高深，講的是幽默的原理，但是他所講的話，各人都不大懂。有個車夫後亦上去講道：『你們不要以為他是博士，他是個騷騷子。他靠父兄之力，能進學校裏讀書，我沒有父兄幫助，不能進學校裏去讀書。他靠父兄，我靠自己，你們看誰有本領呢？』這一番話，博得選舉人個個拍掌，後來車夫果然當選。』美國人民有高度的智識水準和民治基礎，尙且有這一種笑話。中國人民智識水準甚為低下，民治基礎又很薄弱，被選舉人若沒有絲毫的限制，流弊一定比美國要大得多。若行政部兼有考試權而有用人的全權，也同樣有許多弊害。不要說行政部用人不經考試，隨意任用私人，致賢的人沒有進身的路，而庸愚不肖的人却充斥要津；就是表面上舉行考試，行政部仍有任意選用的大權，上述的弊害也不能免除。

所以不把考試權和監察權獨立，希望政府不腐敗而有效能，真是『緣木求魚』一樣的困難。反轉來說，監察權和考試權都獨立了，立法權不但可以減輕一部份的責任，並且因考試權獨立，應用考試權去考試

議員，提高議員平均的程度，所立的法也自然更好了。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用人，都須經過考試，便不能營私舞弊，所用的人當然都有才學，而工作的效能自然要大大增進。如果經過考試的官吏，在工作上沒有實在的成績表現，就可以用監察權去彈劾他們，並因此可以使官吏格外勤奮工作。這樣五權分立而互相牽制，可以使政府不流於腐敗而增進工作的效能。

晚近政治上社會主義的趨勢，一天劇烈一天，許多學者都主張現代的政府不僅是一個治人的機關，而且是一個治事的機關，應以分權增強政府工作的效能。基特爾說：『分權的一般學說，包涵珍貴的政治的真理：政府也像發送很高的組織一樣，職權的分工與分離都是重要的。不同的事需要不同的管理，效能也要專司才能獲得，所以立法行政司法等職權，必得由獨立的機關執行。』諾克依佛說：『就現代言，立法部之所以不當執行政職務與司法職務，與其說恐怕侵害人民的自由，無甯說是有害政府的效率。』社會主義學者辛迪尼，惠勃更就經濟分工原理，擬了一個改造政治組織的方案。照這個方案，一國的議會應分為性質不同的政治議會和社會議會兩種。政治議會專管警衛事項及辦理外交殖民國防司法等事。政治議會議決以後，交給內閣去執行。社會議會掌理整個社會的經濟教育及公益事業等。社會議會議決的事項，不交由內閣執行，而交由常設委員會執行。而常設委員會和常設委員會下的行政部，常司通常的監督權，實

際的執行，更由它下面所設的各種事務局負責。這種分工有如工廠的分工。

照職務分工的辦法，對於工作效能的增進，固有很大的幫助，但是政治議會的實權要大於社會議會，兩者間沒有辦法術制，容易侵犯個人的自由權利。三權分立的缺點，在於祇顧銜制而不顧效能，職分的缺點在於祇顧效能而不顧銜制。能夠同時顧到銜制與效能，祇有五權憲法才能做到。

(三)五權憲法的真正平等性

要明白五權憲法的真正平等性，先要知道真正平等是甚麼。要瞭解真正平等是甚麼，便須引主張真正平等的總理的話來說明。

總理說：『……用顯微鏡看起來，沒有兩片葉子是完全相同的。就是一株槐樹的幾千萬片葉中，也沒有完全相同的。……由此可見天地間所發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夠說是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樣有平等呢？天生人類又怎樣有平等的，到了人類專制發達以後，專制帝王尤其變本加厲，弄到結果，比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的。這種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爲的不平等。……』但是「佔了帝王地位的人，每每製造天意做他們的保障，說他們所處特殊地位是天所授與的，人

民反對他們便是逆天。……因此贊成革命的學者，便不得不創天賦人權這一說，以打破君主的專制，……打破人爲的不平等。……到了後來，……民衆又深信人人都是天生平等這一說，便日日做去，想達到人人的平等。殊不知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到了近代，科學昌明，人類大覺悟了，才知道沒有天賦平等的道理。……縱使不願真理，勉強做成功，也是一種假平等。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壓下去，成了平頭的平等，至於立脚點還是彎曲線，還是不能平等。這種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爲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富然不齊，自然不能看平等。像這樣講來，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

從此可知總理主張的真正平等，就是根據各人聰明才智的不同，給以適當的地位，讓各人發展他的所長貢獻於社會，使社會進步。五種憲法的最後目的，在求國家的進步。所以五權分立的基礎，實建築在真正平等的意義上。而其中的考試權和監察權便是實現真正平等的方法。因爲應用考試權，可以選取人民中有才智的人去爲全體人民服務，應用監察權可以防止官吏的不盡責和補救考試拔取的不週。

現代國家事務的繁雜，何止千萬倍於往昔；而在往昔君主時代尙要求國民各盡其能爲國服務，以求得國家的繁榮。那麼今日爲求國家繁榮而能生存在世界上，自然更需要各盡其能的真正平等了。就因爲國家

事務繁雜，能使各種才能不同的人都能適得其所，自然也就更困難了；而且事務一繁雜，意想不到的流弊也更容易產生。所以考試權監察權的獨立，特別適應現代國家實現真正平等的需要。

考試權的運用，不但是實現真正平等的方法，而且更能祛除民主政治的弊端。近代各國政治都向民主一途發展，是有目共見的事實；而民主政治建築在羣衆的心理上，不能表達真正的民意，也差不多爲一般學者所一致承認。因爲羣衆心理大多是模倣的、盲從的、唆示的，很容易爲感情所驅使。例如數千人臨時集會的國民大會，祇要有人在臺上說了幾句痛哭流涕的話，數千人的心理馬上就會隨着他改變。各個人的黨議裏面，某種觀念或某種感情，立刻加強而失了責任的觀念。在他最興奮的時候，種種俠義殘酷的性情，也會立刻發現。錢賓四曾提起在奧格斯堡的會議廳裏，有一幅諷刺民主政治的畫，上面畫着一位醉漢克里昂，他的周圍是一羣叫囂暴徒。這幅畫暴露民主政治爲感情所驅使而不能表達真正民意的缺點，可說是已到了極處。

羣衆心理既有這種缺點，我們就萬不可將政治基礎完全建築在羣衆的心理上，所以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方法避免由羣衆心理所發生的弊病。於是一般學者想出，（一）將政黨格外組織得嚴密，和（二）實行職權代表制的兩個補救辦法。固然，政黨組織嚴密，可以運用政權使政治上軌道；但是政黨的組織愈是向下

級社會越普遍，愈是採用專制的組織，政黨便變了政黨政治的本質，反而不能表現人民的真意向。實行職業代表制，也許有些地方可以救濟民主制的缺點，但是職業代表制本身就有兩大缺點：（一）社會裏有許多問題是歸不到那一種職業裏去，於是這許多問題就不易得到完滿的解決，（二）一個問題，討論的時候，一定有非常激烈的衝突。

所以嚴密政黨組織和實行職業代表制仍不是補救的辦法，唯有考試權的獨立運用，才能免去黨業心理的弱點，因為有了考試，人民選舉官吏和議員根據真正平等的原理來實施，便不致完全流於感情用事，而且選出來的人物，一定都是具有深刻剛毅的專門人才。他們在議會中討論案件，都有他們的獨立意見；交換意見起來，也都能應理智出發，互相切磋，能把各人的意見交織成爲一個很好的議案，或制定一個完善的法律。所以說五權憲法有近止平等性，能使國民貢獻各人的才能爲國家服務而致國家強盛，並能除去民主政治爲感情驅使的缺點。

結 論

總而言之，現代各國都要求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大問題的解決，於是國家的組織不傳要能保障人民的

自由權利，尤要能發揮治事的效能。總理的五權憲法是舉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精華而成，是晚近政治學上及法學上的一個大發明，有縱橫衡制，強大效能和真正平等三大特性；以它的三大特性，可以永樹民主政治的精神，同時又可以增強政府的治事能力。所以五權憲法是世界最進步最完善的憲法原則。

中國是以三民主義為革命的最高準則，前五權憲法是依照實行革命主義的需要而形成的革命政制。就是說三民主義是五權憲法的理想，五權憲法是三民主義的實行。依革命的目的講，當然主義重於憲法。但以革命的政制講，憲法的重要也不亞於主義。那麼，在革命過程中的中國今天，我們對於五權憲法的實行，應當有進一步的努力。

總理經濟思想體系論

葉連生

一、導論

甲 總理經濟思想體系的哲學基礎

總理經濟思想體系，乃建基於其民生哲學；以解決人民的生活爲指歸，以「社會物質論」爲其基礎。總理在民生主義第一講說：「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是以歷史爲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然而什麼是「民生」呢？他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家的生計，羣衆的生命」。由此，我們知道所謂民生，就是人類的的生活，而「社會的生存，國家的生計，羣衆的生命」。都只不過是個人的擴大名詞。蓋社會、國家、羣衆皆由個人組織而成；如無個人則社會、國家、羣衆都無存在之可能。故「民生」問題，我們即可以說是人類求解決「生存」的問題。此種事實，證諸歷史的進化，可以得到一確鑿的證據。人類進化，初爲採拾，次爲漁獵，次爲畜牧，再次爲農耕，又次爲

半工業和商業社會，迄於今日，則已進化到機器時代。此種梯形的進化狀態，我們可以人類求生的事實予以說明：初民時代，草莽未開，天然之菓實，足夠人類維持生活之用，故此時對於吃的問題，並不重要。其主要的任務，乃是克服獸類。獸類如能克服，「生存」即不成問題。其後，因人類不斷的繁殖，人口漸次加多，自然產之菓實，已不能支持人類的生存，故進一步的由抵抗獸類而到征服獸類，此即漁獵行為的發生。大家皆將打死或捕獲之獸，用來充當食物。但自然繁殖之獸類因人之打殺必日益減少，而人類則因已克服獸類，數目反日益加多，此時，人類即發覺專靠自然之獸類供給，必不能長久維持生活。故一二聰明之人士，乃將所獲之獸類飼養繁殖，而牧畜之時代出現。乃人類之食慾無窮，而家畜之生殖力有限，長此以往，勢必仍不能解決生存問題，故聰明才能較強之人，又不得不別尋補救之方，農業社會便又在這種求解決生的要求下產生。農業社會開始之後，人類已實行定居，此時除食一問題之外，又有「衣」一住「兩問題的發生，原始之工人乃在這種要求之下出現。然而工人既有專業，對於農作之事，不復能兼籌並顧，故交換之行為產生（以有易無），這便是商業社會的出現。這時，人類之衣食住三大需要皆已大致完成。但因有交換的行為，對於行的問題漸次注意，故又有道路的開拓，而利於行。迨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皆已滿足，人類便進一步尋求安適，至於近代，則更由安適而進於享樂。人類燦爛的文化，便在這種不斷

的求生中產生。所以，總理說：「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而「民生就是一切社會活動的原動力」。故有時因為「民生不遂，所以社會文明不能發達」。我國辛亥革命之前，便處在這種「民生不遂」，「社會文明不能發達」的狀態中。因此要使民生暢遂，社會文明進步，便不能不從解決人民的生活上著手。然而怎樣才能解決人民的生活呢？總理說：「國家發了大財，就來辦教育，不但是要那一般平民能夠讀書，並且要那一般平民都能生活」。可見必先富國而後方能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但是，要國家富庶，必須我們全國人民通力合作，努力生產，同時更必須使大家之利益，互相調和，使不發生衝突；然後同舟共濟，社會乃如順流之舟一樣的前進。這種道理，總理說得極其明白，他說：「社會上大多數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大多數人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由此，吾人當可明白總理的經濟思想，實含有兩重偉大的抱負，一以富國家，使人民的生活裕如（生產論）；一以促進社會進化，齊人類以抵於大同（分配論）；而兩者皆建基於其民生哲學上。

總理的經濟思想既是以解決人民的經濟生活為指歸，而經濟是屬於物質的，並且為社會的物質，乃自然物質經人工改造而成。沒有此社會物質，便沒有民生。那麼民主主義的哲學就是社會的物質論了，不過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就是總理的民生哲學，雖然是以社會的物質論為基礎，但不就是唯物論

，而且在實行的時候，不但不是階級鬥爭，而是以「社會大多數經濟利益相調和」，在力行的大義之下。各階級的人都以仁愛爲橋樑，努力工作，使社會之利益，得到合理的解決。

乙 總理經濟思想發生的背景

總理經濟思想的發生，有兩種時代背景；一卽我國環境，一卽世界潮流。

我國數千年來皆爲大國，所謂文物之邦，四夷咸服者，至於清末，此種情形乃爲之一變，當時一方面因受太平天國、捻匪之亂，大江南北，滿目瘡痍，社會組織大亂，人民顛沛流離，生產機構，可謂從根摧毀。而另一方面，則因對外戰爭失敗，各帝國主義挾其優越之經濟勢力，以肆行其經濟掠奪；外貨輸入，有如潮湧，於是自給自足之封建農業社會，乃漸次步入崩潰破產之途。在工業方面，亦因不平等條約之幫助（可在我國設廠製造，利用我國廉價工人和原料）加強外貨侵略淫威，我國之手工業，乃爲其完全擊潰，即縱有一二新興工業，亦呻吟於其重壓之下，苟延殘喘。時至今日，不但國防等之工業品須仰賴外人，即平常之日用品與食糧亦不得不靠外國之供給。所以總理說：「中國今日，民窮財盡，所患在貧」。

可是在另一方面，當時的士大夫，如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因受屢次戰敗賠款割地之刺激，又

感於日本維新之成功，故極憧憬於富國強兵之道，對各種富強的上層設施，有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若江南製造局，馬尾造船廠、漢陽鋼鐵廠……等，皆爲此時的產物，而對富強之本的各種設施，反而不加注意。放着豐富的資源不去開發，廣大的生產力不去利用；任廣大的利權拱手讓給外人；而自己却終日高調富強！總理目睹此種現象，自不能無動於衷，故他於上李鴻章書中，痛切陳詞說：「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砲利，學問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惜者李鴻章竟不能採納實行。而眼見民生日困，國難日逼；其如何掃除積弊，發揚生產，以充實國防，而裕民生；乃爲當前最迫切之問題。總理偉大之生產論，乃於這種情形下產生。

至於歐洲，自實業革命以後，社會現象即有顯著的變化；此時，在生產技術方面，機器代替人工，生產能力加強，生產數量加多；在生產目的方面，營利生產代替了自足生產，大資本家利用被機器所排擠下來的「實業預備軍」相互競爭之結果，操縱其間，以最低之工資，買得最高之勞動，於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造成；在生產組織方面，又爲無政府狀態之個人自由競爭，資本家但求利潤之厚，不顧人民生活必須與否，且爲達到大量生產減低成本之目的，仍不惜以機器代替大批之工人；資本家之利潤，雖得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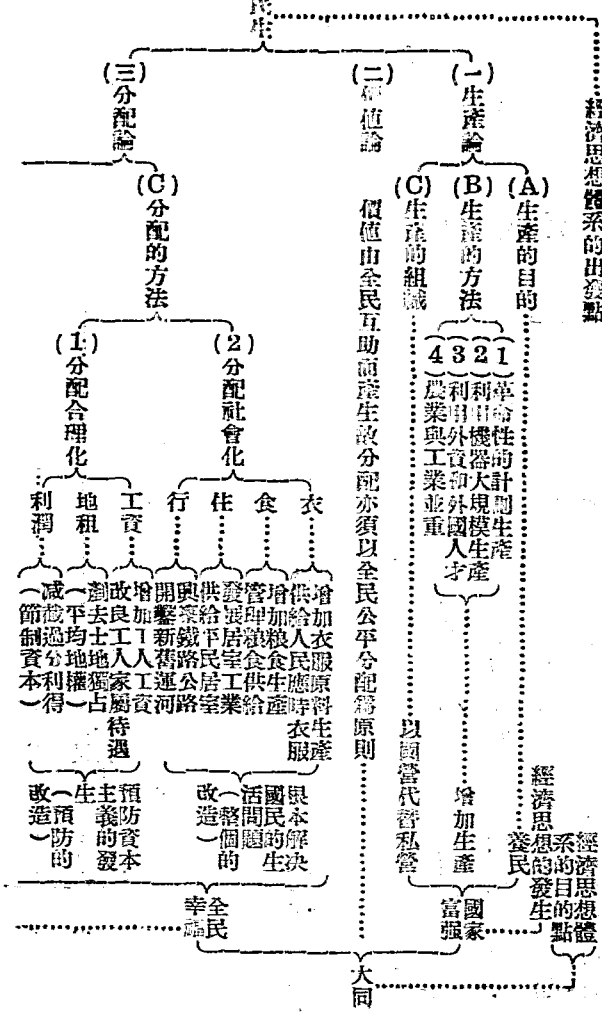
此加多，而掙扎於饑餓線上之勞苦大眾，亦日益增加；所以生產雖有增加，而人民求生存的問題却未解決，且因經濟上的不平等，促成階級鬥爭加速度的發展，社會革命之潮，亦奔騰澎湃，一日千里。總理具先知先覺之明，熟鑒世界潮流，以爲「吾國經濟組織，持較歐美，雖貧富不均之現象，無是劇烈，然特分量之差！初非性質之殊也。且他日歐美之經濟影響及於我國，則此種現象必與日俱增，不可不爲未雨綢繆之計」。故又有分配論的確立。

二、本論

甲、總理經濟與濟體系的大綱

總理的經濟思想，我們在上面所說，是由兩種不同的影響，而產生兩個獨立的主流——生產論和分配論，然而我們覺得在生產論和分配論之間，還有一個中間的東西，它聯系於生產和分配之間，成爲整個的經濟體系的理論基礎，這便是價值論；因此，我們以爲 總理的經濟思想體系是生產論、價值論，和分配論三大項目所組成，而以生產論和分配論爲主流，現在讓我們把它們之間的關係寫下來：

總理經濟思想體系綱領圖表



三民主義研究集

(A) 分配的對象.....	(B) 分配的原則.....
.....公平.....
.....全民.....
.....經濟思想的歸宿.....

總理的經濟思想體系既然如上圖所示現在我們便就此綱領，作進一步的探討：

乙、生產論

總理的生產論，是根據我國當前現實的需要：以解決人民的生活為目的。因此它唯一的任務，就在增加生產，富強國家。茲分論之。

A 生產的目的

總理說：「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蓋在資本主義社會，其一切的舉動皆在「利」。凡利潤高之物品，雖非生活所需，亦爭相製造；利潤薄的物品，雖為人民生活所必需，亦不製造。他們——資本家——只注意到購買力大的少數人的需求，而大多數購買力薄弱的羣衆，却往往被忽視，易言之，即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全部生產完全被供求報酬

主義所控制；生產組織亦爲一紊亂的無政府狀態，自由競爭之結果，生產與消費永遠是脫節，經濟恐慌乃週期性變來，人類社會亦就始終處在痛苦之中。

在以「養民爲目的」的民生主義社會，便完全不與此同，因爲它的目的在養民，不在牟利，所以只要大眾生活所必須的，縱虧本亦照樣生產，假如不是民生所必須，即賺錢亦不生產，務必使生產與消費密合。而達到「登斯民於極樂之境」的目的。故總理之全部經濟計劃，都是「以生存爲中心，以人民爲對象，以社會爲領域，以國家爲經紀」。然後則以「和平漸進方法，建一個以全民共享爲目的的民生社會」。

B 生產方法

(I) 革命性的計劃生產 生產論中的生產特徵，就是執行它的兩重任務，一方面它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完成工業革命，而這種工業革命，不僅是第一次的工業革命，而且亦是第二次的工業革命。所謂第二次的工業革命，就是總理所說的「中國今日尙用手工生產，未進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歐美已臨其第二步者有殊，故於中國，兩種革命必須同時並舉，既廢手工採用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

總理說這話的時候，是正當歐戰期間，當時因戰爭之大量消耗，生產漸有供不應求之感；於是各國皆採行大工業集中經營，結果生產力蒸蒸日上，是爲第二次工業革命，而在另一方面，因爲民生主義的目的

是淺民，故必須突破人類社會進化的慣例（即不經過資本主義這一階段，而由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對於私有制度，與以限制，使全國生產「不爲一二資本家所壟斷漁利」，而另代以有計劃的國營生產，以便達到供給與需要平衡的目的。總理在民生主義第四講所說的「在各地開設大規模的裁縫廠，就民之多少，寒暑的氣候，來製造需要的衣服，以供人民的使用，務使人人都可得需要的衣服，不致一人有所缺乏」的計劃，就是全部生產計劃的一部份。

(2) 利用機器大規模的生產 近二百年來，可稱爲機器的世界，一切生產事業皆以機器代替人工，我國因進步較遲，一切生產尙停滯在手工業時代。總理對此極其注意，他說：「中國人雖多，但是沒有機器，不能和外國競爭，全國所用之貨物，都是靠外國製造，運輸而來，所以利權總是外溢」。這樣非但不能達到總理所說的「供人民的使用，務使人人都可得需要的衣服，不致一人有所缺乏」的目的，而且將淪爲外人的奴隸。故使用機器，以發展國內生產，總理是非常贊成，他說：「中國正需要機器，以替其巨大之農業，以出其豐富之礦產，以建其無數之工廠，以擴張其運輸，以發展其公用事業」。蓋必須有如此之生產情形，利益才不至外溢，乃能與外貨競爭，民生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人同世界方能達到。

(3) 利用外資和外國技術人才 中國是一後進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窮國家，假如要振興實業的話，非但人才沒有，而且財力亦非常缺乏。所以人財兩空，而談振興實業，實有紙上談兵的概。可是高瞻遠矚的總理却不以此爲憂，他早有利用外資和外國人才的計劃，他說：「發展中國實業，人才太不敷用，補救之法，祇有借用外國專門技術人才，聘作客卿，一方面作改善經營方法，實施科學方法。另一方面又負訓練之責，使本國後進，陸續培成，一舉兩得，何樂不爲」。又說：「倘知此爲興國要圖，爲救國之急務，而能萬衆一心，舉國一致，歡迎外國……宿學人才，爲我組織，爲我經營，爲我訓練，則十年內我之大實業，必能林立於中國」。關於資本方面，他亦說：「國家欲興大實業，而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資」。又說：「我們要拿外國已成的資本，來造成中國將來的共產世界，能夠這樣做去，才是事半功倍」。不過專借外國資本與人才，固能使我之實業興盛，然而切不可貪圖成功，至遭損權辱國之大劫。所以總理警告我們：「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

(4) 農業與工業並重 總理對工業之注重已如上述，然而他對農業亦不偏廢。蓋農業爲工業之前提，原料供給之源泉也，況且「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以農立國，直到現在仍可說是農業國家，國民所賴以生存與國家所賴以托命的端在農業，農業生產一方面直接供給生活主要資料，一方面又是工業原料之源泉。無

需要增進人民生活或發展工業，都非先改造農業不可」。故必須農業與工業並進，國家之富強方有保障。

總理對於農業發展改進的計劃，大概可分兩端；一爲人事的：對於這一點，總理列出了①機器問題，②種子問題，③肥料問題，④除害問題，⑤製造問題⑥運送問題，⑦防災問題等七個具體辦法，以增加農業生產；以調和農產品之供求。而另一方面，則爲開發荒地；他說：「荒地有兩種，其一爲無大納稅之地，此種荒地當由公家收管開墾；其二爲有人納稅而不耕之地，此種荒地，當課以值百抽十之稅，至於開墾完竣爲止，如三年後仍不開墾則由公家開墾」。這樣雙管齊下的辦理，則凡地必能盡利，農產品亦就自然的增多了！

C 生產組織

民生主義的社會，所以能避免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的慘劇，便在以國營代替私營的生產組織。雖然民生主義（即是民生主義社會的意思）在生產方面已有至美的生產目的，與至善的生產方法，但苟若無此種生產組織，仍下免於空虛，故生產組織在民生主義社會之生產部門，實居重要的地位。不過此種國營，乃在「凡事業之有獨佔性質，及爲私人所不能舉辦者，當歸國家經營」之原則之下，以漸進的手段，達到國營的目的。並非如蘇聯十月革命時之硬性手段，一舉即欲達到目的，結果反而成可怕的飢荒，故如其「進兩

步而退一步」，則何不一步一步的前進。所以 總理說：「我們所主張的共產主義，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至於生產組織，吾人本 總理之意旨，以爲可以「分爲個人企業與國家經營兩項」。但在此兩項之上，必然還有一最高的計劃機關，統籌全國生產，根據人民之需要，製成各種計劃，分發各生產部門，務必達到「人民都可向國家要求」的目的，茲分述之。

(1) 國營 國家經營之生產組織，乃民生主義社會生產組織之中樞，其任務約有兩種：其一即爲供給人民之食、衣、食、住、行四大需要。 總理說：「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不僅要把食、衣、住、行四種需要弄到很便宜，並且要全國人民都能享受，所以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來造成一個新世界，就要大家對這四種需要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國家來負擔這種責任，如果國家把這種需要供給不足，無論何人，都可向「國家要求」。一部偉大的實業計劃就可說因此而作。另一即爲預防大資本家之壟斷，而爲將來兼併私營變成完全國營任務的有力部隊。 總理說：「凡天然之資源，如煤鐵水力油礦等，及社會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點等，與夫一切壟斷之事業，悉當歸國家經營」。要達到此種杜絕私人資本壟斷的目的，自然便有賴國家巨大資本來嚴密監視，或實行兼併了。不過或許有人要說，國營只不過是私營的一種，異言之，國家經營只不過是與民爭利的下意識的組織，這種說法，乃是忽略了三民主義的連環性，因爲在三民

主義的國家，政府只不過是人民公僕的組織，國家所得即是人民之所得，而且總理亦曾明白的告訴我們，「有土地及大經營者歸國有，則其所得，仍可歸人民之公有，蓋國家之設施，利益所及，仍爲國民福利，非如少數人之私得，徒增私人之經濟，而貧民之苦日甚也」。由此，我們當知三民主義國家之國營與資本主義國家之國營是截然不同。

(2) 私營(即私人企業) 民生主義社會在何期對私有企業是不加禁止；非但不加禁止，而且政府還要保護它的發展，關於這一點，總理說：「凡夫事物，可委諸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爲宜者，應由個人爲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不過此種現象，乃是過渡時期的情形，一俟國家生產組織基礎鞏固，外國工業已不能與我們競爭的時候，政府便要以大資本併吞小資本的方式，實行競爭，以便達到私人企業逐漸減少而至於無的地步，最後便是完全國營、公營(包括各種的合作事業)的民生主義社會。

總之，總理經濟思想體系中的生產，是根據「民生」之真實需要，有組織，有計劃，有方法，有步驟地務必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目的，而導全國人民進入大同的世界。

丙、價值論

價值高爲近世經濟學上的中心問題，因爲它是決定分配的主要因素，不但直接與當前社會大眾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而且足以影響今後社會的發展。因此，許多學者，都不辭勞倦，絞盡腦汁，想替這一問題做一個比較合理的答案，至於今日，能夠供給我們討論的，約有后列四種：

(1) 生產成本說 此說以爲物品之價格，當與生產該物所需之成本相等，物價超出成本過高，生產者難於此一業，競爭之結果，使物價跌落；倘物價不及成本，生產者或則限制生產，或退出企業，促給減少，使物價漲高。

(2) 邊際效用說 此說以爲決定價格之權，在買者而非賣者，買者以物品滿足其慾望，已滿足之程度，依消費物品數量而遞減，其最後一單位所能滿足慾望之力量，爲邊際效用，決定價格之大小。

(3) 供求學說 此說以爲價格之決定，並不由供者之生產成本，亦不由求者之邊際效用；而是由供者所標之實價，與求者最初所願出之買價，經雙方講價還價折中之後，決定價格之大小。

(4) 勞動學說 此說社會主義者倡之可以馬克斯爲代表，其勞力說最爲純粹，馬氏以爲使用價值爲實質，交換價值爲數量，後者簡稱爲價值，價值乃勞力所產生，價值之標準爲物品生產所費社會上必須之勞力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time)。

上述四種學說；(一)(二)兩說皆只注意到一方面——前者只注意到供的方面，而後者則又只注意到求的方面——其缺點甚為明顯。第三種雖然供和求雙方都注意到，然而它只注意到市場的表面狀態，並未注意到真正的問題核心。所以這種學說，對人民的生活並無改善的功能；而且，今日之資本主義社會，其所發生之貧富懸殊之現象，雖其原因甚多，但主要之原因，則不能不歸之於它。至於第四種，則其錯誤本甚明顯；誠然，我們並不否認生產的必須努力，為價值的決定因素之一；我們亦不否認資本家和地主會有剝削勞動者的罪行。但勞動力並不能完全決定價值；資本家之利息，利潤，和地主之地租亦並不完全是自勞動者，亦極顯明，蓋社會上除勞力之外，還有許多的力量都直接間接與價值發生很大的影響，所以總理說：「所有工業生產的剩餘價值，不全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的份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的貢獻」。由此，我們可以說 總理的價值論乃是社會價值論（為着進一步的證明我們的推論，我們在後面，特再引一段 總理的語作為證明。）因為他認為造成價值的因素的，是社會上全體有用有能的份子。由於他這種獨特深刻的認識，故有他特殊的分配論的確立。這便是 總理的偉大；亦是他的成功。

（附錄）——總理價值論引證：本節引證，原文載民生主義第一講 總理對剩餘價值論的批評。

「……就紡紗織布而論，我們便要想紗和布的原料，由此我們便要推及於棉花。因為要研究棉花的來源，我們便要推到種種農業問題。要詳細講到棉花的農業問題，便不能不推及到研究好棉花種子，和怎麼種植棉花的那些農學家。當采下棉種之初，便不能不用各種工具和機器去耕耘土地；及下棉種之後，又不能不用肥料去培養棉花的枝幹。我們一想到那些器械和肥料，便不能不歸功到那些器械和肥料的製造家和發明家。棉花收成之後，再要運到工廠內來紡紗織布；布和紗製成之後，再運到各處市場去賣，自然要想到那些運運輪的輪船火車。要研究到輪船火車之何以能夠運動，首先便要歸功到那些蒸汽和電氣的發明家。要研究到構造輪船火車是些甚麼材料，自然不能不歸功於金屬的採礦家，製造家，和木料的種植家。就是布和紗製成之後，社會上除了工人之外，假若其餘各界的人民，都不穿那種布，用那種紗，布和紗當然不能暢銷。布和紗沒有大銷路，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怎麼樣可以多賺錢，可以多取盈餘價值？就這種種情形設想，試問那些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所取得的盈餘價值，究竟是誰的呢？試問紗廠布廠內的工人，怎麼能夠說專以他們的勞動，便可以生出那些布和紗的盈餘價值呢？……由此可見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的份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

丁、分配論

總理分配論的最大目的，是在導人類進入大同的安樂社會。因此他所主張的分配論的內容，隨時都以打破人類在經濟上的不平等；和達到分配社會化兩大任務上努力，茲分論於後：

A、以全民為分配的對象

所謂分配，乃就各種生產的財貨或進益，以分派於參加生產之要素。異言之，分配只是土地、資本、管理、勞力的一種報酬，假如一個人既不是勞工，企業家，又不是地主，資本家，而只單具一個「人」的資格，而這個人，不管他是無機會參與生產，或是老弱殘廢不能生產者，都沒有參加分配的權利，這便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

「民主主義的目的，是養民，而這個「民」，乃是全體的人類，並不限於少數的地主、資本家、企業家、或勞動者，所以在民主主義的社會裏，對任何人，國家都負有保護的責任，任何人皆可向國家要求生存的權利，也即是說，只要具備了一個「人」的資格，都可以享受分配的權利」。這便是 總理所說的「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不僅要把衣食住行四種需要，弄得很便宜，並且要全國人民都能享受，所以我們要實

行三民主義來造成一個新世界，就要大家對這四種需要，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國家來負担這種責任，如果國家把這四種需要供給不足，無論何人都可向國家要求」。這樣便無論老弱殘廢皆能享受分配了。

B、以公平爲分配的原則

總理的分配原則，簡括言之，即「公平」兩字，因爲歐洲自「實業革命後，實業所需人工既漸減少，而生產又較前增加，資本家以機器爲資本，壟斷利源，工人勞動所生產，皆爲資本家所享。」「工人之所得，不過一小部分，地主資本家所得反居多數」。總理認爲此種現象的發生，乃是供求報酬主義在作祟；故爲根本解決起見，他對於分配的定義是：「分配者，即以所產之物分配而供人之需也」。這樣當然是再公平沒有了。

不過 總理所主張的公平，並不是機械的平等。總理深知「天地間所生產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不相同，自然不能說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怎樣能平等呢！」所以「分配的多寡應觀其勞心勞力之多寡」。由此我們知道他所說的「公平」，乃是人類發展的地位平等，而不是硬要把那些才智高的壓到和愚昧的一樣。因爲苟若如此，則社會便沒有進步，人類必要退化。」

然而民生主義社會最終的目的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總理對他這種理想，並不會放棄。所

以，他雖一方面利用人類聰明才智之不同，盡量鼓吹人類事業心的奮發；而另一方面，却極力提倡人類互助的道德，他說：「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的人，當盡其能力，而服百十人之務，造百十人之福……至於全無聰明才力的人，也應盡「己之能，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如此大家皆在「人生以服務爲目的」的旗幟之下，各盡所能，努力服務。這樣，既無目的達到，社會即將停滯的笑話；又無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慘狀，而大同社會乃在大眾共同努力之下，自然地一步一步到達，這便是 總理分配原則的成功。

C 分配的方法

分配論中的分配方法；實負有兩重任務：它除消極的對經濟行爲的分配——如利潤、利息、地租、工資——盡力使其達分配的合理化之外，積極方面，它還要達到分配的社會化——供給人民以衣、食、住、行四大需要，這是 總理分配理論的最大特色，而爲其他主義所不能及的地方，請申論之：

1、分配的合理化 所謂分配的合理化，就是人類對社會發生各種經濟行爲（生產方面的）的報酬，使其合乎常理。在今日，勞動者雖然亦因工作而有工資的報酬，和地主因使用土地而得地租，資本家因投資而得利息，利潤的報酬是一樣，但其間之差別，則至足驚人，「工資所得不及百分之十，而地租、利息

則百分之九十餘也。故有生利之工人則恆受飢寒，而分利之大地主及資本家反優遊自在，享社會幸福，豈非不平之甚」。我國目前雖尙無此種大資本家與大地主出現，然「要爲繕吾羣所有事」，則不能不預先防之。故力總理極力主張限制大資本家，大地主的發生，務使此種不平等的現象消滅，而達到分配合理化的目的。

(子)地租 地租即是由土地所有權而生的所得，其超過原來所得的原因，係由於它有獨佔性。總理說：「世界地面本屬有限，所有者壟斷其租稅，取生產所得之利益而坐享其成，與工作者享同等的利益。」依照李嘉圖(D. Ricardo)之地租法則，地租價值所以能繼續增高的原因，人口增加實爲重要原因之一，此種事實，總理亦曾詳言，他說：「像上海黃浦灘的土地，現在每畝要值幾十萬元，廣州長堤的土地，每畝要值十幾萬」，「這種增值完全是社會的功勞，衆人的力量，和地主沒有一點關係」。所以他接着說：「社會之進化，土地再經過二三十年後，其值可增至萬倍。此萬倍之利，屬諸何人乎？地主是矣」！「試問社會之進化，果地主之力乎？若非地主之力，則隨社會而增加之地價，又豈應爲地主所有乎？」針對此點，總理認爲要達到公平分配，便要把這種非分的所得，盡量地減低，這便是平均地權的使用，在平均地權行使之下，一方面確定地價，照價收稅，以減少地租所得；而另一方面，則爲照價收買，故一

對什物歸公的時候，政府就可依照原定的地價，向地主收買。而地主所得之資本，又可以遺產稅，所得稅……等節制資本的方法，使之消滅。這樣，既無工農階級暴動的慘殺，而地租的不平已消滅。

(丑)工資 工資是工人工作的報酬，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工的地位原極重要，然而因為大批「實業後備軍」相互競爭之結果，其所得實少得可憐。「以英國全國入息通算，每人均分年終應有三千元計之，除子女老少不能工作外，生產工人實不過四分之一，而每人年中生產實四倍於三千元，即萬餘元，而所得報酬之價值，不過五六百元，是工人所得不及百分之十，而地租，利息則百分之九十餘也」。這種原由，乃因「工人非富於資者，其衣食全藉持乎每日之工值，一日罷工，有甚至日不得一餐者，其苦狀何如耶？資本來以其無業不能生活，罷工必不能久，泰然處之，不稍爲動。工人至飢寒交迫之時，不得不飲恨吞聲，重就資本來之範」。此種強迫的剝削，乃 總理所深惡痛絕，爲着解決成萬勞工的痛苦，和達到分配合理的目的，他主張至少要「使勞工得勞力所獲之全部」，且更重要的一點，即是工資之決定，不再是供求的報酬主義，而是以勞工及其家屬生活必須品及享受娛樂與幸福等用品來決定，而「此種娛樂與幸福，本爲一切人類所應享，但在他國勞工與窮苦之人，常無享受之權利」。

(寅)利潤(包括利息) 自實業革命之後，資本來之所得亦即超過其所值，總理說：「機器發明

，利源盡爲資本家所壟斷，工人勞動終身，所生之利益盡爲資本家所享」。針對着這一點，總理對於國營實業是非常的重觀，雖然爲了打擊外資和驅逐外資起見，民生主義社會在初期（即低級的）是允許私人企業相當的發展，但一俟國營實業之基礎穩固，外資亦已驅逐出境的時候，政府立即就需以高度的所得稅、遺產稅、營業稅……使資本家之利潤，減低到近於零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因爲國營資本非常雄厚，故以大資本併吞小資本的方法，使資本家自願放棄其所經營之事業，變管齊下的結果，利潤乃歸大家享受。

2、分配的社會化 實業完全營之後國家有大量的所得，這時除將一部份的物品儲藏以備災荒之需用外，便以之分配於全體人民。總理說：「把全國大鑛業、大商業、大工業、大交通部由國家經營；家國辦理那些大實業，發了財之後，所得向利益，讓全國人民都可均分，好像中國的宗族主義，用祖宗的公產，舉可靠的家長去經營實業，發了大財之後，子孫可以同分其利，有貧窮無告的，都可以利益均沾一樣」。

（子）食——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吃飯問題」。這與我國一貫的「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的精神是一致；但是近數十年來，我國以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而食糧却須向南洋各地買進。總理對於這一反常的現象，當然是十分的注意，所以他一方面主張「耕者有其田」以鼓勵農民力作；而另一方面又以科學的方法，利用機器，實行大規模的農場制，同時更製造各種肥料，改良種子，這樣多方的努力

，糧食必大大的增加，民食問題必能解決。

(丑)衣 「穿衣是民生主義第(一)個重要問題」。我國向稱衣冠之邦，對於衣着素來是注意。但自機器發明之後，外國之紡織極其進步，我國因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受帝國主義之經濟逼迫，始終都處在原料供給的地位。因此衣的原料，大多從國外輸入，人民的衣着，完全靠外國維持。總理爲要解決國內衣的問題，故主張首先即須以政治力量取消不平等條約，把外來的經濟壓迫解除，然後則盡量發展關於衣的原料的供給，衣的原料有了，則「在各地開設大規模的裁縫廠，就民之多少，寒暑的氣候，來製造需要的衣服，以供給人民的使用，務使人人都可以得到需要的衣服，不致一人有所缺乏」。

(寅)住 「居室爲文明一因子，人類由是所得的快樂，較之衣食更多」，所以民生主義社會第三個要解決的問題，便是住的問題。總理主張在國家整個的計劃之下，由政府監造各種廉價的房屋，並且供給人民之水、電……等一切日用品。

(卯)行 「人生時期內，行動最多；各人之有行動，故文明得以進步，……惟中國現在尙無法使個人行動容易，因古時大道既已廢毀，內地尙不識自動車爲何物」。故總理主張國家應築各種道路，「以利民行」。實業計劃中十萬英里之鐵路和百萬公里之碎石大道的興築，以及整治黃河，長江，修治固有

運河，開鑿新運河等，皆爲在「以利民行」的目標之下所定的計劃。

三、結論

經過上面的闡述，我們覺得 總理的經濟思想，不但能前後互相呼應，上下互相關聯，自成其一獨特的嚴密系統，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理論與實際雙方都兼顧到；在實際方面，他因中國（或其他的後進國家）之特殊需要，產生了偉大的生產論；同時，他又從生產論中，認識貨物價值的造成，是由於社會全體「有用有能」的份子，因此有他獨特的價值論發生；而由這種價值論，再確定他的分配論。這樣以便以一次革命的手段，使人類進入共享共有的社會（即社會主義的社會），而無須再經過資本主義這階段，一方面他是拯救了世界上大多數落後的民族，使其有自謀發展之路。而另一方面，則更減除了社會革命的慘殺。其功業之偉大，自非一般之革命者所可比擬。

除此之外，關於經濟方面的，總理尚有許多寶貴和獨特的見解（如幣制等）：惜本篇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兼顧並論，而只能就其主要的系統，加以闡述；尙望海內賢達，羣起攻錯，以底於成。

卅年五月廿五日寫於香港正大

民生主義研究

胡宜池

引言

我們要了解民生主義，首先便得明瞭「民生」二字的意思是什麼？所謂民生，國父孫中山先生說便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註一）。在這四項之中，當然以「人民的生活」爲最重要。何以呢？因爲只要「人民的生活」能夠得到解決，其餘「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也自然會得保障與安全。這個理由很明白，用不着詳說。然則「人民的生活」的內容，究竟包括些什麼呢？推究國父的意思當爲食衣住行，（註二）既然如此，那我們便可說，所以謀民生問題之解決者，最根本與最首要的，即在謀人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之充分獲得，惟有這樣的民生主義，才有力行的基礎，才不致成爲空談。因此，我們可歸納一下，即所謂民生主義者，從抽象的觀念上看，它是謀解決「人民的生活」（即人民的四大需要）的一種思想，一種理論；但從具體的實踐上看，那它又成爲解決「人民的生活」的一種方法了。

一 民生主義的性質

民生主義是資本主義嗎？這個問題在別有居心與歪曲事實的人，答案是肯定的。其實，民生主義不但不是資本主義，而且還要「打破」私人資本主義的「資本制度」。（孫）。因為私人資本主義（以下簡稱資本主義）主要的特徵是私有財產，而所以造成私有財產，乃是由於「資本主義以賺錢爲目的」（孫）的緣故；這個目的根本與「以養民爲目的」（孫）的民生主義相衝突，故中山先生主張「打破」它，推翻它。

但，就資本主義主張機械生產，以發達生產力的一點看來，似乎與民生主義沒什麼不同。其實，這也不盡然。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機械完全是私人所佔有，而民生主義制度下的機械是國家佔有的。二者的目的，雖同是發達產業，然亦有國營與私營的互異。發達私人經營的產業，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精神，它的目的，一樣是免除了私有財產制時存在。而發達國家經營的產業，便必然地會發達國家資本。發達國家產業，可稱爲「國家產業主義」（孫）；發達國家資本，則可稱爲國家資本主義。但無論其爲國家產業主義也好，國家資本主義也好，其產業或資本爲國有則一。「國爲民國，國有何異於民有？」（孫）而國有爲社會主義的必要步驟。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相反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對頭。然則爲何尚有人將與社

會主義同目的，同性質的民生主義解爲資本主義呢？若說『國家資本主義』總掛上『資本主義』四個字，便一口咬定是私人資本主義，那正如一個人以張生和李生同名字即爲同一人一樣的幼稚，愚昧得可笑！

至於那些忽視國營實業的關鍵作用，而謂民生主義的節制資本爲發達小有產者的人，其愚昧幼稚正可與前述『媲美』，根本可不必與他們爭辯。

爲使我們對於民生主義與資本主義二者有一簡明區別起見，列表以示於后

民生主義（國有國營）國家主義（生產力）十公有財產（生產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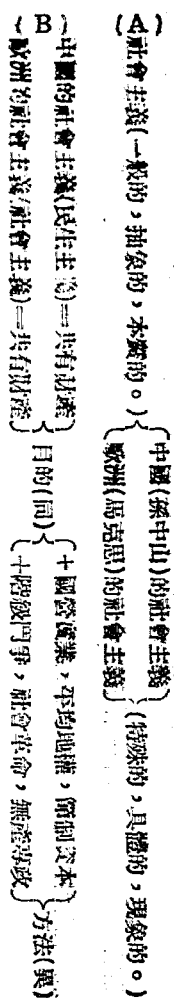
資本主義（私有私營）國家主義（生產力）十私有財產（生產關係）

觀表可知民生主義不是資本主義就很明白了。

『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孫）一般說來，『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還有不同的地方嗎？有的！它們的『不同』就在於『辦法』（孫），何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呢？因爲兩者同要實現『共有財產』（孫）的目的。但實現共有財產的方法，民生主義是國營實業，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孫），故主張和平的手段；共產主義是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無產專政，採用暴力的手段，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是一個抽象的、本質的概念，故爲一般的，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國度裏，它要與其

特殊情形相適應，始可存在。否則便是牛頭合在馬身上，而根本不通。既然如此，那我們便可說民生主義是適合中國社會情形所產生的主義。它是社會主義中的一個特殊型，不妨稱它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或是稱中山的社會主義。那種真民生主義只同目的不同方法的社會主義，為反映歐洲的社會背景所產生的，自然為社會主義中的另一特殊型。這不妨就直稱它為歐洲的社會主義，或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從此社會主義便有了兩種了。

為示一般社會主義之分類，與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式的)之異同，特別簡表，以示於后(註三)：



民生主義既不同於歐美的資本主義，又不純是歐洲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然則是否此二種主義即與民生主義無異呢？若說沒有，那價值近於武斷。因為中山先生在他「民報發刊詞」中，說「予維歐美

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可知他的民生主義，還受了歐美民生主義的影響。舉此一點，可見民生主義絕不至會不和歐美的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發生關係。現在，且讓我們來看看事實，即看看民生主義中是否滲進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成分。

首先，講資本主義吧。我們知道，組成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是機械生產，生產關係是私有財產，正因為生產是用機械，所以它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率；同時也就在人類社會中盡了進步作用。這是它的優點。但，不幸的是此機械生產是私有私營。因此生產關係也在私有財產高度的發展情形下，而形成此等社會中的貧富懸殊的對立。而且又因私營企業，以追逐利潤為目的，以致生產部門的均衡狀態破壞，與夫因生產過剩而引起經濟恐慌，使社會呈現不安，使人類互相殺戮（戰爭）。而其結果，更使貧苦受壓榨人數增加；並且又增加其所受經濟壓榨的程度，於是社會革命（流血的）便不可避免。這是資本主義的劣點。中山先生洞察了此種優劣，並明白了此制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所以在他創立的民生主義中。雖然採用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同時却提出了國營實業以發達國家資本，造成一個國家資本主義，使生產關係改善，以與生產力相調適。這樣一來，他揚棄了私人資本主義的劣點而獲得資本主義的優點了。這便是民生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

其次，再講到社會主義。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雖此乃僅指目的而言，但其與社會主義關係之深切，則不難於此見到。民生主義的目的既與社會主義同，於是社會主義之書粹又被它擯取了。然則，社會主義主張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無產專政的方法去打破貧富階級的對立，是否也爲民生主義所用呢？不，應不可能，因爲那一種方法，適用在那時那地，是要決定於特殊客觀環境的。方法原來就是一種現象，現象是常變的，它在歐洲的這個時空中，會呈現出一種現象，因而自然產生一種與此現象相配合的特殊方法。反之在中國亦然。所以在歐洲可以適用的社會主義的方法，到中國來，便不見得適用。如果不顧「自己的社會情形」（孫）而「一味的盲從附和」（孫），那不但是反科學的，而且「對於『圖計民生』均有『大害』（孫）。什麼是適合我國『自己的社會情形』的方法呢？那便是孫先生所說的：第一個是平均地權，第二個是節制資本」，外加一個「發展國家實業」（註四）。唯有這樣，才合科學，才是活用方法，才能夠說得上是真正的「學外國之所長」（孫）。因此，在這裏，我們又可看出民生主義是如何的揚棄了社會主義的不適合國情的部份，而保留了它的適合部份。這便是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

綜上所述，可知民生主義是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與伏嚇變後所創造的一個新理論，並且也可以看出

它的優越性，綜合性，創造性，科學性，所以我們若說民生主義是攝取歐美各種「制度之精華，而同時參酌中國的國情」再加以孫先生「自己所獨見創造的，許多最理所應得之整個的完美的思想體系」，（總裁語），那是再也恰當不過的。

（註一）見「民生主義」第一講

（註二）參照「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第二條

（註三）參照葉青著「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三九頁

（註四）見「民生主義」第二講

二 民生主義的內容

既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能在中國這個社會中建立，而民生主義則為今日中國所必需，那末我們要確立一個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其理由就很明顯了。

我們知道，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根本即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經濟思想，可以建立為一個有系統的經濟制度。單這種經濟制度是怎樣的呢？依我看來，其主要的內容可分為生產與分配兩方面。關於這

點，中山先生曾說：「經濟學之概說，千端萬緒，分類周詳，要不外生產與分配二事」。可知生產與分配之重要。生產一詞，在經濟學上解釋，是人類以勞力去改變或創造宇宙中固有的物質動效用，以滿足人的慾望之意。關於人的慾望有那些種類，各經濟學家的說法不同，但就最基本和最具體的說來，總不外爲求生。要求生，食、衣、住、行，便得首先解決。爲食、衣、住、行，得到解決後，始可進求情愛，誇耀、醫藥、衛生、等欲望的滿足。而民生主義的生產論，它的前題就在豐富民生的四大需要。不過，我們要知道民生主義豐富民生四大需要的方法很特別，它是要求社會化與合理化的。正因爲如此，它乃主張以國營實業、機械生產、發達合作、作爲達到民生富裕的手段。這是怎麼說的呢？請看後面吧。

(一)機械生產 所以要採用機械生產者，乃因機械生產效率宏大之故。中國生產落後，如要高度的發達產業，以期「迎頭趕上」歐、美各國，則舍採用機械不爲功。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曾說：「中國工人雖多，但是沒有機器不能和外國競爭。全國所用的貨物，都是外國製造運轉而來，所以利權總是外溢。要挽回這種利權，便要以國家力量振興工業，以機器來生產」。談到機械生產，我們便不能不隨時牽涉到利用外資問題。他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說：「我國之實業欲與美國之實業並駕，實非有如現在漢冶萍之鐵廠三四百所不爲功。然漢冶萍一廠成本已千餘萬矣，今欲多達三四百廠，非有資本三四十萬

萬不爲功。如此鉅資，我國萬難自集。則非借之外人不可。」「倘知此爲興國要圖，爲救亡要務，而能萬衆一心，舉國一致，歡迎外國雄厚資本博大規模，宿學人才，精練技術，爲我組織，爲我經營，爲我訓練，而十年內我國之大實業，必能林立於中國中。」但，利用外資，必須我們自己「立於原動地位。」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第七章中警惕我們說：「惟正可利用其資本，而主權則萬不可授人。事事立於原動地位，則萬無危險。」

(二) 國營實業 爲何要實行國營實業呢？無疑的是在捨棄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病。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弊之生，是在於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所以造成生產的無政府的狀態，其原因乃在個人主義的極端發達，國家無干涉私人企業自由之絕對權力，而且一切由私人經營的企業，皆會附屬於國家。這樣，便可達到真正的計劃的經濟狀態，消極地，免去資本主義無計劃生產之弊；積極地，還可以發達國家資本。雖然中山先生在「實業計劃」中未曾明言探行計劃經濟，然詳細體驗其精神，實與計劃經濟同旨趣。而臨全大會宣言中，曾表示過「根據民生主義之信條，實施計劃經濟」。但在此地有須注意者，即國營實業中究應包括那些部門呢？依據國父意思，當爲「凡事業之有獨佔性質，及爲私人所不能舉辦者」或「事業之宜於國營者」（臨全大會宣言）屬之。故其範圍甚廣，舉其要者，有銀行、交通、工業、礦業、農業、水利、墾務、商

業，合作等等。

(三)發達合作 合作是經濟組合的方式之一，它不但在生產部門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而且在分配一方面，也盡了它特殊的功能，因為合作不以營利為目的，而以服務為目的，如能普遍發展，則社會上榨取階級的資本家，商人便無由存在。而利潤制度也可於無形中消除。合作社物品的分配方法，也是在公平分配的原則下分給社員全體的。所以它又能達到生產品分配的社會化，關於這一點，國父在他的「民生主義」第二講中也曾說到：「如英國新發明的消費合作社：就是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貨物。……用這種分配的新方法，便可以省去商人所賺的價錢，免去消費者所受的損失。」就這種新分配方法的原理講，就可說是分配的社會化了。合作既然有這種功能，故國父非常重視它，而且他還認為「將來中國實業建設於合作基礎上」（註五）呢！他既如此重視合作制度，所以他便主張要把它普遍發達和推廣，他在「地方自治實行法」中，曾指定創設農、工、交易、銀行、保險五種合作為地方團體必須辦到的事情。由此可見合作一項，為解決民生問題中生產與分配兩方面最重要最基本而且為最有效的方法了。

綜上所述，可知民生主義要達到豐富民生的目的，便不能不致力於生產的發達。但要致力於生產的發達，便不能不注意到生產的合理化與社會化，便必須從機械生產，國營實業，發達合作的方法入手。必如

此才能免除重蹈資本主義的或蘇俄採行新經濟政策以前的覆轍。

生產是分配的前提。生產問題既然得了解決，那我們現在便需要再進而討論分配問題了。因爲不如此，單只解決生產問題一項，而分配問題便完全不管，民生問題還是不能完全解決的。這個理由，只要看過民生主義的人，都很明白，用不着多說。

我們知道。民生主義分配論的原則是要達到衆人能夠公平地分配到社會的生產物品。換句話說就是個人對於食、衣、住、行、『四種需要都不短少』（一孫）。正因爲分配是以個人爲主，故分配對象便是全民。能夠公平分配，故合於分配合理化的條件，能夠以全民爲分配的對象，故又合於分配社會化的條件。分配既然合理化和社會化，因此，凡社會所生產一切有關於人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的物品，人民均可以在平等情形下來協作共享，這是民生主義分配論的特異之點。它不同於私人資本制度下的分配，因爲私人資本制度下的分配，因爲私人資本制度下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是不以全民爲分配的對象的，它只『向一個目標來進行，這個目標是什麼呢？就是賺錢……像這樣的分配方法，專以賺錢爲目標，民生問題便不能完全解決了』（註）。現在把民生主義的分配方法，分述於後：

（一）平均地權 所謂平均地權者：就是使人人都有平等使用土地的權利；也就是使土地所生的利益可

以人人均霽，而不爲少數地主所獨享。使人人能平等享受土地使用權使人人能均霽利益，這不是社會化合理化是什麼？但在此地，也許有人會問：爲何國父要提行這個辦法呢？原因乃在他目睹「中國現在雖然沒有大地主，但是一般農民有九成都是沒有田的，他們所耕的田，大都屬於地主的，有田的人，多不去耕。黨道理論，農民應是爲自己耕田，耕出來的農品要歸農民自己所有。現在的農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耕田，所生的物品，大半是被地主奪去了」。〔見「民生主義」第三講〕。他爲了要使這種不平等的農業生產兩得合理的解決，因此，他便提出了這種平均地權的辦法。這個辦法怎樣施行呢？簡單的說：「就是政府照價收稅，照價收買」，以及等「地價定了之後，就要把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爲公有」。只有這樣「才是國民黨所主張的平均地權」從此可以看出它是採和平的轉變方式，與共產主義之主張暴力沒收者不同。

(二) 節制資本 所謂節制資本，就是節制私人的資本，使其不致壟斷社會財富，陷民生於苦痛境地。不過，節制資本的具體辦法，國父未詳告我們。但據「民生主義」第二講中所說，當爲「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種方法就是……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公有；第三直接征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就第一種方法來說，『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護工

人的衛生，改良工廠和機器，以求極安全和極舒適的工作」。就第二種來說，「就是要把火車、電車、輪船以及一切郵政、電政、交通的大事業，都由政府辦理」。此即國營實業中之一部份。是知欲節制私人資本，預防大資本家的壟斷，國營實業以發達國家資本乃必不可少。這是怎麼說的呢？因為國家資本既經發達之後，它便可以用大資本家併吞小資本家的方法，如「大魚吞小魚」一樣的把私人資本加以自然的節制。由此可見節制資本與國營實業二者原有相互爲用的關係。至於第三種方法「就是用累進稅率，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以及過分利得稅。這在一方面可以有增加國家財源的功能；而另一面還可防止私人資本的過分龐大。第四種方法，就是發達合作事業，以便逐漸廢除利潤制度，使私人資本根本無由產生。以上四種方法，都是用來節制私人資本的。正因私人資本本要受節制，國家資本才得發達。國家資本發達到極點時，私人資本乃自然而然的被併吞，甚至全部廢除。因此公有乃漸實現，而真正的共產社會乃能達成。

綜觀上述二項辦法，可用民生主義的分配，皆是以和平方法爲主。而且是主張採取漸進式的平均地權，和漸進式的廢除私人資本。等到地租，利潤，利息廢除之後，社會上便根本不會有貧富階級之分和剝削人的事實存在。人人平等。而且人人都須自食其力，不能有濫寄生在誰身上，因此人人又都是勞動者，到

那時候，再依照各人所盡的能力，取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人各取其所需的物品。是物品即爲工資，於是貨幣工資制度自然會沒有。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以反『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備其流』，與『力惡其不出於身也』的理想的大同世界，在這時候，乃真正出現。所以共同享受或共有財產，是民生主義的目的——最後的目的。

（註一）張綱中著「三民主義研究」頁六八

（註二）蔣中正全集「第六輯頁八」

（註三）參看宗華著「蘇俄經濟政策概論」(一)(二)(三)節

（註四）見「臨全大會宣言」

（註五）「孫中山先生外集」頁五三

（註六）見「民生主義」第三講

結 論

總之，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是綜合和統一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其特殊適合中

國國情的部份)而成的。它在生產方面，接受了資本主義的機械生產與生產社會化，同時也接收了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全部生產方法；但就另一方面說來，它揚棄了資本主義的無計劃的生產，和追逐最大利潤的生產，因此。它在生產方面，只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利；而無生靈過剩和產業均衡狀態破壞之弊。在分配方面，它亦復如此，即資本主義的私人佔有分配不均，貧富階級對立爲它所拋棄，社會主義的激烈的解決分配問題的方法，亦爲他所不主張，而以適合中國情形的解決分配問題的方法來作替代。因此它在分配方面又具見有獨創的特徵之點，而無盲目地附從那種不合時宜的方法之點。這便是民生主義經濟制度的優美性與完備性。惟有在這種經濟制度，我們才可以發達生產，以充裕民生四大需要。必如此，『衆人能夠共產』的『大目的』乃能達到，(孫)而永久的大同世界乃能進一步由此實現。像這樣好的制度，我們有什麼理由不採用？像這樣好的制度，我們又爲何不應及早確立？

民生主義經濟制度底內容

陳杏英

民生主義不主張私有財產，所以不是資本主義，也不主張階級爭鬥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不是歐洲底社會主義。它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辯證底統一，在方法上可以說是國家資本主義，在目的上可說是國家社會主義。它有它的內容和特點，對於民生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容，我們根據國父底遺教可以歸納爲下面六點：

(一)平均地權：土地爲主要的生產手段，私人壟斷底結果，造成許多的地主，他們可以坐享大量地租底收入，同時因爲社會繁榮結果而增漲的地價也成了私人不勞而獲的所得。於是貧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形成了地主與佃農對立的階級。所以國父說：『土地問題就是經濟問題中底一個大要素』。要怎樣才可解決土地問題呢？惟有實行國父底平均地權辦法。但是在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土地底肥瘠既不一致，人口的稀密又有差別，要想平均土地底所有權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平均地權底意思是意味着平均土地底使用權，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土地底收益。因此平均地權並非承認土地私有權底永遠存在，而是以和平底方法以逐漸達到土地公有底目的。平均地權底最後目標既是實現土地公有，那末爲什麼不立刻沒收地主底土地以消滅地權呢？這是因爲沒收足以引起糾紛，且亦有失公平之慮。故採取和平轉變性的平

均。如何平均法呢？照價徵稅，照價收買和漲價歸公。照價徵稅和照價收買二者並行，則地主既不致以少報多，亦不敢以多報少。而且甚爲公平。這是最完善底辦法。至於漲價歸公，更是合乎公平底原則，『因爲地價漲高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推到這種進步和改良底功勞，還是衆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所以由這種改良和進步之後所漲高的地價，應該歸之大眾，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民生主義第一講），像這樣一方面讓地主以重稅，以限制其地租底收入，並限定其土地最高額，以杜絕土地底集中，一方面用國家底資本，照價收買地主所有底土地，『把全國底土地分到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孫）。於是土地底使用權便得平均，土地底收益便得大眾共享。到了相當時期，國家再實行大規模的集體農場，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從事農業底生產，於是土地所有權便變爲社會化了。土地既沒有壟斷，於是因地主與佃農兩產生底貧富懸殊，便可從此絕迹於人類底社會。在這裏，我們必須明瞭國父平均地權底目的，除了直接解決土地問題外，還含有兩層資本底意義，『因爲中國現在最大收入底資本家只是地主』（民生主義第二講），地主以其資本投到工商業方面，便可漸漸變爲工商資本家，要使地主不變爲大資本家只有用平均地權底辦法，使地主不能壟斷鄉村底土地，繼續坐享城市土地底不勞的增值。這可說是平均地權底間接作用。

(二) 節制資本：資本是生產底要素，對於人類底幸福和社會底文明有直接的貢獻。民生主義底節制資本當然不是節制資本底本身，而是節制私人底資本，解決資本底問題，使資本不致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放爲壓迫勞動者底工具。因爲資本集中底結果，便使資本發生種種底弊害。近來各種社會問題底興起，都是由於貧富不均底原因，中國今日雖然沒有大的資本家，階級的分化未明瞭，『似可無庸言及社會革命，然而物質文明，正企業家縱橫發展之時，將來大資本家之富必有過於煤油鋼鐵大王者，與其至於已成之勢，而思社會革命，何如防微杜漸，而弭此貧富戰爭之禍於未然乎』（孫），先知先覺的國父見到了社會革命之不可避免，爲一籌永逸計，於是提出了防患未然的節制資本辦法，使資本問題以與土地問題同時解決。國父說：『中國此時資本還沒有發達，我們應該未雨綢繆，趕緊設法來防備，免得再蹈歐美的覆轍』。因我國與歐美各國社會之狀態不同，所以解決社會問題底方法亦因之有和平劇烈之不同。民生主義的節制資本是一種防患底辦法以阻止私人底資本的長成，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底大毛病，但是節制資本也和平均地權一樣，雖然最初承認私有底存在，而最後底目的是實現社會主義底理想，完全廢除私人資本，實現公有的。國父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也就是就公有財產底這一綱目的而言。但怎樣節制私人資本呢？國父說：『歐洲通行的直接徵稅，就是節制資本的一法』。就是用累進稅率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

遺產稅和過分利得稅，以限制資本家利潤和利息底收入。但這不過是一種消極底方法，只能使私人資本不致繼續長大，想屬完全消滅私人資本是做不到的。要達到廢除資本底目的，只有採取國營實業底辦法，以「製造國家資本」（孫），國家資本既大於私人資本，根據大資本吸收小資本底法則，私人資本一定爲國家資本所吸收而歸於消滅，資本於是全爲國有，但「國爲民國，國有何異於民有」（孫）。於是「全國人民便得享受資本的利而不能受資本的害」（民生主義第三講）。因此節制資本是國營實業長期過程中底現象，到了最後的一瞬，私人資本是完全歸於廢除的。

（三）國營實業：前面說過節制資本需要國營實業，由於國營企業與私人企業底競爭，使私人企業無利可圖，自然將放棄私人底經營或爲國營企業所兼併，因而達到節制資本底目的。同樣平均地權亦非國營實業不爲功，因爲國家要「照價收買」私人底土地，以達到土地國有底目的，必須要有大量的資本，這種作爲收買土地之用底資本，便須靠發展國家底實業而來。於此，我們知道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都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不能完全解決民生問題。如果沒有國營實業，民生主義便成了一種社會底改良政策，不能實現社會主義底理想而成爲一種新的經濟制度，所以國父說：「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想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底辦法是不足的……因爲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

節制私人資本，還要製造國家資本」（民生主義第三講）。『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是也』（同上），因為在患貧而非患不均的社會，只有國營實業才能同時解決生產和分配底問題，才可製造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底條件，因此國營實業是民生主義底積極方法，含有主導底作用。除此以外，國營實業還要有完成民族經濟革命底職能。因為中國是帝國主義壓迫下的經濟落後底國家，受着層層的經濟底侵略，要能打破外國經濟底枷鎖，只有採取國營實業底辦法，由國家底力量來經營，才能籌集雄厚底資本，實行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生產，避免生產底浪費，減少商品底成本，以與洋貨相競爭，如果採行個人主義，任聽各人自由去經營，散漫去發展，那末中國永遠不能脫離帝國主義經濟底附庸，民族工業永遠無抬頭底希望，民生幸福底社會永遠無實現的可能。因此國營實業是抵抗外國經濟侵略底武器，是代替社會革命底方法，是民生主義實踐底根據。但是國家經營那些實業呢？依國父底意思舉凡與民生有密切關係，有獨佔性質或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大礦業大交通大工業均可由國家經營。國父說：『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實本振興實業，振興實業底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業，第二是礦產……第三是工業。』（民生主義第三講）國父手訂的「實業計劃」一書，就是國營實業底計劃方案，精深博大，確是中國經濟建設底指針。按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國營實業在方法上是發達國家資本，所以是國家資本主義，在目的上是實行國有，綱

有最後影響一類，所以是國家社會主義。因此民生主義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統一，民生主義所以能夠實現資本主義而達到社會主義也就是因有國營實業爲基礎。

(四)機械生產：資本主義發達底結果，增加了世界底財富，促進了人類底文明，它這一個歷史底功績，是值得我們頌揚的。它所以致此底原因，是因爲它具有有一個高度底生產力。自「實業革命後，機器繼以代人工之煩，生產力之大較人工且至萬倍」(孫)。所以不到兩百年底光景，歐洲之物質文明，突飛猛進，幾如已換了一個新底世界。但反觀中國是怎樣底情形？「中國工人雖多，但是無有機器，不能和外國競爭，全國所有底貨物，都是從外國製造運輸而來，所以利權總是外溢，我們要挽回這種利權，便要趕快用國家底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民生主義第二講)。我們今日要迎頭趕上歐美底文明，只有採取資本主義底生產力，實行大規模的機械生產。所以國父又說：「中國正需要機器以營其鉅大之廢業，以出其豐富之遺產，以建其無數之工廠，以擴張其運輸，以發展其公用事業」(實業計劃)。中國爲了發展自己底經濟，爲了解決民生底問題，必須效法歐美，採取新的生產技術，實行新的生產方式，「既歷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實業計劃)。同時也祇有採取資本主義底生產力才能由手工生產過渡爲機器生產，由小生產制度過渡到大生產制度。而且機械生產是國營實業底前提，因爲大規模底國營實業，

決不是舊式雇手工生產所能完成它底任務的。要開發富源礦產，建設輕重工業，都需要機械為動力，所以機械生產這一點說，民生主義經濟制度是屬於資本主義制度的，但在生產組織則截然不同。前者是由國家計劃經營，後者是係私人自由競爭，因此，本主義制度生產底弊害，民生主義都可避免。

(五)計劃經濟：資本主義種種弊害底發生，乃根源於其生產底無政府狀態，生產者只注意社會底購買力，忽視人民底需要。無限制競爭底結果，造成生產過剩，引起經濟恐慌，另一方面，生產又與消費脫節，人民無從得到他們底生活必需品，而且因為競爭底結果，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工人為生活所逼，不得不廉價出售其勞動，以換取其生活底資料。在這種情形下，工人底生活毫無保障，因此而引起嚴重底社會問題。民生主義的經濟是要求收資本主義底長處而彌其短處，即採取資本主義底生產力而拋棄其生產關係。換言之，就是要避免或防止資本主義底弊害，因而它必須實行計劃經濟，以克服資本主義生產底由競爭與無政府狀態，生產與消費脫節並重，使兩者經常保持平衡，圖又在「建國大綱」上說：「建國之首要在民生，對於全國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同努力，在民生主義的指導下，我們具體地解決問題，使資源至國底生产力，統籌計劃，使農工商各業，毛織棉業和工業，並行發展，對於計劃經濟才可使人民底四大需要，得到充分的供給，而不至再有生產與消費脫節的情形。而且因為國家經營

是一種機械生產底大生產制度，實行計劃經濟乃是邏輯上必然的結果。「實業計劃」就是實行計劃經濟底具體方案。一切經濟底設施，必須在整個國家底計劃與領導下進行。如此資本主義底弊害自然不會發生。所以民生主義底計劃經濟是以「生存爲中心，以人民爲對象，以社會爲領域，以國家爲經紀，採取政治上和平漸進底方法，建設一個以全民共享爲目的底民生社會」。

(六)共同享受：實本主義因爲以私有財產爲基礎，形成了貧富階級底懸殊，而成爲二十世紀嚴重底社會大問題。民生主義是解決民生問題底兩針，是以實現公有財產爲目的，所以必然要打破資本制度。國父說：「我們底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因爲「我們要解決中國底社會問題和外國是有相同底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到安樂，都不致受財產不均底痛苦」（民生主義第三講）。所以共同享受是民生主義理想的目標，因此「民生主義就是林肯所說的民享」（孫中山全集第三冊一三三頁）所謂民享，就是「把國家所有的歸到全體人民來享受，不由少數人壟斷」（同上書）。如果「交通礦產和工業底三種大實業……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受」（民生主義第三講），土地底漲價也收歸公有，人民底衣食住行四大需要都由國家供給，那末這時「少年的人有教育，壯年的人有職業，老年的人有養活，全國男女，無論老少，都可以爲安樂了」。（孫）國家是互助底社會，是人類底樂園，沒有壓

迫，沒有戰爭，大家過着和平而快樂底生活。這才是民生主義所理想底境界；也是民生主義所必能達到底目標。民生主義因爲有這一個偉大的目的，所以是既適合現在需要又適合將來需要底完美的經濟制度。

總括言之，民生主義是國父根據世界潮流和中國底特殊環境，透過了他底天才所得的產物。它吸收了資本主義底長處，撇開了社會主義底糟粕，以社會爲本位，以國家爲基礎，本於民生，發於仁愛，應乎人類社會底需要，包羅兩派經濟思潮底精華。無疑的，它是最適合於中國的一種經濟制度，是中國經濟發展應唯一路向；同時也是一切和中國環境相似的後進國的歷史發展底南針。它將引導人類「光榮的進步」，迅速的路上和平快樂的大同世界底程途。我們應該爲民生主義經濟制度底建設而努力，勇往的朝著這個光明燦爛底前途邁進！

民生主義之國營實業問題

劉文駒

一、緒言

革命的事業，一方面是破壞；一方面是建設。破壞只是要求達到目的的手段，建設才是革命的真正的目的。但是要「建設一個新國家，當然要從種種方面努力。而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就是物質建設」。『經濟根本目的在建設民生，爲人民謀福利，舍此便無所謂政治』（總裁）。所以「建設之首要在民生」（總理）。

不過物質建設的方法和途徑怎樣呢？或者講：物質建設的主要目標是什麼呢？總理說：「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國家資本，振興實業」。『發展中國實業當由政府總其成，庶足稱爲有生氣之經濟政策？』又說：「中國今日單是籌辦制資本仍恐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要加以製造國家資本，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總理）。由此可見物質建設的主要目標是國營實業。並且，今日「中國尚用手工爲生產，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歐美已隨其第二革命有殊」（總理）。

。實行國營實業，則可「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總理），把兩個革命同時並舉。這可在最短期間以內「迎頭趕上」（總理）歐美，建立現代化的自主經濟。發達生產，又充實國力，實在是一舉而兩得的事。

但中國所需要的是一個均富的社會，不是少數人壟斷財富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為資本主義的流弊在歐美十分巨大，造成了階級爭鬥，社會革命的局；以歐美在政治革命之後還要辦社會革命。不懂得這個道理的「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貧困。中國縱能媲美歐美，尤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跡於人已然之末軌之終無成邪」（總理）？所以，國縱能媲美歐美，實業爲事，必須以國營實業爲主，走我們自己底民生主義道路，它是在生產中寓了 equal 。

二、國營實業與民生主義

甚麼叫做民生主義呢？這裏我們從它的性質上來解說一下。

第一、民生主義是全民社會的。民生主義是民族主義的，所以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要由全民族中人齊共同努力。民生主義又是民權主義的，所以民生主義經濟建設的利益，也要由全民族中人來平等享受。

「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要衆人能夠共產」（總理）。要達到這樣大規模的生產，合理的分配

，即共同努力，共同享受，只有實行國營實業，纔容易成功。所以總理說：『苟土地及大經營皆歸國有，則其所得仍可爲人民所公有』。

第二、民生主義是計劃統制的。歐美各國因爲施行放任經濟，自由競爭的結果，各個人追求最大的贏利，拚命生產，究竟同業間的供給多少，社會上的需要怎樣，完全茫無所知。往往不能在預定的價格之下，售出其生產品。不勝蝕倒閉，即縮小範圍。一方面生產品滯感過剩，一方面却有千百萬的工人失業無依。要挽救這種危機或免蹈這種覆轍，非實行計劃經濟和統制經濟不可。要實行計劃經濟，只有國營實業才能加以方便。有了國營實業，統制私營實業的經濟亦易推行。

第三、民生主義是患患預防的。總理說：『歐美經濟之患在不均，不均則爭。中 國之患在貧，貧則開發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則仍不免於爭，故患患預防，宜以英美爲鑑，力謀社會經濟之均等發展，及關於社會經濟之一切問題同時圖適當之解決』。私營實業可以開發富源，但不能防止不均與爭鬥，英美即是證明。所以患患預防，除掉國營實業之外，沒有其它辦法。

第四、民生主義是和平轉變的。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要經過社會革命，總理覺得『社會革命的慘痛比政治革命的流血還要利害得多』，所以民生主義是採取和平等方法的辦法，逐漸的限制私有，擴大國有

，以達到理想的大同世界。擴大國有最有力的辦法就是國營實業，它可以調和社會上大多數的利益，使不相爭。總理說：『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只可以逐漸改良，不能夠馬上推翻』，就是這個意思。

綜合起來說，民生主義是全民社會的，計劃統制的，思患預防的，和平轉變的；而實行的方法就是國營實業，固然民生主義包括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但我們知道國營實業有特別的重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民生主義的消極辦法；國營實業是民生主義的積極辦法。不實行國營實業，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都不能徹底實現而難處。關於這點，我們還有申說的必要。

三、國營實業與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平均地權的辦法是先由地主自己決定地價，向政府呈報，然後政府一方面按價抽稅，一方面接價收買，而後才能達到漲價歸公，使土地利益為大眾所平等享受。在辦土地呈報時，如粵地主怕收買而以少報多，政府要收買就須有很多的錢。如果地主知道政府不立刻收買，展期抽稅，他怕抽稅就以多報少，但政府在最後收買時合全國計之，仍非有很多的錢不能辦到，若是實行國營實業，則賺錢甚多，便有力量收買土地了。所以國營實業是使平均地權能夠實現的辦法。

節制資本的意義是預防資本的弊害；這就是說，不要資本長大來操縱國民生計。但一有了資本，它就要長大。所得稅遺產稅等，都不能收到節制的效果。歐美抽了這些稅，資本仍然長大，即是一個證明。因此，要節制資本，最有效的辦法是國營實業。即由國家經營大工業、大交通、大商業、大農業等。這樣，國家的資本大量增長。由於大資本併吞小資本的法則，私人資本漸次減縮，節制資本乃不落於空談，所以國營實業，又是節制資本的有效辦法。

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都要靠國營實業才能澈底實行，由此可見國營實業的重要了。它對於民主主義有關鍵作用。而且國營實業可以造成一種經濟制度。國有不是私有。所謂國營實業不是私人資本主義，同樣它也不是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以公有為原則，沒有國家的。國營實業在它由國家投下資本生殖利潤一方面說，是國家資本主義；在它的國有即為人民所有一方面說，是國家社會主義。因此，它是介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經濟制度。

四、國營實業之一般理由

國營實業行得通嗎？行得通的，就在私營實業處於支配地位的歐美經濟先進國，事實上也有若干種的

實業是由國家經營的。舉例說來，有後面的幾種。

一、某些實業的規模太大，或者是因為這種實業太大不穩定，私人沒有能力去經營，於是國家來負其責任，英國政府的開鑿巴拿馬運河，澳洲與印度政府的修築鐵路等，就是很好的例子。總之，「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由國家經營管理之。」（國民黨大綱）

二、某些實業的報酬太遙遠，甚至非虧損不可，私人不願去經營；然而又很必要，國家於是負責為之。有些國家的森林事業，即是好例，在我國森林法的條文

大興澳洲的鐵路，每年都有虧損，但他們政府的用意，覺得把

這是「以養民為目的」之所必然。

三、某些實業為公眾生活所必需，國家要為保護消費者免受私人獨佔者的剝削，遂由國家來經營。比如地方之各種公用事業自來水、電燈、電話……等等。因此總理說：「於斯際中國正需要機器以營其鉅大之農業……而發揚其公用事業」。又凡「企業之有獨佔性質者，由國家經營管理之」（國民黨政綱）。

四、還有國營實業的目的在統制人民的消費，使人民不要浪費，或者消費過多，而有害於心身的健康。如有些國家對於嗜好品的製造銷售，由政府經營管理。反之，還有些有益於人民健康和衛生的也由政府

來經營。政府之目的不在賺錢，而在『爲人民謀福利』。

從此種種看來，國營實業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都有行得通的，在中國怎麼行不通呢？而且它還有它的優點和必需的理由。人類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集體化。國營實業是今後的趨勢，是今後必然的趨勢。各國政府的注重，尤其蘇聯政府的注重，即是此種必然趨勢的徵象。如此在中國就更應注重。所以我們今日以力行國營實業爲是。

五、國營實業對於中國的特殊重要性

這裏我們還要明白國營實業對於中國有特殊的重

中國工業不發達，經濟落後，又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變成貧弱交迫的國家。所以要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只有振興實業發達生產，充實國力抵抗侵略，以自圖富強。但國營實業需要大量的資本，這許多資本又那裏取得呢？總理告訴我們：利用外國資本，即由國家借外債來資於生產之中。這就是國營實業解決資本問題的辦法。同時，現代的生產事業，規模非常宏大，組織非常複雜。凡是設計、指導、考核、推進等工作，都須要學識淵深，而且經營豐富的專門人材。總理贊成美國實業大王駱其化羅的話，以經營

之才能即專門人材亦爲發展實業的要點之一。但專門人材需要長期的教育和訓練，中國要想求得它，就只有如總理所說，利用外國人材，以應目前急需。這也要國營實業方才便利，方才容易解決這個問題。

再其次，我們又知道中國是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經濟權旁落的一個貧弱國家。帝國主義者，對於海外市場與資源的掠奪是無所不用其極。經驗不會使我們忘記：馬關條約以後，各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摧殘了中國的幼稚工業，散漫脆弱的中國私營工業敵不過資本雄厚的外人工廠。所以只有國營實業，才能以雄厚的資本，大規模的計劃生產，以減低生產的浪費和商品的成本，避免中國各個私人企業的競爭，以與洋貨相抗衡。如此國營實業就有抵抗侵略，收回利權的作用。它是解脫外來經濟壓迫的有效辦法。

而且，中國在各帝國主義侵略之下，假使那一個國家的經濟勢力在中國造成了特殊優越的地位，中國的命脈就被那一國所控制。同時，其它各國也要起而與之爭逐，一旦這種經濟勢力的角逐白熱化了，就會引起紛爭。這於中國的獨立與世界的和平都很不利。如果我們主張國營實業，依照總理底辦法，以國際共同投資爲原則，使各國在中國經濟合作，因而相安共處，便造成一種和平的均衡狀態。中國又能由此達到發展民族產業的目的，把國力充實起來。所以國營實業有確保和平取得生存發展的作用。

這些是總理看到前次歐戰剛完的時候，擬就一個「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以爲國營實業寫出這

部專書的原因，我們只要把實業計劃及其附錄一看，即可明白。

這次抗戰結束以後，如何復興已破壞的都市和工業區域，重建新的大交通和大工業，滋生已成廢墟的農村，以及如何安置幾百萬復員的軍隊和無家可歸的難民於開荒，屯墾和作工，還有如何籌款償還戰債等等；並且一切都要求迅速，這更非用政府的力量實行國營實業不可，決不能是由私人作無計劃無組織的企業活動所可以解決的。無疑地，戰後的經濟建設應該是國營實業於私營。

所以無論從平時或戰後說，國營實業對於中國都有特殊的重要性。它不僅可以發達生產，挽回利權，充實國力；而且對於各國可以促進經濟合作，消滅商業戰爭和國際戰爭。現在正進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其結束時又是實行總理「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之良機，不應該再度錯過。國營實業之重要如此，我們非實行不可。其實，國營實業早就實行過，只是爲量不多，爲力不大而已。最初是實行於不知不覺中，但終因管理不善，漫無計劃，加以清廷官僚的貪污昏庸而成績甚少。總之，我們對於國營實業既認識，又感必要，自當力行爲是。把握現在，策勵將來，對過去還要有所檢討。這是應該注意的事。

六、國營實業之過去

中國過去的國營實業，也可以說是官營實業，是緊隨着中國的工業革命而出現的。因為中國的新式企業，開始就是由國家來經營。自從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戰爭以後，清廷飽受了外國槍砲的威脅，同時因為撰滅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又是完全靠了洋槍洋砲的幫助，更使滿清政府認識西洋軍器的利害，知道自己軍器遠不如人。當時一般中興名臣以中國衰弱的原因，完全在軍器不良，非積極倣造西洋軍器以與外人相抵禦不可。於是陸續在各地創設造船廠，兵工廠，輸入外國很多製造軍器的機械和技術人材。

一八七二年，國藩在安慶設軍械所；李鴻章在上海及蘇州設製砲局。一八六六年左宗棠設船政局於福州。一八七二年中國輪船公司招商局成立，為華輪船始祖。一八七七年左宗棠在甘肅省城南關外設立織呢機器廠；李鴻章在天津設立開平鑛務局，為中國興辦鑛業的開始。一八七九年李鴻章在天津大沽試辦電報，為中國創設電報的開始。一八八一年中自築的唐胥鐵路造成，為北寧鐵路的始基，亦即今日全國鐵路之始祖；英商東洋重話公司在上海租界創設電話，為中國電話的起源。這一時期，自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八一年，大約繼續有二十年之久，稱之為軍用工業時期，也就是中國新式企業的萌芽。這些軍用工業，完全是由官僚所創辦，由官僚來經營的。官僚們只知道儘量搜括以中飽私囊，完全不懂軍用工業的精神，又不注意訓練本國的技術人材，一切機器，技師都仰給於外人。因此雖有這些軍用工業，但對於國家民族仍無補於

事。

後來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的敗北，就充分暴露了這些軍用工業的失敗。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與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成立以後，開闢了許多商埠。從此，舶來品的輸入日增，中國原來的手工業和家庭工業的地位，一天比一天不利，於是官商方面，又想創利用西洋機器生產的工業，以挽回利權。首先中央及地方政府投下大部份的資本，並勸官僉商出資倡導。事實甚多。一八八二年李鴻章奏請在上海試辦機器織布局。一八八六年張之洞在廣東設立蠶絲局，李鴻章於天津機器局購機鑄造制錢，定名寶津局，又提倡開辦熱河四道溝鑄錢。一八九〇年上海紡紗新局成立，由官商合辦；張之洞設立漢陽鐵政局，漢陽槍砲廠。一八九一年開辦大冶鐵礦。一八九一年張之洞在武昌設立織布、紡紗、製線、縱絲四局。一八九四年湖北成立聚昌爐火柴公司，大部分爲官辦。這一時期，從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四年，約十三年，爲官辦及官督商辦的商品工業時期。這些官辦及官督商辦的工業和鑛業，與軍用工業一樣，差不多完全是歸於失敗。腐敗的官僚完全聽信外國技師的經營，自己沒有經營的能力。外國技師竭力排斥中國人員參與工廠的重要業務，並無一點誠意；同時助長外國資本的滲入，因之種下中國企業普遍的禍根。

總之，不管過去的是官督商辦的軍用工業，商品工業或鑛業——中國初期的國營實業完全是失敗的

七、國營實業之現在

目前我國的國營實業，以鐵路、電報電話、郵政及航業四種爲主。

(一)鐵路：我國鐵路自始卽爲官營。截至民國二十一年止，國有鐵路共九千〇四十二公里（此外在遼寧有一·〇五二公里，在熱河有八·一公里）。以資金資產共計，包括建築費及建築以外的收支帳，值八萬一千五百七十二萬餘元。歷年經營，雖稍有贏餘，但現在中國鐵路的債務狀況實處於最不利的地位，自一九二八年金價暴漲以來，許多國有鐵路的財政狀況不佳者只有停付外債。

(二)電報電話：這可分有線電報及無線電報兩種。據民國二十二年統計，有線電報計架空線路長度八萬七千九百·三公里，地下電報長度計六十三里，水底電報長度計千四百四十公里。二十二年所發字數達一萬三千三百餘萬。無線電則爲新興事業，年來發展很快。二十二年共有電台四十四處，發報字數達一千七百餘萬。官營電話共長三千一百五十六公里，電話用戶達四萬四千餘。各項營業，都有贏餘。

(三)郵政：中國郵政創設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至今已三十餘年的歷史。業務逐漸發達，

在國營實業算是比較有成效的。據民國二十年之統計，全國郵政局所共有一一九三處，所用職工達二萬六千餘人。財政情形，以前尚有贏餘，近年則頗虧損。民國二十二年之收入爲三千二百四十六萬餘元，支出爲三千五百六十七萬餘元，收支相抵，尚虧三百二十一萬餘元。（以上統計數字請參閱巫寶三編譯「經濟學概論」第八四頁）

（四）航業：國營的航業公司，只有招商局。前清同治十一年由李鴻章奏請設立，初爲官督商辦性質。累年以來，因外受外國航業競爭的壓迫，內遭內戰綿延的影響，營業很是衰落。而管理不善，尤其是失敗的最大原因。民國二十二年政府收爲國營事業，雖積極整頓，終因積弊過深，一時難有起色。

抗戰以後，各項實業都遭受極大的損失，甚至有些完全被毀壞。不過目前大後方的交通，工業業、礦業以及各種企業在政府經營、管理、幫助、指導及與人民共同合作之下近年以來很有驚人的發展。我們既憤憤已往的失敗，更應克服當前的困難，才可以創造未來的前途。

八、國營實業之將來與「實業計劃」

未來的中國是一個新的中國，它有新的制度，新的社會，新的文化。這一切將由國營實業方法去促成

根據前面的理論和事實，不能使我們再有甚麼疑慮。我們只有固心嚮方向着這個方向努力邁進，不應將來國營實業的實際方案又是什麼呢？那就是總理在前次歐戰後所寫的「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總理在他的自序中明白地說：「此書爲實業計劃之大方針，爲國家經濟之大政策」。總裁更加以補充，說這「並不是隨便便定出來的，很單純的東西，而是根據國際環境及時代需要而定之國家經濟建設最妥善精密的策略和計劃」。我們更須明白，實業計劃所包括的內容也就是將來國營實業所施的政策，「實業計劃」的內容包括十個綱目，六大計劃。在這裏用不着逐條的詳細解釋，只要提出幾個特點來，就可以明白將來國營實業所實施的政策應該是怎樣。

第一、特別注重發展交通和農礦業；二十世紀之今日的世界交通日益發達以前要走幾個月的現在辦發而夕至一個國家交通的發達不發達可以決定這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進步情形以及整個國家的強弱。農產品是工業的原料煤鐵及他種礦業又爲工業的基礎。總之農礦是其它一切事業的根本，其重要不言而喻。所以在「實業計劃」的綱目和第一、二、三計劃中都有發展交通和農礦的計劃外，而第四計劃完全是發展鐵路的計劃，第六計劃完全是發展礦業的計劃。

第二、國防與民生並重：總裁說過：「實業計劃」一書，其實就是一個偉大的國防計劃。如那裏要開

關河道海港，那裏要構成鐵路網的中心，……都是着眼於國防上的需要，爲國家民族策長治久安之圖。……「實業計劃」中一切的節目，無不有重大的國防意義，爲軍需而準備的。」但在「實業計劃綱目丙」，第一計劃第三部，第三計劃第四部及整個的第五計劃又是爲人民生活而設計。「經濟建設以軍需爲中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實行計劃經濟」（抗戰建國綱領），以達到「富國」「養民」的目的。

第三、輕重工業並重：既是國防與民生並重，重工業是國防的基礎。今日世界沒有和平可言，只有在強大的武力，鞏固的國防之下，才可以保障民族國家的獨立生存。但是要求國家繁榮，除掉強大的武力之外，還要生產發達，人民的生活富裕，這樣又要注重輕工業。所以「實業計劃綱目戊」，以及第一計劃第六部都是發展重工業的；綱目丙，以及整個第五計劃是發展輕工業的。

第四、是普遍的，又是配合的：「實業計劃」中各項海港以及交通、水路、鐵路，統都是普遍擴張到全國的。但是分別的在第一計劃第五部設立製鐵煉鋼工廠，第二計劃第五部創建大士敏土廠，第四計劃第六部設機關車客貨車製造廠，第六計劃第七部設立冶鑛廠，如此又是互相配合的。

其次，總理更教導吾輩國人：「在詳議國家經濟開發計劃之先有四原則必當存據：一、必選最有利之

途，以吸外資；二、必應國民之所最需要；三、必期抵抗之至少；四、必擇地位之適宜」。像這樣一個偉大艱鉅，包括完成全國交通、農、礦、工、水利、海港、商埠以及其他實業的建設計劃，當然非由國家經營不可。還要四萬萬人一心一德，矢志力行總理的遺教，才能完成這個偉大艱鉅的事業，達到物質建設的目的。最後才能達立新文化、新制度、新社會的新中國，實踐民生主義的遠大理想。

九、結語

統而言之，無論據那方面說：據民生主義的策略與實現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說，據一般的理由與特殊的重要性說；或是從理論與事實說，從平時與戰後說，從中國的獨立國際的和平說，再由世界趨勢說，由中國營實業之歷史說，由偉大艱鉅的「實業計劃」本身說；中國非國營實業不可，中國也必然要國營實業才行。

中國在這風雨飄搖的局勢之中，要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就要積極發展實業，努力物質建設。物質建設是建設一個新國家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而國營實業是這個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之主要目標，物質建設的最高原則是民生主義，民生主義是適應中國特殊環境與世界一般潮流的理想，而國營實業即是這個理想

的實踐。因為由於國營才可以壟斷生產，使國家資本集中，造成國家產業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達到理想的大同主義。在這種情形之下，才可以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即所謂「一次革命」的辦法，「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總理）。所以國營實業是跳躍私人資本主義的關鍵。而國營實業的真義也就在此。

時代在動盪，在轉換，中國怎樣去爭取自我的生存——這個迫切的問題是要我們自己去解決的。事實不欺騙我們，蘇聯的五年計劃，國營實業的結果，由一個貧苦腐敗，荒蕪古老的國家，一躍而為可以震撼世界的一等強國，不過是一二十年的事。抗戰的最後勝利已經不遠，今後是如何努力物質建設，實現民生主義，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我們應該以最堅苦的精神，去完成這個最艱鉅的工作，而達到總理最完美的理想。

民生主義與我國之農業改革

王秋園

前言

誰都不能否認，抗戰與建國是分不開之偉業，而經濟建設尤其是抗戰建國所共有之基石，農業建設為經濟建設之重要部門，故農業之發展實為抗戰建國主要援力之一，今日所謂「前方拚命，後方生產」，最大部份之責任是在農民身上，所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重心是在廣大之農村」之口號，確是不諱。國父早就昭示我們：「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因此我們不談建設也罷，要談建設，就非首先注意到「民生」不可；同樣我們不談戰時經濟建設也罷，要談戰時經濟建設，就非談戰時之農業建設不可，所以抗戰過程中，農業之改建實為基本之工作，總裁曾說：「國民之所恃以生存與國家之所賴以託命者，端在農業，農業生產一方面接直接供生活的主要原料，一方面又是工業原料之來源，無論要增進人民的生活，或要發達實業，都非先改進農業不可」註（一），他又說：「……我們的農村和農民之生活，如果一天不改善，我們的革命，我們復興民族的工作，便一天不能算完成……」註（二），所以農業之改革為當前我國不

可審議之要業；如何去完成此偉大之改革工作，我們要以民生主義爲此工作之最高準繩，以最大之力量，給抗戰建國以最大之幫助。現依據 國父民生主義之農業政策，約分來爲農業生產之改革，農業環境之改革，農業組織之改革，農業分配之改革四方面略述於下：

(壹) 農業生產之改革

我國農民一向保守其固有粗劣之農具及技術，不知改良，結果勞力耗費，收穫仍極微薄，今日科學進步，歐美諸國皆用科學方法改良農業生產，因此生產量大增加，非但足以自給，還可以大量傾銷於農業落後之國家，我國即其市場之一，現略舉我國主要作物每畝之產量，以證明我國生產量之低微，我國每畝小麥產量爲九七〇公斤，但丹麥之產量爲三、三二〇公斤，日本亦有一、三〇〇公斤；我國稻米每畝產二、五六〇公斤，但日本產三、〇七〇公斤我國棉花每畝產一八〇公斤，而埃及產四五〇公斤，凡此三者均爲我國全民衣食之主要原料，今產額低下，故我國每年須入超米，麵粉，棉花，棉織物等合計達四萬萬元左右註(三)。按我國天耕之地面積尙廣，農民勞力豐富，若能用以科學方法，則生產量一定增加，則非但國民生活問題可以解決，並且國家生命亦可延長，關於本節內容現分下列數項分述之。

(一)農具之改革——歐美各國農產量致所以大增，主要原因由於利用機器，此乃極明顯之事實。總理說：「……如果用機器來耕田，生產上至少可以加多一倍，費用可以減輕十倍或百倍，向來用人工生產可以養四萬萬人，若是用機器生產，便可養八萬萬人。……若用機器代工人，則中國現在有許多荒田不能耕種，因地勢太高，……若用機器抽水，把低地的水抽到高地，高地有水灌溉，便可以開闢來耕種……」註(四)，由此可見利用機器非但可以增加生產品的數量，並且可以解除旱災與墾殖荒地，總理又說：「無論如何，必須用機器以補助中國巨大之人工，以發達中國無限之富源也」註(五)。據美國農業部調查，在一八三〇年每年生產一英斗小麥，需時三小時零三分鐘，一八九六年每年生產一英斗小麥需十分鐘，此乃利用機械而成之效果，我國今日之生產情形實與美國一八三〇年之生產情形相仿，或恐不及。我國之農具，第一犁，我國之犁入土不滿三寸，宜改用西洋犁，第二耙，我國之耙不但入土不深，且耙面極大，亦當改良，第三水車，我國之水車非但灌水量極微，並且費時費力損失太大，故宜改用抽水機，凡此三者皆爲主要而普遍者應用之農具，至於大農用之播種機、收穫機、調製機等可以漸漸採用，他如棉花壓軋機，五齒中耕犁，點播機等均深合我國應用，當力加推行，但此等機械如都向他國購用，則漏卮太大，所以總理主張：「我們自己製造機器，挽回外溢的利權」註(六)，他在實業計劃中又說：「欲開墾廢地

，改良農地，以開力歸於農事，則農器之需要必甚多，中國工價甚廉，煤鐵礦亦富，故須自製造一切農具，不必由外國輸入，此項資本甚多，此工場直設於煤鐵礦所在之鄰地，即工力物料易得之所一註（七）；我國除煤鐵礦附近設大農具製造廠外，應當各省依其耕地面積之大小，需設立二個或二個以上之普通農具製造廠，製造小型新式農具，以低價及勸誘合作購買方法傳播民間使用。

（二）科學之應用——農學爲現代科學主要部門之一，歐美諸國之農業改進，賴於農學之發展甚多，如孟德爾發明遺傳定律之後，對於品種之改良大有進展，如哈勃發明以空氣中之氧氣製成亞莫尼亞後，植物氮素肥料之量劇增，凡此等等不勝枚舉，總之農業之改進與生物學，化學，遺傳學，栽培學等等確有密切之關係，所以孫先生主張：「急興農學」，「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即無異將一國之地廣數國之大」註（八），故農業科學及其有關科學之重要性可見一般矣。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三講內，對於農業生產方法之討論，特別提出幾個農業科學問題來討論，現將肥料問題，換種問題，及製造問題三者分述如下，此外機器問題上節已述，運輸及防災問題以後再述。

「申肥料問題——肥料爲給作物以養料及增加地肥，改良土壤之性質之主要功用，歐美各國今日皆摩

精化學肥料，如以空中之氮氣製成亞莫尼亞，再製成硫酸銨等以補給植物之氮素肥料，又如利用鳥糞製成過磷酸鈣以供磷素肥料，如此等等不計其數，因此農作物之產量大增，品質優良，回顧我國，近來雖有用過化學肥料，然而不知製造。孫先生說：「我國向來所用之肥料都是人與動物的糞料，和各種腐敗之植物，沒有用過化學肥料……要增加農業生產，我們便要研究科學，用化學的方法製造肥料」註（九），實際上我國農人非但少用化學肥料，就是所用之人與動物之糞尿，及草木灰，綠肥等不知善加保存和利用，人及動物之糞尿若不善加保護，非但有礙衛生，而且其中之氮素常常要失去三分之一以上。我國北方農民不知利用綠肥，往往將所有之綠草皆作爲燃料，因此北方土壤發生缺少氮素及有機質之嚴重問題，故我國農民對於天然肥料之保護與處理，是一件頗值注意與研究之事。至於化學肥料之應用當然十分需要，但專賴外國輸入，誠非良法，及使國家漏卮增多，孫先生早見及此，主張自製肥料，並且指示我們利用水力發動機器，以製造人工肥料，如廣西南寧附近之「伏波灘」，廣東北部之「翁源江」，及揚子江上游之「龍林」等地。我國若能在該地等設立數個大化學肥料製造廠，再各省內設立若干個肥料販賣合作社，同時設立若干個試驗場，及調查土壤指導農民利用化學肥料，則農產品之增多，定可預料。

〔乙〕換種問題——對此問題我國亦急待解決，孫先生關於此問題，只談到輪作制度，即今年種此種

作物，明年改種他種作物，因此可以增進地力，均勻勞力，減滅雜草及消除土內毒質之好處，此事一概農民極易做到，故急需推行。此外關於「輸入種」(Introduction)，「選擇」(Selection)，及「雜交」(Hybridization)三事亦極需要，關於「輸入種」現舉例以證明其重要，如我國東西今日所廣植之斯字棉，很有希望，對於農民之收入大增，該品種輸自美國，所以凡我國所無或不及之品種，若外國有之，適合其自然環境，則我們就要向外國輸入而種植之。再「選擇」一事，我國農民向各有其法，如風選，水選等，但此二法不易得更好之種子，不及鹽水選為佳，還有農民常在作物果實成熟時，至因間視穗之次者，枝葉之强者，顆粒之肥者，摘下穗作為種子，此法頗好。再次「雜交」是品種改良最科學之方法，此工作一般農民甚難做到，當由農學專學去研究與實驗，此法即兩種作物互相交配，產生新品種，取其優良品種，同時消滅不良品種，此工作極其重要，最好每省設立一試驗改良場，同時鼓勵農民取用優身品種。

「丙 除害問題」——「農業上有兩種物害，一是植物的害，一是動物的害……應用科學的道理，研究怎樣治療和野草以去植物之害……要由國家的大力量，倣效美國的辦法，來消除害虫，然後……可以增加農業生產量」，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三講內說得明白，他又說：「……美國把這種事情當為大問題，國

家每年耗費許多金錢來研究消除害虫即方法，美國農業的收入每年才可以增加幾萬萬元，由此可見除害問題之重大，除害工作之重要，我國每年受病虫害之損失實在太大，民國十六年山東蝗災，災民竟達七百萬人之多，作物之損失不可勝算，此外江蘇，安徽之螟虫蝗虫，北方五省之蠅害亦最烈，還有南方各省之稻熱病，黃河流域麥類高粱之黑穗病，赤銹病蔓延亦廣，此種病害，亟宜設法處理消除之，對於蝗虫或螟虫可以用直接方法撲滅之；黑穗病，赤銹病以及畜獸之病，皆可以用種種改良方法及化學藥品消滅之，昔我國無殺菌虫劑製藥廠及缺乏除害指導之工作，故需設立若干殺菌虫劑製廠及研究場，並造就人材做指導推廣之工作，使各種作物畜牧之病害消除，則民生可以少一種患難。

〔丁〕製造問題——此製造問題，即農產品之加工製造問題，孫先生說：「……要把糧食留存得長久，要可以運送到遠方，就必須經過一度的製造，才便於保存和運送……」註（十），因為加工製造有此兩種好處，則農民可由加工以增收益，而在銷路暢達之情形之下，農民自然會設法提高生產力以增加農業之產量，用時還可以利用農民之多量勞動力，尤其是在「農閑」期間，農產物大都已收穫，農民乘此時間入廠工作可以增加收入，農民之生活因此可以改善，農民之勞力不致閒費。對於加工製造事，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第四講內分別討論怎樣發展絲、麻、棉、毛、等業，及在實業計劃第五計劃中，對於糧食工業與衣

料工業中均有討論，我們不但對於以上幾種農產品要加工製造，即園藝作物，畜產之類亦需加工製造。饒植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言論中說：「現在要謀振興富國裕民的辦法，一方面對農村簡易的工業，及農產品加工製造之提倡，就農村設其附近，按合作系統經營以謀工業之密切連貫，交相發展，一方面對於一般工業由政府分別保護和獎勵，以求全國工業品之自給自足」，可見農產加工可以使農村工業化以增加農業生產，及復興農村輕工業之要事。我國現在關於農產加工事業極少，主要原因當然由於產品數量之低微，及交通不便之故，但亦有不少地方現急需加工製造，現舉一例，如浙江黃岩產密橘量極豐，品質亦極佳，每年運銷上海等地極多，因只能在採下最短期間內運出，結果因限於交通，缺乏保藏及加工製造之技術，以致腐爛而損失者極多，像「本地早」註（十一）水份極多，糖份亦豐，可以製成橘汁裝瓶漸漸運銷各地及國外，則可免無謂之損失，反可得更多之收入，諸如此種情形之地方一定很多，據海關統計（民十八年），橘子由美國輸入為二、二八五、二五八、元之多，佔園藝作物產品輸入之高位，這種漏卮非加以補直不可，農產加工實為重要的補救辦法。

（貳）農業環境之改革

述一下：

關於我國農業環境之改革，種類繁多，件件均需改造與建設，現分經濟環境，政治環境三方面大略敘述如下：

(一)經濟環境之改革——我國農業經濟環境之惡劣，實爲不可掩飾之事實，現約略的分爲水利與交通，資金三項來說：

一甲水利問題——我國旱潦之災幾無年無之，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大水旱災尤屬駭人，如民國二十年江淮大水災，受災區域達八省，災民及五千七百萬之衆，又如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之黃河水患，二十三年之旱災更於罕見之浩劫，故水利之興修爲年來改進農村經濟環境之首要工作，孫先生關於防止水旱之方法，曾提出治標，治本二道，水災之治標爲修築堤岸及濬深河道，治本辦法惟有造林，他說：「所以對於吃儉問題，要能夠防水災，便先要造林，有了森林便可免除全國之水禍。」註(十二)，旱災之治本方法亦是植林，治標方法爲利用機器抽水灌溉。所以我們本着中山先生之方法，一一去完成此種重大之工作，但必須由政府之力量去辦，孫先生說過：「我們講到了種植全國森林的問題，歸到結果，還是要靠國家來經營，要國家來經營這個問題才容易成功。」註(十二)，同樣築堤濬河等巨大工作，亦當由政府來舉辦，如綏、陝、寧三省政府合作之薩托民生渠，涇惠渠，洛惠渠等，成績極佳，現今我國有農林部之設立，

對於此工作，均有周密之計劃，來日此等災患定能消除。

〔乙〕交通問題——交通之閉塞，我國各地農村經濟之矛盾現象，又農產品因交通不便而夫去效用極多，如上述黃巖橋，我國一向來運輸靠木船及人力，因此費時費力並且運輸之數量又極微，所以興築鐵路，公路爲解決交通問題之唯一辦法，總理說：「如果中國十八行省和新疆，滿洲，青海，西藏，內外蒙古都修築了鐵路，到處聯絡起來，中國之糧食便可以四處流通，各處的人便有便宜飯吃」註（十三）。今日之糧食問題，交通之不便，不能不算他是一個重大的原因。至於窮鄉僻壤之地方，孫先生主張修築公路。我國近十幾年來，交通建設之成績，頗有可觀，鐵路如三大幹線之完成，全國公路已約達一萬萬公里，若與歐美諸國相較，仍是大巫見小巫，所以交通路線我國尙需大量修建，以期完成 中山先生實業計劃中之交通網，則不但農業問題可以解決，一切運輸調劑問題均可解決。

〔丙〕資金問題——資本爲生產三要素之一，所以欲求生產事業發展，資本不能不充裕，我國國家資本與人民資本，皆顯出支絀之狀態，所以生產事業不能發展。故所以國困民窮之原因極多，本節不加研究，關於我國農民經濟缺乏之情況，據金陵大學農村經濟調查報告，平均每農家，資本計一、七六九元，其中百分之九二爲不動產，又據何廉先生在山東調查，平均每農家每年之淨收入僅一四三元，農民資本如此之

缺乏，實爲發展吾國農業之最大問題，要解決國家及人民之資金問題，孫先生主張利用外資。曾說：我們要看外國已成之資本，來造成中國形來的共產世界，能夠做到這樣，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們自己有了資本之後，才去發展實業，那便是很迂緩了……」（註一十四），國家資本發達之後，即可進行許多更大之農業事業，同時用農貸方法貸與農民，助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則資金問題可以解決矣。

（二）政治環境之改革——關於我國農業之政治環境，情形比較簡單，然而影響於農業之發展却非淺，現在約略分爲兩方面來說：

「甲」外來之政治問題——關於外來之政治壓迫，不外是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在農業方面，雖當直接受到不平等條約束縛之處不多，但是各個不平等條約影響於我國農業發展之地方却很多，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第四講內說：「中國用本地的土產來製成貨物，所用的機器和外國相同，而且工資又便宜，照道理是應該，中國的紗廠布廠能夠賺錢，外國的紗廠要虧本，爲甚麼所得結果，恰恰相反呢？這個原因就是中國的棉業受了外國的政治壓迫，外國壓迫中國，不但是用經濟力，經濟力是一種天然的力量，就是中國所說的主道，到了經濟力有時而窮，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便用政治來壓迫，這種政治力就是中國所說的霸道，……外國用政治來壓迫中國，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外國至今都是用那些條約來束縛中國，中國因受了

那些條約的束縛，所以無端結廬事，都是失敗，……中國和外國如果在政治上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在經濟一方面就可以自由去和外國競爭，……」，此段話很明顯的告訴我們，外國用經濟力來壓迫以政治力爲後盾，我們就沒有辦法與之抵抗，與之競爭，因此在們要消除此種不平等條約之束縛，纔可以與外國在經濟上競爭，纔可以使農業迅速地振興起來。我國之關稅問題雖已在民十八年完全收回自主，對於貨物之出入有制裁之力量，可是尙有不少條約，間接影響我國農業之發展，我們非但關稅要自主，一切不平等條約都要取消，則不單農業發展可以自由進行，一切事業均可無束縛地成長起來，國家始能達到富強康樂之境地。

「乙」國內之政治問題——關於國內之政治問題，直接或間接影響於農業之發展者亦不少，譬如中共之割據，他們只知道分產，而不知極力從事生產，他們只知信奉馬列主義，採取共產黨之過激革命手段，毫不知吾國之國情是否合用此種手段，孫先生說：「共產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是共產主義之實行，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所不同者，還是在於方法」。由於俄國激烈革命之失敗，給全世界人士一個明顯的啓示，可是中共尙若不知，孫先生一知其法行不通，故主張用和平方法來解決民生問題，可是中共尙不知道民生主義之完美，仍是運用過激手段，結果農民非但無實惠，反而蒙其累，竟陷社會於混亂狀態，農業無

法可以改進，所以統一國內的政治，確是抗戰建國的基層工作，農業纔可全國普遍地發展起來，國民生活始有安適之日。

(叁) 農業組織之改革

組織爲現代生產制度要素之一，欲謀我國農業生產達成現代化，則組織一事不得不加以研究與實行，關於農業生產組織，現略分三項分述如下：

(一) 合作事業——合作制度之推行，實爲大眾利益之福星，現在世界各國合作事業已行有成效，我國自可倣行，合作組織爲農民平等受其利益爲原則之組織，不獨經濟利益得藉以增進，即社會政治等利益亦可改進。國府成立之後，秉承 總理遺教，自民十七年起在江浙二省努力推行，後逐漸推廣至全國，如全國經濟委員會棉業統計委員會在陝西省會同省農業合作局，辦理棉運合作，其他 業銀行之參加合作運動者，亦不在少數，據統計在民國二十五年合作社數有二六，二二四社之多，人員有一、〇〇四、四〇二人之衆，但全國面積廣大，仍是不足，最好在每一村莊上或一鎮一鄉設立一個消費合作社，及運銷合作社，以及農民借貸所，則每一個農民均可獲得利益與方便。孫先生說：「要減少商人從中取利……所以農政

便可自行湊合，開一間店子，店子內的貨物都是農人所需的……供既便利，價值又便宜，到到年底，還可依贏主之消費量而分盈利……」，此一段話告訴我們，若要免除少數商人剝削大多數農民之利益，必須各地普遍設立合作社纔是。

(二)擴大農場——我國農場面積是普遍的小，並且分割不齊，對於經營農事，極其不便，金陵大學柏克(Buck, J. K.)教授對於土地細劃之流弊，曾扼要的指出數點，一、地塊碎割過甚，往往不能耕作單位，二、地情形不整呈不規則之多角形，對於耕作殊為不利，三、增多地面積，減少耕作面積，四、不能利用新式的機器農具，五、耕地散亂，操作須東西奔跑，耗費時間精力，六、耕地離家遠，管理難，朝瀨對莊(十六)，此數點流弊確為我國農事上之癥結，我們一至鄉間，就可看到此種情況。日本農學家佐渡慶之在其所著之現代中國土地問題之探究中說：「……平均每戶不滿一町(合二十六華畝)的農業經營，是日本農村生產上莫大之桎梏，這種經營方法不改善，萬難解放日本農村的貧窮和農民之沒落」，回顧我國農場及二十六華畝者極其罕見，我國土地如此之大，而所營之農場尙不及東瀛狹小之島國。

華南農業主張之「國營實業」，在農方面即要設立國營大農場，大林場，最近農林部計劃之設立大農場，大清牧場，大林場若干個，即秉承孫先生之主張。故欲免去農場狹小之弊端，則農民私有農場範圍之

大，及得農產之豐盈。這是不容忽之事。

(三)農事機關組織系統之健全——我國農業機關之組織系統，本不健全，上面說過組織之健全與否，可以決定生產事業之好壞。據中央農業實驗所調查，全國六百九十餘所農事機關中六百四十三所，每年經費共爲二〇、四三七、三五一元，每所每年平均經費僅三一、七八四元，爲數極微，故每有徒具組織之名，而無實地之工作，況此種經費多數係由徵收田賦附加而來，剛至農民羣衆有未受其惠，而先受其害之苦。經費之不足當然爲組織不健全之主因，美國在一九三三年，美國農業調整局（A. A. A.）經費數萬萬元，僱員數千餘人，此爲龐大之建設事業組織，終賴其組織之嚴密，而有系統，卒能收指臂相助之效，農民莫不沾其實惠，實際上我國農事機關組織系統，非但經費不足，並且機關羣林深茂，彼此不謀合作，甚或互相傾軋。縱觀世界各國農業稱著之國，無不有健全而強有力之組織系統，現在我國有農林部之設立，健全而強有力之農業機關，可拭目以待。

(肆)農業分配之改革

分配問題本爲社會問題之一，因爲其在民生主義內之地位極重要，所以非特別提出討論不可。上部份

學家和倡導鄉村建設運動者，他們認爲今日中國之農業問題只在生產問題，而不是分配問題，他們認爲農業生產增加後，整個農村問題就可完全解決。這種想法實屬認識不足之毛病，要知道在不合理之生產關係之下，生產力之發展是不大可能的，退一步說：就令生產力發展而若美國那樣的高度水準，農民問題還是不能夠解決，孫先生曾痛切地告訴我們說：「美國對於農業之改良和研究，便是無微不至，……可是美國之吃飯問題，到底是解決了沒有呢？依我看來，美國之吃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在那些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生產方法太發達，分配方法完全不管，所以民生問題，就不能解決，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問題，就是分配問題也是要同時注意的。」（註（十七）），關於分配問題之解決方法，孫先生分別說得極詳細，現在就兩方面來敘述：（一）農產品之分配問題，即地租問題，要而言之，即中山先生所說之糧食分配問題，（二）是土地分配問題，亦即土地所有權問題，現分述如下：

（一）農產品分配問題——孫先生說：「中國農民佔全民八九成，但是他們由很辛苦勞動帶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自己所得到手的，幾乎不能自養，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要增加糧食生產便要規定法律，對於農民的權利有一種鼓勵，有一種保障……」（註（十八）），在實現農產品分配問題，國民黨之土地政策已有規例，即應用局部而有臨時性之各種減稅條例，如各省公種之三五減稅例等，此問題乃臨時解決性更

實，原本擬定五種土地分配之解決。

(二)土地分配問題——關於如何消除土地私有者之方法，說者紛紜，有「賜去地主」(To kick the land lord out)無償沒收論者主之，有「買去地主」(To buy the land lord out)是公債徵收論者主之，有「稅去地主」(To tax the land lord out)是照價徵稅論者主之，等等主張不一，現按 中山先生之土地政策略述一下：

「甲」平均地權——關於平均地權，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二講內分別提出照價徵稅及照價收買，漲價歸公三個重要辦法，這三個辦法之意義極明白，毋用說明，至於在實行此三辦法之中，還有許多重要之工作，必須完成如「土地調查」，此工作實在為基本之工作，非但解決平均地權為必要之工作，就是上面說過之施用化學肥料等問題，亦是不可缺之工作，還有「土地測量」，土地未加測量之前，照價收稅，照價收買二工作無從做起，所以要解決此問題，必須先解決其基本問題。

「乙」扶植自耕農——我們有了「平均地權」之辦法後，我們還要去扶植自耕農，使自耕農之田地不再落入地主之手，免致造成更加嚴重之階級對立。據中國銀行報告，民國元年佃農佔百分之二八，自耕農佔百分之四九，民國二十年佃農佔百分之三一，自耕農佔百分之四六，民國二十二年佃農佔百分之三二，自

耕農佔百分之四五，由此可見自耕農逐年減少，佃農逐年增加，明顯表示地主之土地逐年增加。要用何法解決此問題，使自耕農不致爲佃農，反而使佃農漸漸變爲自耕農，孫先生說：「至於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註（十九），所以要達到「耕者有其田」之境地，但要用何法去扶植自耕農，孫先生說過要以政治，法律上制出種種規定，來保護農民。實在我們除了以政治，法律來保障農民之外，還要以經濟力量來幫助農民，使他們不致陷於破產而售土地與地主，此三種力量若同時來保護與救濟佃農及自耕農，始能達到「耕者有其田」之完美境地。

〔丙〕墾殖荒地——此事實在爲我國土地分配上重要工作，因爲我國已耕地之面積不多，據統計我國每人平均只有〇。六二英畝地，據美英諸國，每人需有耕地二英畝半始足以供營養之資，若以此數衡之，則吾國平均每人之已耕地尙少四倍，每人如此窄小之耕地，反而一年縮小一年。總理民生主義之最高目標，是在完成「地盡其利」，墾荒一事實爲「地盡其利」之積直辦法。總裁對於移民墾荒，也有澈底之主張，他說：「土地是一切資料之根源，要發達生產，首須「地盡其利」，所以一切公私荒地（務必儘量開墾和經營畜牧，並且要更實施軍區屯墾制，利用集團的勞力，大規模的開發種種農利，……務以地無空曠

廣爲目標(二十一)。據俄國凱色令伯亞(Cvunt Keyserling)所著的一位哲學家的旅行日記(Jr. avel Daily Philoso pher)中關於中國內地鄉村生活之情形，曾有一段極其逼真的描寫：「……時同這片平原更代表着一個廣大莫測之墓地，幾乎沒有一平方地是沒有墳墩的，因此犁鋤也須在墓碑之間，必恭必敬地落着，這種地方的人民無論或生或死都是不肯輕易離開祖遺的田地一步，照他們的行動看來正彷彿是人屬於土，並非土屬於人」(註(二十一))。這段記載確是不謬，只要我們睜開眼睛一看，即可看到滿目的墳地，若該種習俗不革除，則以後勢將成爲一片墳地矣。翁文灝先生估計我國平原區除西藏之外，合計八十六萬七千方里，即五萬五千四百八十八萬英畝，除墳地，池塘，湖泊，住宅佔了二三成與耕地一、之七三、九八四、二四〇畝外，大約還有可耕地而未耕之地一、七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畝，又據各方估計中國西北及西南各省之墾殖指數，陝西爲一五，甘肅爲四·六，新疆爲〇·五，四川爲一五，雲南爲之·八，貴州爲二·六，由此可見中國未耕之地尙廣，所以墾殖荒地爲今日我國不刻容緩之事，若能將這批荒地完全開墾，則生產可增分配可均矣。

結 尾

蔣總統維新福說：「從來未有一個國家，得着了恆久的偉大，除非這偉大是建築在土壤爲生活的農民階級的身上」，我國一向「以農立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吾國致所以有恆久而偉大之歷史，幾全靠農民身上，迄至今日農民之責任更其重大，所謂「前方拚命，後方生產」，最大部份責任是在民身上，再看今日吾國抗戰軍火之來源，最大部份是以農業產品如茶、桐油、豬鬃、皮毛等掉換而來，故今日農業一廢，抗戰可動搖，建國更無從着手，欲求農民之生活改革，國家之生命延續，農業之改革是基本之辦法。以上四項改革爲我國當前急待解決之農業問題。前農林陳都長曾在中樞紀念週演講，擬定農政方針包括：一、增進農產實質以求食衣自給，輸出增加；二、改善農民地位，以求耕者自有田墾；三、應用科學方法，以求農場合理經營；四、促進農村經濟，以助農民發展生計，此四項與前述四項皆相吻合。再後我們要以民生主義爲農業改革之最高準繩，以和平爲改革之手段，同時以政治、教育、經濟等力量，共同聯合，解決我國農業之整個問題，以臻 中山先生所謂「桃源樂土，錦繡河山」之新中興。

註(一)：總裁於物質建設中說。

註(二)：總裁於救國最有效的是什麼？中說、

註(三)：重慶實業調查一六一頁、

- 註(四)：見實業計劃第五計劃、
- 註(五)：民生主義第三講機器問題、
- 註(六)：民生主義第三講、
- 註(七)：實業計劃第五計劃、
- 註(八)：孫先生之上李鴻章書、
- 註(九)：民生主義第三講肥料問題、
- 註(十)：民生主義第三講製造問題、
- 註(十一)：浙江黃岩之一種橋名、
- 註(十二)：民生主義第三講防禦問題、
- 註(十三)：民生主義第三講運送問題、
- 註(十四)：民生主義第二講利用外資、
- 註(十五)：同註(十四)。
- 註(十六)：岡柏克之China Farm Economy、

註(七)：民生主義第三講糧食分配問題。

註(八)：民生主義第三講，

註(九)：同註(十八)。

註(十)：總裁關於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言論中

註(十一)：Walter H. Malley China Land of Famine.

三民主義的教育建設

杜 濤

一 中國教育與三民主義

我國新教育的實施至今已七十多年了。這七十多年來嘗試的收穫，不能不說有相當的失敗。自清季的方書教育軍備教育起，一變再變，把一個堂堂的國家變成日本和歐美各國教育的實驗場。隨着政局的不穩與社會思想的雜亂，教育上的各種學說也紛然雜陳，致使教育制度時此時彼、無所適從。脫離了國家根本的立場，教育便成爲歐美日各國教育的尾巴與各種主義爭鬥的工具。只知摹仿抄襲和枝節的改革，却没有堅定而一貫的自我創造。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後，才有人著眼於三民主義教育制度的建立。民國十七年的全國教育會議，正式創定「三民主義的教育」一辭。於是以後的教育宗旨雖然迭有更改，但都由三民主義而釐定其方針，可謂不失其根本了。

雖然三民主義的教育已創行了許多年，但教育的中心理論不能蓬勃建立，以致沒有根本的革新。且因戰爭頻仍，教育事業屢被騷擾，社會人士復不肯熱心推動，所以成效微小。民國二十年國聯教育考察團在

其報告書「中國教育之改進」上說：「歐美日本之教育制度雖被中國熱心採用，以爲學校改革之基礎，但其是否適合與應付當今之需要，中國似尚未顧及……」。關於中國教育上所發生之問題，不在模仿，而在創造與適應……」。中國如其不追隨他國所不得不採取之艱苦途徑，從清查固有文化開始，斷不能完全造就其自己之前途」。從這些，我們都可以明白的看出，中國過去教育的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沒有一個中心的教育思想。概觀各國，凡是能站住腳跟的教育，莫不有其獨特的基本精神的。美國的實用主義教育、法國的唯智主義教育、德意的國家主義教育與蘇聯的社會主義教育，即是實例。所以教育底中心思想的樹立，是急不容緩的事。

美國肯特爾教授 (T. L. Kandel) 說：「所謂國家的教育制度的意義，就是說一切教育的活動被一個國家的理想和共同的國家意志所統轄」。可見每個國家的教育制度，應以「一個國家的理想和共同的國家意志」爲準則；教育的中心思想，也應完全的依着「一個國家的理想和共同的國家意志」而形成。有了這樣的教育中心思想，別國的一切好方法制度，均可在這個原則的範圍內盡量去吸收；本國固有的良好教育精神，也能從這個原則上充分的發揚，獲取他最大的效能而完成歷史的使命。

我國的理想社會和建國的最高準則是三民主義，所以一切政治經濟等制度的構成，均須以三民主義爲

依歸。教育更是一切建設的根本，其目前所需要建立的中心理論，無疑地，是必須與三民主義相扣合，以三民主義的理想為理想，以三民主義的原則為原則，去配合中國革命建國的要求，完成理想中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以下我就三民主義中三個原素——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裏所含有的教育上必須具備的性質和精神，加以分別討論。

二 民族主義之國防中心的教育建設

民族主義是主張一切民族有平等權利的主義，求國內外各民族的平等而形成一個大同的世界。其最基本的行動，就是中華民族的在國際間的平等之獲得。這一步倘若不能，其餘的一切建設將都無異於幻想。

而這是大有資於教育的。普法戰爭時，毛奇將軍把普國的勝利歸功於小學教師。今日德國的稱霸全歐，也應該是因為他們有着一貫而悠久的民族教育吧。現代各國，莫不如此。就是社會主義的蘇聯，亦無不注意於祖國的保衛和境內各民族之團結。足見民族主義教育有很大的重要性。在急待實現三民主義的我國，尤須加意講求。

目前我國的民族主義教育，就是國防中心教育，也必須是國防中心的教育。總裁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

的訓示中說：「三民主義所要建設的國家是一個國防鞏固、民權發展、民生樂業的國家。三民主義的國防建設，是以自衛爲目的，所以不獨不致妨礙民權及民生，而正是要使民權和民生在國防安全的保障之下，得得真實和永久的解決」。他又說：「我們的一切政策，一切設施都要以國防爲中心，一切利害，一切是非都要根據國防來判斷……，一切文化教育事業亦必須適合國防的需要，成爲國防的一部份」。足見教育文化事業應該以國防爲中心才能夠發揮其偉大的效力。去年八中全會決議的三年計劃中有謂：「一切文化教育之事業，均須適應國防之需要，各種人才之教育及訓練，須與其他各部門計劃配合」。這更是清楚表明了教育應該看準國防而實施。

如何才是國防的教育呢？我們可以說整個的三民主義教育就是國防教育。但是我在這裏所指的，卻是比較狹義的國防教育，即是說教育上的設施積極針對着國防的教育，也就是使每個人民要論在精神或物質各方面都武裝起來的教育。這個狹義的國防教育可以包括數方面的實施原則：

(一)精神的國防教育 民族自決的唯一要件是民族精神的建立。國父說：「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是提倡民族

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怎樣纔能提倡民族精神呢？必須從教育上着手。教育假使不能發展民族精神，就有民族滅亡的結來。民族精神爲何？顧父說：「把中國固有的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纔都可以恢復」。但是固有的知識和道德並非民族精神底全體，我們在實現民族主義，強化國防的時候，還應攝時代之精華，建立起新的民族精神。

民族自信力的培養是民族精神教育的目的。我們必須相信中華民族是有着強大的能力和悠久光榮的歷史的民族，要堅信「華民國能由三民主義新國家之建立而躡世界於大同的社會。總裁在廬山訓練團講的「建國運動」中說：「要民族獨立，必須恢復民族的自信力，使人民認識歷史文化，提高他們的國家觀念」。民族自信力實在是國防力量的源泉。有了民族自信力，才有國防的根基，才能夠建立強化的國防。

尚武精神的培養跟民族自信力的造成是相輔平行的。我國古代的社會，軍就是民，民就是軍，軍事是民衆所必具的知識和技術，以後大家以儒術斯文爲尚，兵民分化，軍事的技術和精神，漸漸的視爲「粗鄙」，也漸漸的被人們遺忘了。愈來愈重，武愈輕，於是弄得讀書人手無縛雞之力。武技既然消失，奮發蹈厲的氣節和行動也變得非常稀少，以致造成萎靡不振的狀態。目前教育的最大任務，就在磨發重視戰鬥的國民。但這種爲自衛而奮鬥的尚武精神，與莫索里尼所說的「一本書一桿槍等於一個完全法西斯黨員」

的侵略的尚武精神，是截然不同的。

總之，國防教育應該培養國民之充分的民族自信力和尚武精神，使他肯去戰鬥，樂於戰鬥，而且敢力戰鬥。這種民族自信力和尚武精神的培植乃是教育的最大的職責。

(二)體力的國防教育 總裁說：「術就是自衛，我們國家要達到完全獨立，必須人民完全具備自衛的能力」。這能力是什麼呢？最主要的就是體力。有強健的體格才能容納高尚的道德和豐富的智識技能，才能拿得起槍桿保衛國家。總裁又說：「中國人對於體育最不注意，所以身體都不好，連帶一切智育都不及任何民族」。所以體育的重要在我們中國尤其顯著，而且體育在教育的領域中本為一重要的角色。馬克思認體力的發展為教育的三大要義之一。希特拉說：在「民族國家中，全部教育的首要目標，不在單純知識的灌輸，而在身體健康的培養。精神能力的訓練是次要的」。他又說：「一個身體健全，性情堅定，而且具有堅強意志的國民，雖然缺乏學問，但較之學識湛深而體質虛弱的人才，更能造福於人羣」。雖然他對於體育的價值流於過分的誇張，但身體的健康為國家武力的基礎却是一個鐵的事實。所以我們在提倡民族自衛的國防教育之時，不得不標出體育的重要來。要談國防教育，體育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以上二點是就積極培養國防實力的方面來說。同時在民族主義的實踐上看，還有消極的建設原則，那

就是對國內教育事業及學術思想之合理的統制。這可分爲二部。就對外的說，民族主義主張與不以平等三我之民族採取不合作的態度，這就足以形成教育上的排強權與反侵略原則。凡足以削弱國防力量，阻礙待民主義的實行的一切教育設施。都在反對之列。但是合理的不違背國防原則的教育文化事業却容許他們的發展。就對內說，爲社會爲國家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也是必不可少的舉措。

三 民權主義之眞平等和眞自由的教育建設

教育是整個社會的事業。在三民主義的國家裏，受教育是每個國民的權利。而且基於民權主義，教育應該完全的個性化和平等化。不分財富的階級地位的高低，也沒有男女和年齡的分別，使每個人都能享有民權主義的革命民權——人類真正的自由和眞正的平等。

我國『民爲邦本』的民權思想雖然早已勃發，但是歷朝來因爲政治上的權和能沒有劃分清楚，政權與治權混爲一談，所以有能者兼有權，往往用種種方法造成社會上的不平等以維持他私人的利益。隋唐以後的科舉會試，歷代相傳，使人民的視線一致集中於官爵，視教育讀書爲登龍要術，使教育變成製造特權階級的工具。古來的民權思想完全喪失。國父出來創導民權主義，經過辛亥革命，討袁運動和護法戰爭等奮

門，民權主義確立起來。它是顯然的合乎中國的需要，所以民權主義的教育有積極的樹立之必要。

近年來各國的教育都有民權化的趨向。歐洲大陸英法等國的雙軌制是漸漸衰落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更充分的表現了平等的精神。德義的法西斯蒂們也將教育權儘可能的給與每一個國民。而美國呢？一向來就實行着單軌的教育。全世界的文盲隨着這一個傾向也就有了大大的減少。可是回顧中國，教育權無形的操在少數殷富人家的手裏。文盲的衆多始終佔着世界上的最高紀錄，文化水準站在極低的地位。所以民權主義化教育的實施，和民族主義的教育一樣，是急不容緩的事。在民權主義的教育建設上，我們就可以就「真平等」與「真自由」二方面提出「全民平等」和「合理自由」的二個原則來。

(一)全民平等的教育 平等的意義，國父在民權主義中已詳細講過。他反對盧梭「人生而平等」之說。他說「天生人類本來不平等的……因爲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成的結果當然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這樣講來纔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就是以後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上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這種天賦的個性差別是絕對不可避免的，無論在性能生長的速度終點及方向上，無不有顯著的表現。因爲這種差別，世界上就有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三種人的分別，在智慧上，就有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區別，即

教育上所稱「智商」(I. Q.)的高低。想把智慧者的造就硬拉至與愚者一樣，叫世界上人人做相同的事業，誰都知道是最笨不過的事。

要實現真平等，就有賴於發展個性的教育。國父說：「有學校以陶冶之，其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國民黨綱中的所謂：「勵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也就是因材施教，發展各人個性的意思，即所以提倡民權主義的「真平等」的教育。

如何實現真平等的教育呢？首先就要剷除社會上一切人為的不平等。訓政時期約法第六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無論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其中所謂男女種族宗教階級等種種不平等，全由人力造成，而尤以經濟上的不平等為甚，對教育的影響也最大。我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及苦工，他們的負擔最重而所受的權利卻恰恰相反。教育的不平等更是其他不平等不能消除反而加深的主因。這樣一來，先天的不平等夾着人為的不平等，必將使農工生活困難，爆發社會的動亂。所以民權主義的教育即應剷除教育之立足點與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國父曾說義「圓顛方趾，同為社會之人，生於富貴之家，即能受教育，生於貧賤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之甚也」。他主張「現在民國人民受教育是大家都要有平等機會的。……凡在自治區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權利。學費與書籍及學童之食，當由公

家供給。學校之等級，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當陸續按級而登，以至大學而後已」。他在「知難行易」的演講中，也可充分的表示他對普及教育的熱誠。他說：「本大總統來貢獻到諸君的，第一要普及教育……讓人人都能讀書，才可以說是普及教育制度……所以建設一個新地方，首先在辦教育，要辦普及的教育，令普通的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

既然一面消除了人為的不平等，而另一面卻啓發個性，加強各別的造就，豈不是依然的保持着不平等嗎？但是這種基於天性的不平等的人為的不平等，國父有個極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在道德上使聰明才力不同的各種人，盡其一己之能力為社會服務而不為私人謀利。他說：「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須可使之成為平等了」。德教育家凱欣斯泰納（Dr. Kerschensatner）說：「教育的目標，在將一定的文化灌輸兒童，使得自由發展其天才與能力而為社會謀福利」。這恰與國父的主張相同，同謀一個真正平等的理想社會之實現。

（二）合理自由的教育 「自由」思想的創導，亦以國父最為有力。他的天賦人權說，推翻了專制帝王的主張。但是由此卻引導了一部份人人於漫無約束的恐怖的自由之陷阱。他們把個人看得高於社會，甚至否認個人與社會間的關係，鑄成了他們度根本的錯誤。實則無論誰人都無法擺脫大社會的分工合作制度與

整個社會的教育文化風俗習慣等等的連繫，而超然的去獨自生存。德國的哲學大師黑格爾（Hegel）說：「國家者，乃普遍意志與全體意志的合一體，個人惟有在此普遍意志中，乃能發揮其自由」。所以他主張教育應該使人心脫去自然的拘束，而達於純理性的國家的生活，以養成「國家的個人」。個人主義的自由論，是早已被時代的浪潮捲走了。但是不幸的，在今日的中國尙有人捧着他們的尾巴，孜孜於「自由」的叫喚。他們不知道「我們是因爲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要將來能抗抵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在今天自由這名詞究竟要怎樣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國父）。這就可見民權主義的教育不高調自由。其所主張的自由在，國家範圍內，在社會範圍內，是一種合理的自由。同時，民權主義的教育之爲非自由的教育和自由主義的教育，則很顯然。它是要由國家來統制，並消滅教育中的紛歧錯雜之思想的。

四 民生主義之生活中心的教育建設

民生主義是國父整個革命理論體系的重心。他說：「我是爲了實行民生主義而革命的。如果不實行民

生主義，便不是革命」。而「民生」二字又是歷史的重心。在建設方面，他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所以在三民主義的教育理論中，包涵着民生的精神的，亦是較高級較重要的一部份。

什麼是民生呢？國父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在個

人方面說，民生就是人民生活的維持；在社會方面說，就是社會生存的延續。解決人民的生活，即可求得社會的生存；求得社會的生存，即能解決人民的生活。所以在教育上，教育之以「人類的生活」爲中心，也就是以「社會的生存」爲中心。衣食住行是人類生活所必需的原素。解決了這四個人生大問題，纔可算是解決了人民生活的基礎。要解決這四個生活大問題，教育便是一種最有效最主要的手段。因此，三民主義的教育建設，必須針對着這四方面下手。那麼三民主義的教育也就包涵了以生活爲中心的教育建設原則。

生活就是所謂教養術中的養。總裁說：「養是發展經濟，充裕民生的意思。在國家就地方來說，就要發達公共的產業；就個人說，就要增加生產的能力」。怎麼才可達到呢？教育文化程度的提高，知識能力的培養，是必要的途徑。所以我國教育「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爲目的。這樣，三民主義的教育建設，必將產生「生產救國」爲主要輔導原理，產生「化教育爲生產，化教育爲救國」。

就是我國文化之所要急切培植的科學生活科學精神與科學知識的教育。

(一)生產教育 這在個人方面，亦可說是職業教育。因為一國產業的盛否幾乎決定了整個國運的興衰，所以國民生產力的養成是國力唯一的支柱。現今世界各國的教育都朝向這個方向在進行着。在蘇聯，「社會的有用的勞工」是他們教育建設的中心。列寧們所倡導的「多藝教育」(Polytechnical Education)迅速地製造出大量的充滿了科學知識，專業技能和政治認識的「全能的工人」，他們積極地推進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德國的憲法上規定：「公共教育制度為系統之組織，在為全民而設之基本教育制度內，設置中學及高等學校，此等學校之設置，以生活所需之各種職業為標準」。因此他們的教育是充分的勞動化和生產化了。意國在初小裏就有農工常識的灌輸。法國的高小就分了農工商科。英國的「職業陶冶」也被一般的重視着，中學大學都設立了農工商科以造就生產的人材。

回顧我國呢？生產教育的需要甚明，且必須有更澈底的實行。國父早就注意到生產教育的重要。他說：「學校之目的，於讀書識字學問智識之外，當注重於雙手高齡，力求實用。凡能助雙手生產之機械，我當仿造，精益求精，務使能自造而不依靠於人，必期製造精良，實業發達。此亦學校所有事也」。總裁說：「我們國家貧弱到如此地步，建國運動所需要的國民，必須是具備生產能力的國民，所以我們要就各

種情況之下，對一般國民施以各種職業生產的訓練，養成勞動的習慣」。這些話是十分正確的。如此情形，便如圖又所說：「人人皆為生產之分子，則必豐衣足食，家給人足，而民生問題便可解決」了。總裁也說：「今後地方學校亦應注意工作技能與製造簡易機器之教學。此不僅為提倡科學教育，實為實現民生主義，重要方法」。這更是切實地表現了民生主義與教育應有的連繫。他近年所提倡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及「勞動服務運動」，都是以生產教育為其出發點的。

但我們必須認清，生產教育的實施或是個人生活的解決，必須以社會整個的發達為其目的。我們要使人人有解決本身生活的技能，同時更要有為社會服務的決心，而運用其最大的能力解決人類的困難，完成大社會的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所以民生主義的教育不是狹義的學徒職業教育，也不是貪圖近利的功利主義教育，而是順應產業革命，促進社會進化的整個的社會生產教育。

(二)科學教育 隨着勞動技術的培養和求職業之解決的生產教育而來，在民生主義的含義裏，有一個必不可少教育建設的標幟，那就是科學教育。所謂科學教育，首先是看重科學，作科學知識的傳授。這是生產教育職業教育之基本的要求。此點實在用不着多說。但科學教育又含有科學化的教育之意。它要每層國民都受過一番科學的洗禮，推成一羣科學的頭腦。美羅孟森教授 (S. Morison) 在其「中國教育報告書

與活動而取的種種哲學的玄學的與理論的態度」。這些哲學的玄學的理論的態度，數千年來掩住了我國社會的前進。要打破這條鎖鍊，端賴乎實施科學教育。

科學教育除要有系統的將科學常識遍植於國民心裏之外，必須注重科學方法之實踐的訓練，科學精神與科學習慣的培養，及科學技術的善用，養成一個着重實際，依據事實，能準確，能清晰，能謹嚴，能專精的個人，使他把這一種精神，在個人行動和社會生活上充分的表現出來。必須這樣，纔能使中國的文化水準提高，社會素質改變，而與歐美並駕齊驅，更能「迎頭趕上」，以嶄新的姿態出現。

不僅教育須着重科學化的社會改造運動，教育的本身也不過是科學的一種，所以教育的方法，教育的精神，也要充分的科學起來，站在實際的事實上去設施。

總裁對科學化的提想不遺餘力。他說：「我們要實施國防科學化，提高科學精神，普及科學技術，以完成實業計劃」。又說：「現在的時代是什麼時代？簡單扼要的說明他主要的特性，我可以把他定下一個名詞，叫做科學的羣衆時代。所謂科學的羣衆時代，包括兩個涵義：一是羣衆的，就是說羣衆本位的時代。二是科學的，就是說科學精神的時代」。我們正在這科學的羣衆時代，必須有科學的精神。因此三民主

義的教育，必須包含科學教育的建設原則，而為教育事業努力之標的。

五 教育與三民主義革命之完成

總上所述，可知三民主義中分別包含着以「國防」與「生活」為中心的教育建設原則，而以「軍平等」與「軍自由」奠定其基石。這兩個中心互相扣合，聯成一塊，而共同向着一個目標邁進，那就是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實現。

總裁說：「三民主義是總理憑其特殊卓絕之天資與救世救國之宏願，擷取古今中外學術思想之精華，並斟酌中國與世界之現實環境，發揮其崇高宏偉之智慧而創造發明的，實為吾黨革命建國救人救世最完善而唯一的指導原則」。而三民主義的推行，又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建國的事業。我們要完全實現三民主義，完成三民主義的「一次革命」，教育必須在其間發揮其最大的功能，「禮記」的「學記」上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總裁說：「教育為救國之本」。「國家將來的前途，統統要從教育做起」。教育對於建國的重要性於此可以想見。在三民主義革命的進程中，教育的需要更其明顯。總裁前年在重慶所講的「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裏，更明確的指示了國民革命對於教育的需要：

『先說建國第一時期即軍政時期，這個時期最基本的工作是建立革命武力，以掃革命的一切障礙，這還要特加說明的，就是所謂武力不限於軍事，軍事之外，同時要有教育和經濟，配合起來，纔能構成整個的武力……。教育經濟軍事三者之中，教育尤爲首要……。我們要知道教育乃是國家民族精神與文化，亦即永久生命根基之所託。所以教育的優劣成敗，即是國家民族興亡與衰最大的關鍵』（總裁）

到了訓政時期，他說：『照我研究所得，應該包含五項建設：就是（一）心理建設（二）倫理建設（三）社會建設（四）政治建設（五）經濟建設』。心理建設和倫理建設幾乎要完全依靠教育的力量才能完成，而社會建設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都要『以當地之人舉當地之事，以從事於教養衛生之實施』，然後才能『導引民衆到實行憲政的程度』。

至於國民革命程序中的最後階段的憲政時期，他說：『最後到憲政時期，實行憲法之治，乃能把教育經濟軍事這三者很健全的建立起來，使我們國家具備現代國家的資格得以永久適存於世界。同時三民主義的實現，也有了切實的保障』。

三民主義的革命建國，既與教育有這麼重要的關聯，所以我們要澈底實現三民主義，就要急速的建立三民主義教育的理論體系，作教育建設的準繩；以全力促成此三民主義教育的實現。如總裁在去年元

且「吾全國軍民齊」中所期望的：「我們要完全實行三民主義，造成中國爲精神物質上完全獨立自由的近代國家，作世界和平的礎石！」

論三民主義教育

陳志恆

(一)前語

三民主義是今日中國一切建設的最高原則，這是無可否認了，自鴉片戰後，外人的堅船利炮揭露了我國所有的弱點，引起全國有識之士的自覺，欲挽救這個危機，於是將歐美各國所有的主義制度，一概搬到中國來搬演，今天是總統制，明天就是內閣制了，以至政治無一日清明，內亂不息，教育不上軌道，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悲痛的事。

每一個國家民族，都有他的特殊歷史背景和特殊自然環境，所以採用的主義和制度，亦必須要適合這種特殊條件，否則，盲目的剽竊抄襲他人，終不得有好結果。

三民主義的創作者，是領導我們革命的——總理，他是一位優美的歷史家，偉大的政治家，也是唯一的教育家，這個主義絕對不是他憑空幻想出來的，他參照着中國的歷史倫理，社會風俗及各項特殊情形；同時，他又採擷歐美各國主義的精華，再加以他自己獨見的許多真理。總理大膽的說：「三民主義是救

國主義」。抗戰建國綱領總綱第一條就是把三民主義確立爲抗戰建國的最高準繩，總裁又常常說：「我們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這是我們建國運動的總目標」。由此可知三民主義是我們中國的唯一主義了。

所謂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研究從何着手，總裁告訴我們：「要促進中國的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遠存於世界，你要建國，就是要實現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方可建立三民主義的國家」，那末，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先從那一點開始，當然先要從教育着手，因爲，教育是一切事業的基本，阿里斯多德說：「立法者應先注意教育，忽略了教育，就有害於國家」。總裁也說：「現代國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經濟、武力三個要素所構成，教育是一切事業之基本，亦可說教育是經濟武力的相聯繫的總樞紐」。由此可知教育在國家地位上之重要了，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案中也曾說：「國民革命之基礎若不充實以教育建設，則三民主義亦將無澈底實現之期」。這樣說來，教育豈非更見重要了嗎！

要建立三民主義的新國家，無疑的，我們的教育也應以三民主義爲目標，以三民主義爲根基，這就是三民主義的教育了。

(二)三民主義教育的理論

一種教育，當然都有其教育原理，沒有原理的教育，就等於無靈魂的軀殼，既然來談三民主義教育，對於他的原理亦當然要先瞭解的，現在我們分三方面來說。

甲、從民族主義來說，中國人有一個大弱點，就是自私自利，沒有民族思想，像總理所說：「自乾隆以，知識階級的人多半是不知有民族思想」。就事實上來看，如康熙時所定的聖諭十六條，在當時便是全國國民家喻戶曉的教人準則，解釋這十六條準則的一部書是聖諭廣訓，在這部書中凡是普通的修身做人道理都講到，而獨不講忠的道理，亦不提恥的觀念，這是什麼緣故，就是預恐引起漢人的民族思想，起來反抗。爲了失去了民族觀念，所以常受外國人的侵略，以至民族陷於極危險的地位，國家將爲人滅亡，而中國人自己還不能感到，要挽救這種危難，便要提倡民族主義，恢復民族精神，要恢復民族精神，第一個條件，要使全國國民自知其所處之危機，第二個條件，就是要擴充中國固有小團體的組織精神，換言之，要將國人的家族觀念與宗族觀念推翻，再灌輸入國家民族的觀念，使四萬萬人團結成一體，如是，我們的力量就能龐大，國家的危機就不難挽極起來，除此之外，我們要恢復固有的民族道德，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八德，這也是 總理的指示，其次，還要做做兩人的服務精神，因為人羣是一種有機體的組織，每一個人等於一個有機體的細胞，彼此間有密切關係，且相互間是分工合作的，大家互為連繫，服務精神是互助的出發點，如果每一個人人都抱着服務精神，彼此互助，民族始能發展，國家始能進步。

最後，我們還需要固有的知識和技能，因為，我們過去有光榮的歷史，我們的固有知識是一貫相連的，我們的固有技能比外國人高超， 總理說：「我們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我們現在要齊家治國，不受外國人的壓迫，根本上要從修身做起」。這就是我們一貫的固有知識。又說：「從前國人的能力比外國人大得多，外國現在最需要的東西，是中國從前發明的，如指南針，印刷術，火藥……」， 總理所以要我們恢復固有知識和技能，其目的就在要我們增強自信心，要發揚祖先的光榮，排除恐弄病的心理，不過，對於歐美之長處，我們亦不能加以抹煞，譬如，他們的科學比我們好，我們必需迎頭趕上。

把以上的話歸納起來，可成三個原則，第一、要國人自知所處地位之危殆，而須增強團結力；第二、要恢復民族固有之道德和知技能；第三、即是做人之所長，迎頭趕上西洋科學文明。

乙、從民權主義上而言。在民權主義下的教育理論，最引起人注意的，也是為人所辯論得最劇烈的，

就是自由與平等問題。

古代希臘和羅馬曾有一度的民主歷史，然而他們認爲國家有無限的權力，絕對不讓人民有對抗國家的權力，直至中世紀，因專制魔王的過分壓迫人民，後來，個人自由逐漸發達，十七八世紀時，有洛克、孟德斯鳩及盧梭都是主張個人自由的健將，認爲身體、信教、言論；等自由，爲國家所不能侵奪的權利，尤其盧梭的天賦人權說，替人類放下了一把野火，雖然，焚燬了不少的專制魔王的野心，然而，把自由與本身陷入沒無約束的境地，法蘭西之滅亡，就是中了這個大毒。

哲學家黑爾說：「一國家者乃普遍意志與全體意志的完全一致，個人惟有在此普遍意志中得能發展其自由。」英人彌爾氏說：「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爲範圍，才是真自由。」照這說來，自由決非放蕩不羈的，卻是有一定的範圍和限制的了。

外國人常常批評我們是一片散沙，這是事實，因爲，我們人人把個人的自由擴張得很大，而缺乏整個國家團體的自由，總理說：「因爲中國是片散沙，所以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抵抗外國人的壓迫，是要打破個人的自由，結成堅固的團體」，他又說：「個人不可太過於自由，國家可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完全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己自由」，所以，自由決非放任主義，必

須要在一定範圍之內才有行施其個人自由。

說到平等，又是中了盧梭的毒，他說：「人是生下來就是自由平等的」。於是，把一般人弄得昏頭昏腦，硬生生的要將愚蠢的人們，拖長項頸，和聰明人的頭平放在一起，叫他們來享受同等的待遇，遂不知自然界中絕無一樣相同的東西，天賦等是絕無的事實，總理看準這一點，所以分人類爲聖、賢、智、平、庸、愚、劣幾等；以求其立足的平等，換言之，即要他們同在一線之上，各依其才智能力，給其教育，使他們自由地發展，及後，聖賢者，則當盡其須力，服務萬人，愚者，亦當盡己身之力，而服務社會，這樣才算是真平等了。

最後，就要談到權與能的問題，專制時代，皇帝一人獨攬大權，人民對於國事不聞不顧；可是，現在則不然，國家與人民有密切關係，政府之一言一動，影響於國民很大。於是，彼此間之組織又不能不加以健全之，欲要健全其組織，所以，不得不把權與能分開，這樣可以使政府與人民能互相有所牽制，既不使政府之權過大擴大，又可防其過於無能，總理主張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即政府要有治權，人民要有政權，所謂政權，就是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四權，治權就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試和監察五權，這樣彼此間始可平衡，其工作始有條理。

顯然的，要達到完善的民權主義，能使人民運用政權，瞭解治權，必須要提高人民知識程度，普及國民教育，闡揚民權主義的真相，這就是三民主義教育的重大任務。

丙、再從民生主義上來說，十八世紀時，英國燃起了工業革命的火，不久即傳遍了世界，中國亦無形中受其影響，接着資本主義的魔王，便一天一天擴張其勢力，爲了奪取原料和市場，許多落後的國家，都作了他們的犧牲品，中國亦在列中。

因爲機器發明，生產量大增，幾千萬靠着手工業爲生的人，一時間內都被打倒，有機器者，愈下愈富，勞工們一天不如一天，勞資對立局面形成，階級鬥爭終於在俄羅斯爆發了。

中山先生爲了要補救這種情形，減少人民痛苦，少一次流血。於是，就想出了一個合理的辦法，即民生主義，主張平均地權，漲價歸公，照價收稅，照價收買，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想透過階級鬥爭的權衡，不過，我們要知道，民生主義是適合於產業落後的國家，如中國，資本主義還未發達，階級尙未明顯，所以，總理說：中國是患貧，不患不均，就是這個道理。

從事於教育的人們，是爲求人類的幸福，三民主義既然是適合於中國，那末，我們的教育政策，教育目的，一切教育實施，當要依靠他的爲準繩，並要闡揚上面種種論理。

(三) 總理的知行學說與三民主義教育

總理的知行學說，在教育上，可算是一個最新而最合時代的哲理，也可算是一切事業的心理建設，對於這問題，早引起學者的注意，在中國過去學說中，如孔子有言行一體說；孟子有性善的知行說；最有力的的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可是這許多學說中，卻不能立足於世，而獨有總理的知難行易，行先後知說，反成一個後來居上的新學說。

孔子孟子幾派學說，覺得都太偏於個人修養方面，道德方面，倫理方面，沒有把知和行作有系統的解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是介於知難行易與知易行難兩說之間。他認為，凡能知者，就能行，要行必定要知，若將他的學說仔細加以推考，覺得很難適合於今日，當科學愈昌明，又化愈高，人類的慾望亦必愈高，事情亦必愈繁，這是自然的道理，因為事情的繁多，就要分工合作，就穿衣這事來說，有種種花的，有布匹的，有染色的，更有衣匠，試問穿衣的人是否都能懂得種種花，織布，染色，的道理，所以，知行合一學說根本不可存在於今日的世界。

行先知後與知難行易，這並非空談，是有學理上的根據，心理學家華真說：「小孩子的動作最初是盲

自時，更進而爲衝動，由衝動所發生的動作中，才有知的成分」。在心理學上更有不知而行的動作，如蠕動、向背動、反背動、本能和習慣等，由此可知知行可以分離，行不一定要知的；從人類進化上看，總理分歷史爲三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爲不知而行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爲行而後知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以後的知而後行時期；古人本着自己的本能，向前求進，自己不懂得所以然的道理，此爲第一期，其次，得由盲動中而得到許多經驗，由經驗中求得知識，此爲第二期，後來，則知識豐富了，所以便知而後行。最後，從社會上人的程度不同來證明，社會上有三種人，卽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與不知不覺者，而以不知不覺者爲最多，次則後知後覺者，最少的先知先覺者，照這樣說來行先知後與知難行易的學說，是千真萬確了，再者，總理曾用十大例來證明知難行易，更可促進他的正確性了。

中國人向來認爲知易行難，所以看輕了知識，結果非但不去行，連知都忽視了，號稱士大夫階的人，都是好讀書，而不求盡解，念得一套四書五經，會切幾篇八股文章的，便搖頭擺尾地傲視一切，不求上進，以至中國之不能進步，再因他們認爲知先行後，所以便拚命地十年窗下，死讀古人陳述，作古人的奴隸。總理大聲疾呼行先後知，知難行易，目的就在想打破這種舊觀念，要人人實地參加工作，從實踐中求知，總裁的力行學說，也是如此，他與 總理的知行學說是一貫連接的，

三民主義教育，首先就是「教導人民力行，排除過去之傳統觀念，在級育本身上，也要以行為前提，遇事不應怕難，只要自己有了堅定的意志，只管去行，最後，畢竟會達到目的，可是，我們又不能忽略了從實踐中求知的口號，因為，要社會進步，知識仍然是很重要的。

(四)管養衛與三民主義教育

國家中的事情，千頭萬緒，概括的說，就是管、養、教、衛四事，這四件事是相因相成，分工可以增加其效力，合作可以成其共的，所謂教育之為用，就是造就通才與專才，具有自治治事之德，即管、自養、養人的智，即發；自衛衛國的勇，即衛；以供國家社會的需要。陳部長說：「教育既以作育人才，藉求民族之獨立，民權之普遍，與民生之發展，故其中心工作，實即教人以如何為管、養、衛三者以成於國而已。」他又說：「說到教，第一件要教的人，就是管，從事教育的人，而不能教成學生具有管理的技能；這教育還有什麼價值，；須知受到管理的人，就是得管理的教育，才能應用其管理的人；實在是樹學生將來教育別人，管理別人的基礎；第二件要教的事，就是養，即謀生的方法與技能，本來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人有一技之長，一技之能，謀工作以自給，能服務以養人，同時要減少個人的欲望，增高其服務能力以謀

養千萬人服務能力，以能爲千萬人服務爲最大目標……自養力求儉約，養人力求富足，才是教育所應培養的；第三件事，要教的是衛，過去士子動以弱自許，有病容而不以自苦，手無縛雞之力而不以爲恥，衛已尙不可能，怎樣執干戈以輔社稷」。從這一段話中，很明白地所告訴了我們，要國家富強，就是要國人能担當得起管、養、衛的責的，管養衛就是我們教育的總目標。

在過去的教育上，我們忽視了管理與訓練二事，其實這兩事是很重要的，不論對人，對物，對地或對事都需要有嚴密的管理，就人事關係來講：所謂監督、指導、分配、調遣、考核，都是管理的要項，至於對事、對地、對物亦無不需要嚴密的管理，我們要使事無頹弛，地無曠廢，物無遺棄，在西洋有科學管理的專門學問，所以他們對於一切事業能確實，嚴密，且能合理的支配與運用，我們要使我國國民能力充實，管理教育，實在是一種重要事業，所謂管理教育的內容，據陳部長的意見，是要養成三種精神，第一是服從精神——對上的；第二是誘導精神——對下的；第三是互助精神——對平的，有了這三種精神，組織才有靈魂，而組織實爲管理的先決條件，法紀又是維持組織之主要原則，養成待人以禮，行事以義，接物以廉，紀律以恥爲精神；然後上下層節制，左右分工合作，前後步代整齊，養成人人有共信的標準——禮；共守的紀律——法，有和諧的思想，爲一致的行動，使千萬個人團結成一條心，衆志成城，無堅不摧，這才是我

們偉大的教育力量，教育亦必須如此，才收教育之實效。

關於養的教育方面，就是發展經濟，充裕民生的意思，在國家中，就地方來說，就是要發達公共的產業，就個人方面來說，就是要增加生產能力，我們的國家貧弱到如此地步，建國運中所需要的國民，必須要具備生產能力的國民，對於一般國民施以各種職業生產的訓練，養成勞動的習慣，革除其倚賴游惰的惡習，至少限度也要使農業和工業生產達到本國自給的程度，姚江濱先生說：「一個智識能力低劣的國民，對於他的生活是比較困難；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民生問題也一定複雜難以解決，所以我們承認提高文化是解決人類生活的必要途徑，而培養國民智識能力的教育，又是提高文化的原動力，由此可以知道，要解決民生問題，實際生活的需要，發展人們的智育，而生產教育，就是培養國民智育的中心教育」。在這裏告訴我們解決民生問題，就是要提倡養的教育，便要注意生產教育，不過，在談生產教育時，我們要着重科學，要迎頭趕上歐美之科學文明，那才可算達到養的教育。

現在，我們就要來談國防教育，即衛的教育，所謂衛者，即自衛，衛人，要國家獨立，必須使人民具備這個能力，小之則保衛鄉里，大之，則保衛國家，要達到這個能力，應以衛的教育為主，而尤其要提高對於國家民族的觀念，犧牲，奮鬥的精神，並養成服從紀律的習慣，我們可以引用 總裁的一段說話，「

我們要使國家能夠獨立，使民族能夠自由——應該健全我們的本身，即時時刻刻努力鍛鍊強健的體魄，修養高尚的人格，造就豐富的知識，發揚剛毅勇敢的精神，養成刻苦耐勞重紀律守秩序的習慣，造成一個獨立國家，健全國民」。

照以上看來，管養術就是我們三民主義教育的實施重心，管養術的教育，也就是三民主義教育。

(五) 總理的教育思想與三民主義教育

既來談三民主義教育，則對於手創三民主義的 總理的教育思想，不可不明瞭，可惜，「總理無專門的教育著作，不過我們也可在他國遺書中找到不少材料。

總理在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第六項中明白地講出他的教育目的，他說：「凡在自治區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權利，學費書籍及學童之衣食，當由公家供給，學校之等級，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當陸續按級而登，以至大學而後已，教育少年之外，當設公共講堂，書庫，夜學，為年長者養育知識之所」。由這話中，可以知道 總理對於教育的目的，要普遍化，要自兒童教育普及到民衆教育，使全國之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再看我們目前之實際情形，實行普及教育以來，略得到一點知識的人，就跨了空

疎不切實用的道路，天天絞腦汁，做考試的奴隸，畢業了，就是失業，總理深知其弊，故云：「學校之目的，於讀書，識字及求智識之外，當注重雙手萬能，力求實用，凡能替雙手生產之機器，我們皆敬造之，精益求精，務使我們能自造，而不依賴於人，必期製造精良，實業發達，此亦學校所有之事也，學校者文明進化之源泉也」。這就是要我們注重生產教育，職業教育，要做到手腦並用的實際教育，不論學生，先生都應如此。

再論教育的功用，是在能繼續發揚民族的力量，傳遞前人的知識。總理在布達行易的講演中曾說：「教育老年，那班少年享受了教育，十多年之後，便成有用的人才，可以繼續你們前輩去辦事，如果他們失了教育，你們以後的人才，便新舊不相銜接，以後的事，便沒有人辦」。他很證同康德下面的話：「吾人惟一之希望，即在各代人能以其智慧供給於次代，以漸求其能完成，所以發展人類之天性及促進人類達此目的之教育」。

在民主國家，人民的政治淵源，無論富貴貧賤，男女老少，均應受教育，才能運用四權，監督政府，幫助政府做事，於是，總理極力主張普及教育，他說：「因為民國的人民，人人都是主人翁，人人都是替國家做事的，所以，建設一個新地方，首先辦教育，要辦普及的教育，令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然

「人人知道替國家去做事」。

巧婦難爲無米之炊，這畢竟是事實，數十年來，無數人之腦力都是勞心焦思在教育經費上，可是，總理早給我們解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做全國大生利的事，要中國像英國美國一樣富足，得到富足的利益，不歸少數人，有窮人富人大分別，要歸於多數人，大家可以平均受益，到了那個時候，國家究竟是做一些什麼事呢？就是要辦教育，國家有了很多錢，便移作教育經費，中國現在的歲入約計二萬萬至三萬萬，日本有十幾萬萬，美國有幾十萬萬，這些經費都歸人國家用，去辦理教育海軍和一切行政的，國家的些人，在日本有十幾萬萬，中國土地要大過日本十幾倍，國家建設好了，至少歲入可以收一百多萬萬，那樣多的歲入，應該定作什麼用途？要由國家發幾十萬萬，奉作教育經費」，又在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內說：「或疑經費無所出，此不足憂也，以人民一月義務勞力之結果，必足支持此費，如仍不足，則由義務勞力之內撥加，或五日或十日以至一月，則無不足矣，一境之內，如人盡所長，爲公家服務一二月之義務，長於農事者，爲公家墾荒，則糧食足矣；長於織造者，爲公家織布，則衣服足矣；長於建築者爲公服務，則屋舍足矣，如是少年之衣食住，皆自自由義務之勞，成功，自治之人民各有雙手，只肯各盡其長，則萬事備矣，不必於窮鄉僻壤中，搜括難得之金錢，籌集大批之款項，想必人人皆喜歡之事。」

教育應該隨着環境，這是美教育專家杜威博士的教育原理，但同時亦不得不不題到整個國家之計劃，我國地域遼闊，東濱海，西北山多，人民風俗習慣，各不相同，而需要之各種知識技能也不相同，自然不能以同一之教育，要解決這個問題，總理在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中有一段如下的話：例如軍事外交宜統一，不宜分歧，此權之屬中央者也，衛生教育隨地方情形而異，此權之屬於地方者也，更分析以言同一軍事也，固固屬之中央，然警察隊之設施豈中央所能代勞，是又宜屬之地方矣，同一教育也有濱海之區——宜側重水產，山谷之區——宜側重礦業或林業，是固宜市地方以措置之自由」。觀此，總理對於教育是分於中央與地方，那末，以後對於教育的集權制度與分權更用不到我們贅辯了。

中國的科學落後，無可虛言，如果要科學進步，我們要迎頭趕上，應由政府選派學生赴外國研究學習模倣，以取其所長，總理說：「至於人才問題的解決，（指科學人才）則有二法，一爲多開學堂，多派留學生到各國之科學專門學校肄業，畢業後，再入各種工廠，練習數年，必能使所學能升堂入室，回國能當一面以經營實業，斯爲上策」。不幸得很，留學生一出國，他們都不明本國實情，大家都盲目無所適從，不知揀其精華，而徒然震耀於其文物衣冠外表之華麗，加之富貴浮華子弟，浪漫成性，如大然中飄蕩之小舟，而不知其所止，而聽其自然，趨乎下流，中國的派遣留學生距今已有六十餘年，可是，這一批一批的

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認識很少，對於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注意。

最後，總理所講，是關於恢復民族思想民族精神的教育，就是主張恢復八德的教育。

總之，總理的教育思想，就是我們三民主義的教育思想，他對於教育上的主張，就是附合於我們三民主義的教育。

(六) 結論

關於上面幾點，我們沒有直接的說出三民主義教育是什麼？可是，已在間接中說明了三民主義教育的真相。歸納的說，三民主義教育，是打破一切壞習慣的革命化教育，使人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格化教育，也是適合時代的社會化民主化科學化與職業化的教育。他的唯一目標，在使恢復民族精神，發揚固有文化，提高國民道德，鍛鍊國民體格，普及知識，增進科學，培養藝術興趣的實現民族主義教育；也是灌輸政治知識，開揚自由平等，使人人肯服從守法紀，且能替社會服務的民權主義教育；再後，就是要人人養成勞動習慣，增加生產，改進技能，調和經濟利益的民生主義教育。

正在展開三民主義教育工作的時候，素抱破壞決心的敵人，終於在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舉起大侵略的

火把，誰知我們四萬萬同胞，固然能在賢明的領袖領導之下，抗戰了五週年，暫時間雖失了許多土地，但在戰略上却已由敵進我退而入我勝敵敗時期，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這是敵人自取切腹之道，只要諸同盟國，能緊緊携手，相互援助，勝利的一天總能降臨，我們嶄新的三民主義國家也就將在個是出現，不過，現在，我們必須要時刻的加緊着三民主義的建設。

陳 志 桓

57

三民主義研究集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初版

編輯者 國立中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會

出版

發行者 江西省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委員會

總經理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印刷者 中國合作圖書印刷所

地址：江西泰和上田碼頭

每冊定價 四元五角

中國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字第〇〇四四號

